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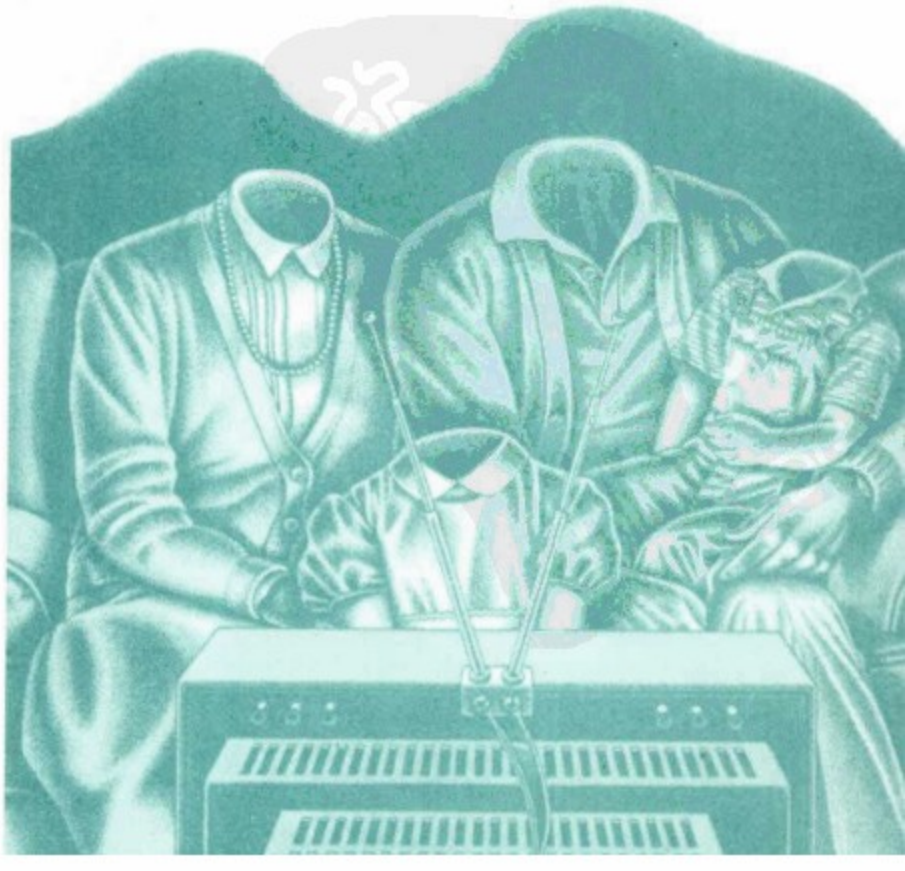
娱乐至死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美] 尼尔·波兹曼 著

|童年的消逝| （外一种）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社科类图书奖

陈丹青 艾未未 周国平 黄集伟
展 江 刘 擎 陶东风 蒋原伦

推荐阅读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尼尔·波兹曼的深刻预见　娱乐时代的当头一棒

陈丹青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尼尔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艾未未　《娱乐至死》是一本对现实和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很有意义的书。

黄集伟　在现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娱乐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应该娱乐的也都娱乐了，在这点上，《娱乐至死》这本书给予了我们一种很好的提醒。

展　江　《娱乐至死》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周国平　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因而消逝得更为彻底。

陶东风　波兹曼提出了语言在电视文化来临之前在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

刘　擎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蒋原伦　波兹曼的思想虽承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而来，但文风与两位前辈不同，波兹曼的著述清晰畅达，娓娓道来，他是写给年轻的学生们看的。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 尼尔·波兹曼

北京贝贝特

上架建议：大众经典、新闻传播

ISBN 978-7-5633-8386-3

9 787563 383863 >

定价：34.00元

娱乐至死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美] 尼尔·波兹曼 著

|童年的消逝| （外一种）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by NELL POSTMAN
Copyright ©ELAINE MARKSON LITERARY AGENCY,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3
by Shanghai San Hui Culture & Press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美)波兹曼(Postman,N.)著;章艳,吴燕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633-8386-3

Ⅰ.娱… Ⅱ.①波…②章…③吴… Ⅲ.大众传播—传播媒介
—研究 Ⅳ.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840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0.5 字数:258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0 000 定价: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 尼尔·波兹曼

目　录

前言

娱乐至死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 5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 16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 28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 41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 59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 73

第七章　“好……现在”　/ 86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 98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 108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 122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 132

参考文献　/ 139

译名对照表　/ 142

童年的消逝

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 *165*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 *182*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 *199*
第四章　童年的旅程　/ *213*
第五章　结束的开端　/ *225*
第六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 *238*
第七章　成人化的儿童　/ *253*
第八章　正在消失的儿童　/ *272*
第九章　六个问题　/ *293*

参考文献　/ *302*

译名对照表　/ *306*

娱乐至死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 1984 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 1984 年[1]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2]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3]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

1 《一九八四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注

2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注

3 “老大哥”系《一九八四年》中的独裁者。——译注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18 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19 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岸，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 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 30 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

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1]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头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2]和谢基·格林、瑞德·巴顿斯、迪

---

1 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注

2 比利·格雷厄姆 (Billy Graham，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注

昂·沃威克、弥尔顿·波尔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跌打滚爬了80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爱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鲁斯·威斯西马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1]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些已经对此作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征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我仔细研读过这些阐述，从中不是没有学到东西。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甚至神学家们，都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在任何情况下，如

1　引自1983年8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1页。

果我的见解能够基本接近事实，我都会感到惊讶。正如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前人的理解更为透彻的观点。虽然这个观点并不深奥，但它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的直接性，这样的视角正是2300年前柏拉图提出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赘肉。我们难以想像，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

水火不相容的。

还有一个例子，更复杂一些：信息、内容，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今日新闻”的产生全然起源于电报的发明（后来又被其他更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发扬光大），电报使无背景的信息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跨越广阔的空间。“今日新闻”这种东西纯属技术性的想像之物，准确地说，是一种媒体行为。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如果某种文化中没有具有闪电般速度的传媒工具，如果烟雾信号仍是最有效的传播途径，那么这种文化就不会拥有“今日新闻”。如果没有媒体为新闻提供传播的形式，那么“今日新闻”就不会存在。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1]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有引用之嫌，我决不否认其中的联系（虽然很多值得尊敬的学者觉得否认和他的联系很时髦，但是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他们也许至今

1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强烈影响，著作有《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译注

仍然默默无闻)。30年前遇到麦克卢汉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研究生，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英语教授。那时我就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我也许应该补充一点，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像，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卡西尔曾说过：

>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1]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但是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路易斯·芒福德[2]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

1　卡西尔，《人论》，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铁锚丛书，1956，第43页。

2　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教师、建筑及城市规划评论家，其著作多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译注

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钟表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也就是说，钟表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之间进行对话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输家。也许摩西的“十诫”中还应该再加上一诫：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时间的机械。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也未作太多评论。但是，很明显，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一种关于智力、听众和后代的新认识，这些东西柏拉图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

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在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1]

柏拉图对于书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断现在已被人类学家所深刻理解，特别是如果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语言是复杂对话的唯一源泉时。人类学家知道书面文字不仅仅是话音的回声，这一点诺思洛普·弗莱也曾提到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是一流魔术师的把戏。在那些发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确有此神力。考虑到这些，那么埃及神话中把文字带给塔慕次国王的月神透特同时也是魔术之神，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提出上述的观点，是因为本书后面将讨论我们的民族怎样经历从文字魔术向电子魔术转换的巨大变化。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在学校里，老师非常正确地告诉我们，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

---

1 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227页。

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用的：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我们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明了和生动，而是更为复杂。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例如，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这些隐喻，我们确实要费些周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 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 12 世纪眼镜的发明和 20 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即使是显微镜这样不常用的仪器，也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寓意，这种寓意不是关于生物学的，而是关于心理学的。通过展示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显微镜提出了一个有关大脑结构的解释。

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当大脑的显微镜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除了来自某些工具所产生的隐喻之外，还有什么途径？我们说一个人有 126 的智商，又是怎么一回事？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们相信它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有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可以说明大脑情况的工具。确实，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有时我们

称自己的身体为“生物钟”，有时我们谈论自己的“遗传密码”，有时我们像看书一样阅读别人的脸，有时我们用表情传达自己的意图。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在这本书里我想展现给大家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关于媒介—隐喻的巨大变化，作为这个变化的结果，那些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话语的重要部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但是，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得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

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待电视的态度还不够严肃。因为，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的工具。要想严肃对待电视，我们必须谈一谈认识论，否则其他的任何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和本书有关的是认识论对于真理的定义以及这些定义的来源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在这里，我特别想证明，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我想讨论的是，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为了简单地说明本章标题的含义，我觉得有必要从诺思洛普·弗莱那里借用一个词。他把自己运用的原理称作“共鸣”。他写道：“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1] 他举“愤怒的葡萄”[2] 为例。这个表达方式第一次出现是在《以赛亚书》中，人们庆祝即将到来的对于易得迈人[3] 的屠杀。但是这个词组，弗莱继续写道：“早已超越了这个语境并且进入了很多新的语境，这些新的语境赋予人类尊严，而不是仅仅反思它的盲从。”[4] 通过这样的阐述，弗莱把“共鸣”的概念扩展到词组和句子以外。戏剧或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比如哈姆雷特，或卡罗尔笔下的爱丽斯，也可以有共鸣。他还说，东西可以有共鸣，国家也不例外：“希腊和以色列，这两个被割裂的国家，它们地理上的最小细节都会让我们良心不安，除非有一天它们出现在我们想像世界中的地图上，不论我们是否见过这两个国家。”[5]

1　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第217页。

2　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意指骚动的根源，愤怒和暴力的起因。典出《圣经·启示录》。——译注

3　易得迈人（Edomites），闪族人的一个部族。公元前12—前6世纪居住在死海东南边的区域，时常与希伯来人发生冲突。——译注

4、5　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第218页。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于是，雅典成为优秀文化的象征，哈姆雷特代表了犹豫不决的忧思，爱丽斯的漫游象征着在无意义的语义世界中寻求秩序。

我们暂且离开弗莱（相信他不会有意见），但他所用的“共鸣”这个词还会伴随我们。我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我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书面文字，但他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1] 如果出现了纠纷，控诉人就会来到部落首领的面前陈述自己的不满。由于没有书面的法律可以遵循，首领的任务就是从他满脑子的谚语和俗语中找出一句适合当时情形的话，并使控诉人双方都满意。这一切结束之后，所有各方都会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真理重见天日了。当然，你会意识到这也是耶稣和其他圣经人物的方法，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凭借语言的各种资源来发现和揭示真理，如各种记忆的手法、公式化的表达方式和寓言。正如沃尔特·翁格所指出的，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谚语和俗语不是什么偶一为之的手法。“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不断，它们构成思想自身的内容。没有它们，任何引申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这些表达方式之中。”[2]

---

1 翁格，《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的未来》，《通讯杂志》30：1（冬季刊，1980年），第201—202页。

2 翁格，《口语和读写能力》，纽约：麦休恩，1982，第35页。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谚语和俗语通常只用于解决孩子之间的矛盾。“东西在手，败一胜九”、“先来先得”、“欲速则不达”，这些语言形式可以用来解决孩子的小危机，但如果在决定“严肃”问题的法庭上使用就会显得荒唐了。如果法官问陪审团是否形成意见，而陪审团回答说“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甚至说“把现实事交给现世君主，把神的使命交给上帝”，你能想像会是什么情形吗？可能一瞬间法官会觉得很有趣，但如果陪审团不能马上提供一个“严肃”的语言形式，法官就可能会做出一个超长的判决。

法官、律师和被告都认为谚语或俗语不适合解决法律纠纷，正是在这一点上，媒介—隐喻关系把他们和部落首领区分开来。因为在以印刷物为主的法庭上，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和其他书面材料决定了寻求事实的方法，口述传统失去了共鸣——但不是全部。证词是口头的，因为人们认为口头表述比书面表述更能真实地反映证人的思想状况。确实，在许多法庭上，陪审员不允许记笔记，也不提供法官解释法律条文的书面材料。陪审员要听事实，而不是看。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事实的理解存在共鸣的冲突：一方面，人们仍然相信口头语言的威力尚存，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代表真理；另一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印刷文字。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不能容忍诗歌、谚语、俗语、寓言或任何其他代表人类口头智慧的表达方式。法律是立法者和法官制定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律师不需要聪明，他们只要了解案情就可以了。

另一个类似的矛盾是在大学里。在那里，共鸣的分布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仍然有一些传统是基于“口头语言是真理的重要载体”而保留下来，但大多数情况下，大学里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印刷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密切相关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博士生口试”中发生的一件事来作例子。这样的口试是大学里仍然流行的一种中世纪的仪式。我用**“中世纪”**这个词，指的是它的字面含义，因为在中世纪学生们经常接受口试，并且渐渐地人们认识到考生口头解释其作品

是一种必备的能力，于是这种传统被沿袭下来。当然，书面作品还是最重要的。

在我要说的这个例子中，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算是讲述事实的合法方式，被提上了一个很难实现的高度。一个考生在他的论文中写了一个脚注，想用来证明援引的出处，他写道："此系 1981 年 1 月 18 日在卢斯威尔特宾馆本调查者亲耳听见，当时有阿瑟·林杰曼和杰罗德·格诺斯在场。"这个援引引起了五个口试老师中四个老师的注意，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证明方式不妥，应该用著作或文章中的引文来代替。"你不是记者，"有一个教授说，"你要成为学者。"也许是因为该考生不知道有什么出版物可以证明他在卢斯威尔特宾馆中得到的信息，所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说当时有人在场，他们可以证明他引用部分的准确性；并且他还辩解道，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滔滔不绝之中，这个考生有些忘乎所以，他说他的论文中至少有 300 处从出版物中摘录的引文，考官们不可能一一对它们进行考证。他这样说，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可以相信印刷文字的引用，却不能相信口头引用的内容呢？

他得到的回答是：你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样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论文中称自己为"本调查者"而不是自己的名字。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而且，我们相信你一定更希望考试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说明证明你通过了考试(如果你通过的话)，而不是仅仅告诉你你通过了。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

除了表明将按照委员会的意见做出修改之外，该考生很明智地没有

再说什么。他真诚地希望如果自己能通过“口试”，委员会将提供一份书面文件予以证明。他确实通过了，并且适时地写上了合适的文字。

第三个关于媒介对于认识论影响的例子来自对伟大的苏格拉底的审判。在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苏格拉底向500人的陪审团道歉，说自己没有很好地准备发言。他告诉他的雅典兄弟他可能会结巴，希望他们不要因此打断他，他请求他们把他当作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并且承诺一定会不加任何修饰和技巧地告诉他们事实。这样的开场白当然是苏格拉底的特点，但这不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苏格拉底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雅典兄弟从来不认为修辞原则同表达事实的方式是互不相干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苏格拉底的请求中可以找到很多意趣，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修辞当作语言的一种装饰品——往往表现得矫饰、肤浅和多余。但对于发明修辞的人，对于那些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诡辩家及他们的后裔，修辞不仅仅是戏剧表现的一个机会，而且是组织证据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而也是交流事实的方式。[1]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请求中猜测出来），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假定，280个陪审员之所以投票宣判苏格拉底有罪，是因为他的态度同所陈述的事实不相吻合，而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我用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

1　翁格，《口语和读写能力》，第109页。

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确实，对于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他们之后的两千年里，科学事实都是通过对一系列不言自明的前提进行推理而发现和表述出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斯多德会相信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以及刮北风时怀孕的小孩更健康。亚里斯多德结过两次婚，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数一数两任夫人中任何一任的牙齿。至于他对于生孩子的见解，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用过任何问卷或者躲在别人的卧室里偷看。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庸俗而多余的，因为这不是用来验证事实的方法——推理逻辑的语言提供了一条更可靠的道路。

我们不必因此就嘲笑亚里斯多德的偏见，我们自己也不乏偏见，例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量对等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信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我们的很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当今的政客往往借助数字来陈述事实，否则就一无所能。例如，你能想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通过背诵一首诗歌，或者讲述在东圣路易斯的一次深夜漫步所发生的一切，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标准吗？甚至只是通过说出一串谚语和寓言，或者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俗语来这样做？背诵诗歌会被视为无聊，深夜漫步只是一件逸事，谚语或俗语简直就是幼稚。但是，这些语言形式确实能够说明经济关系以及其他的任何关系，而且为很多人所使用。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也许这是对的，但似乎还不足为证。我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决定用什么方式来揭示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的。我们一定都记得，伽利略只是说**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没有说**一切**的语言都是数学，甚至连描述大自然的特征时也不一定要使用数学语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

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

有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所以这会对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化产生健康的影响。我这样说不是想要宣扬认识论的相对论。我希望能让你们相信，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极力强调，任何讲述事实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眼见为实”作为一条认识论的公理，从来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话说为实”、“阅读为实”、“计算为实”、“推理为实”和“感觉为实”的重要性，随着文化中媒介的变化，也在跌宕起伏。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 3000 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虽然读这本书的人都了解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质，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你读这本书时**应达到什么要求，**就**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具体的定义。首先，你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如果你做

不到这一点（读这本书或其他书都一样），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就会被认为是运动功能亢进或是不守纪律，至少是有什么智力缺陷。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间的区别。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作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

在一个用铅字表达真理的文化里，能够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的话，就构成了智力的基本定义。在后面的两章中，我想告诉大家，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美国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以铅字为中心的文化。在更后面的章节里，我想证明，在 20 世纪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介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我不想过于简单地看待这个变化。这里，我想用三点来作个总结，并以此答复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提出的相反观点。

第一点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认

知能力的变化。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或类似的观点（例如杰罗姆·布鲁纳、杰克·古迪、沃尔特·翁格、马歇尔·麦克卢汉、朱利安·杰恩斯和艾瑞克·哈乌洛克[1]）。我很愿意认为他们是对的，但我的观点不需要我这样做。所以，我不想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我的观点仅仅是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我想再次说明，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相对论者，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第二点是，我提出的认识论变化还没有包括（也许永远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一些旧的媒介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如象形文字和装饰华美的手稿），与它们相关的规则和认知习惯也随之消失了，但其他形式的对话还将保留下来，如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所以，像电视这样的新媒介产生的认识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考虑会有所帮助：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

1　杰罗姆·布鲁纳在《认知成长的研究》中写道，成长“既是从外到里的，也是从里到外的”，“(认知成长的) 很大一部分在于人获得肌肉运动、感觉和反射的能力” (第1—2页)。
古迪在《野蛮人的驯化》中写道：“(书写) 改变了那些不能阅读的人对于世界的表象。”他还写道：“字母的存在改变了人们要处理的问题的类型，并且改变了人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 (第110页)

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我们不否认，现在仍有读者，仍有许多书在出版，但是书和阅读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曾经被认为铅字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存在下去。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以及那个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河的影子。

第三点是，我上面打的比方中，河流主要是指公众话语——对话所采用的政治、宗教、信息和商业的形式。我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首先，我不断提醒自己，电视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我也意识到电视在为大众提供一个电影院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有人提出，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对于这些好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之所以不愿被人误解为是在攻击电视，还有一个原因。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很显然，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明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景况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来自迈克尔·威尔法尔的精彩引语。此人是德美浸礼会教派的创始人之一，与富兰克林相交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宗教派别的狂热分子四处散布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谣言，指责他们宣扬令人发指的教义，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的。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认为这样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威尔法尔答复说，他的教友们曾经讨论过这样的做法，但是最终还是加以否决了。他用以下的这段话解释了他们的理由：

> 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初，上帝以启蒙人智为乐，他让我们意识到，有些我们尊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有些我们斥为谬误的却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时地为我们拨去迷雾，使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原则，改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满足。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达到了发展的终极，是否达到了精神知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裹足不前，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那么我们的

> 后人会效仿我们，认为我们——他们的前辈和创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丝毫背离的。[1]

富兰克林认为他们的这种谦逊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见的。我们当然可以用“谦逊”二字形容他们的态度，但这段话的意义远胜于此。它对于书面文字的认识论的批评可以同柏拉图的观点相媲美。摩西本人也许也会对这段话产生兴趣，虽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认为，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讨论结果的记录未能传之于世，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否则本书的观点——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将更为彰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利坚人质疑铅字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因为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不管人们对于那些新英格兰的新居民们有过怎样的评述，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热诚而优秀的读者，他们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深深植根于印刷品这个媒介。

我们知道，随“五月花”号[2]进入美洲的行李中有几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圣经》和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我们可以猜想，对于驶向未知世界的移民们来说，后者得到的重视会更多。）我们也知道，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 10 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虽然当时的文化普及率很难估计，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多来自签名），在 1640 年到 1700 年之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 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

1　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纽约：麦克纳姆出版社，1968，第175页。

2　“五月花”号，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译注

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1]（在 1681 年到 1697 年之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 62%。[2]）

不难理解，《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当然，耶稣的教义也可能是通过《圣经》以外的书得到推广的，例如 1640 年印刷的著名的《海湾州圣歌》，在当时该书被视为美洲的第一畅销书。但我们也不能认定这些人只读宗教书籍，那个时期的遗嘱记录表明，在 1654 年到 1699 年之间，米德尔塞克斯县 60%的家庭拥有藏书，其中 92%的家庭拥有《圣经》以外的书。[3]事实上，在 1682 年到 1685 年之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 3421 册书，其中大多数都是非宗教书籍。如果有人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些书仅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 75000 个居民的需求量，那么 3421 册书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更清楚了。[4]放在现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该是上千万册了。

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迷。第一，既然 17 世纪英国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 40%，我们可以猜测，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5]换句话说，他们热爱读书，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读书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过去一样。第二，1650 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6]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当

1、2、3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页。

4　同上，第15页。

5、6　洛克里奇，《早期美国的读写教育，1650—1800》，选自《西部的读写教育和社会发展》，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第184页。

然，推行教育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从下面这首流行于17世纪的小诗可以略见一斑：

> 公立学校是知识的源泉，
> 学习是人们神圣的权利。[1]

真正统治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关于这个变化，路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2]）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他们的故乡——英国，就是一个学校之国。1660年以前，英国有444所学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3]）很明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地方（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汉普希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1736年，书商们大事宣传《旁观者》、《闲谈者》和斯梯尔的《卫报》。1738年出现了关于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和德莱顿《寓言》的广告。[4]耶鲁大学校长德怀特曾精辟地描写过当时美洲的情况：

1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第47页。

2　芒福德，《技艺与文明》，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34，第136页。

3　斯通，《英国的教育革命：1500—1640》，《过去和现在》第28期（1964年7月），第42页。

4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第31页。

> 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有人为我们写就。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和大英帝国的人说着同一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时候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和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书籍，艺术类、科学类以及文学类的书籍，这些书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1]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2]到1772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3]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前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4]。如果是在1985年，那么一本书必须卖掉800万册（两个月之内）才能比得上当时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们再看一看1776年3月的情况，霍华德·法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更让人叹服的数字："没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册，最保守的数字是30万册，也有人说是50万册。如果说当时300万人口需要印刷40万册书，那么今天的一本书需要卖掉2400万册才能比得上。"[5]在今天的美国，唯一能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力的

1、2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经历》，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15页。

3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第39页。

4 同上，第45页。

5 法斯特，《人权导读》，第10页。

传媒活动大概只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稍稍停顿一下，来谈谈托马斯·潘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个时代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虽然他出身低微，但他从来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被人质疑过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确实，我们对潘恩生平的了解要多于莎士比亚（虽然对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规教育远不如莎士比亚。在来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尽管有这样的不利条件，但是他的关于政治哲学和辩证法的著作观点明确，生命力经久不衰，丝毫不输（数量上也许不如）伏尔泰、罗素和包括柏克在内的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穷人阶级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胸衣制造商怎么可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时候，潘恩的教育背景会成为其敌人的攻击目标（他本人也因为这个缺陷而感到自卑），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强有力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人。

我们也应该提一下，潘恩影响力最大的这本书的全名是《常识——一个英国人所著》。这个副标题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人没有写过什么书，关于这一点，富兰克林解释说是因为美洲人忙于其他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并没有影响他们利用印刷机，甚至是为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写的书而利用印刷机。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机诞生在 1638 年，属于当时只有两年历史的哈佛大学。[1] 之后不久，在没有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帮助下，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机。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因为那时在利物浦、伯明翰以及其他英国城市都不允许使用印刷机。[2] 最早的印刷机用于印刷时事通讯，通常都是用廉价的纸张。也许我们可以说，美洲文

1　这台印刷机不是美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台印刷机。西班牙人在此100年前已经在墨西哥建立了一个印刷厂。

2　莫特，《美国新闻：260年来美国报纸的历史，1690—1950年》，纽约：麦克米兰，1950，第7页。

学的滞后不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或英国文学的广泛流行，而是因为缺少优质的纸张。到了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还不得不用难看的纸片给他的将领们写信，他的急件甚至连信封都没有，因为纸实在是太宝贵了。[1]

但是到了17世纪末期，一种本土文学开始起步，这也同美洲文化对印刷术的偏爱不无关系。这里的文学当然指的是报纸。本杰明·哈里斯于1690年9月5日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共三页的报纸，名叫《国内外要闻》。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涉足报纸。在哈里斯来美洲之前，他参与“揭露”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有关天主教徒屠杀新教教徒并纵火伦敦的阴谋。他在伦敦的报纸《伦敦邮报》上揭露了“教皇的阴谋”，结果天主教徒受到残酷的迫害。[2]哈里斯对于谎言已是司空见惯，他在《国内外要闻》的内容说明中提到，报纸对于抗击盛行于波士顿的谎言是非常必要的。他用以下的话作为内容说明的总结：“喜欢我这个提议的人可能会因此承担罪名。”哈里斯的这种猜测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期的《国内外要闻》再也没有面世。市长和市议会查禁了他的报纸，并且指责他发表了“非常偏激的言论”。[3]他们的这种反应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容忍任何人成为他们的障碍。就这样，在美洲这个新的世界里人们开始了争取信息自由的斗争，而这样的斗争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

哈里斯的失败激励了其他人对于报纸的尝试：《波士顿新闻信札》出版于1704年，它被认为是第一份连续发行的美洲报纸。在此之后，《波士顿报》（1719年）和《新英格兰报》（1721年）相继问世，它们的编辑詹姆士·富兰克林是本杰明的哥哥。在1730年之前，有7种报纸定期在4个殖民地出版，1800年前，报纸的数目上升到180种。1770年，《纽约报》用下面的这段话（节选）来庆祝自己和其他报纸的成功：

---

1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经历》，第320页。

2 同上，第9页。

3 李，《美国新闻史》，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17，第10页。

这是事实（让我们向大学表示敬意）
报纸是知识的源泉，
是现代人每一次对话的灵感来源。[1]

到了 18 世纪末，塞缪尔·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于英国三分之二的报纸，而人口只占英国的一半。[2]

1786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评论道，美国人醉心于报纸和小册子，以至于没有时间来看书。（有一本书是个例外，那就是韦伯斯特的《美国拼写课本》，此书在 1783 年到 1843 年之间销售了 2400 万册。）[3] 富兰克林所说的“小册子”，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伴随报纸在各殖民地广泛传播的还有各种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 1835 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后消失。”[4] 下面这段话中他也提到报纸和小册子：“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5]

在托克维尔发表这番议论的时候，印刷术已经传播到了美国的各个地区。南方和北方相比，不但在办学方面落后（南方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私立的），而且在使用印刷机方面也晚了一步。例如，弗吉尼亚州一直到 1736 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弗吉尼亚报》。但是到了 18 世纪末，通过铅字传播思想的运动蓬勃发展，很快成为一

1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经历》，第326页。

2　同上，第327页。

3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第27页。

4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58页。

5　同上，第5—6页。

次全国范围的对话。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士·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全部用“帕布利厄斯”的化名）写了85篇支持美国宪法的文章，1787年至1788年期间，这些文章原本只是出现在纽约的报纸上，但后来在南方人中的影响完全不逊于在北方。

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之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1]那些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2]由于国会在1851年降低了邮费，因而几分钱一张的报纸、杂志、星期天学校手册和简装书唾手可得。在1836年到1890年之间，1.07亿册《麦加菲读本》被分发到各个学校。[3]虽然当时并不提倡阅读小说，美国人仍然表现得如饥似渴。塞缪尔·古德里奇就沃尔特·司各特1814年到1832年之间发表的小说写过这样一段话：“他笔下诞生的任何一部新作在美国产生的轰动更胜于拿破仑的某些战役……每个人都在读他的小说，不论是名人雅士抑或凡夫俗子。”[4]出版商为了得到某些潜在的畅销书，有时甚至会派信使去等候邮船，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布尔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说印刷装订成书”。[5]那时还没有国际版权法，“盗版”书四处泛滥，大众对此绝无微词，那些被视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崇拜相媲美。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无法向你形容我所受到的欢迎，人群四处追随着、欢呼着，各种富丽堂皇的舞会和酒会，各种公众人物左右相

---

1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第86页。

2 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54—355页。

3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第102页。

4 同上，第74页。

5 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第337页。

随，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个国王或皇帝有过这样的待遇……如果我乘着马车，人群就会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院，所有的人都会起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1]美国的本土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瞩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马车被人围住，那绝对不是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还是发行了 30.5 万千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 400 万册。

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不是唯一惊叹于美国印刷业的外国客人。19 世纪中，很多英国人来到美国想亲自看看殖民地的变化，这里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他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

同时，他们还为另一个现象所叹服，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这些演讲厅里，程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很多这样的演讲厅起源于“学园运动”——一种成人教育形式。据说这个运动是由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夫发起的，其目的是传播知识、推行普通学校、设立图书馆以及建立演讲厅。1835 年前，在美国的 15 个州中有 3000 多个演讲厅，[3]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 1840 年，一些边远地区，如衣阿华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巴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 1835 年写了一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4]他说，“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5]巴恩的同乡 J.F.W.约翰森在史密森学会听过讲座，他“发现演讲厅里通常有 1200 到 1500 人”。[6]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如亨利·沃德·比彻、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和 R.W.爱默生（他的演讲报酬是 50 元）。[7]马克·吐

1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02页。

2　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第183页。

3、7　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第356页。

4、5、6　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第158页。

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1868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1]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250元，在城市里则要提高到400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2]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3]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斯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4]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

---

1 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纽约：哈普兄弟出版社，1959，第161页。

2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i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在美国政治历史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弗逊民主主义的平等的、民众的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译注

3 霍夫斯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理智主义》，纽约：阿尔弗莱德·A.瑙普夫，1964，第145页。

4 同上，第19页。

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1] 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满"关于神性的客观分析，并希望将这种神性通过自然和自然法规揭示给人类"。[2] 即使在信仰复兴运动向自然神论者的这种冷静分析提出了挑战时，充满激情的布道者仍然还是使用一种能轻易转换成书面语言的演讲术。在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从 1739 年开始，他在美洲各地广为传道。在费城，面对上万名听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拒绝了耶稣，他们将身陷永久的地狱之火。这番话令众人惊恐不已。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耳聆听过怀特菲尔德的演讲，他随即决定成为其出版人。很快，怀特菲尔德的日记和布道词便由费城的富兰克林出版了。[3]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

1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260页。

2　约翰C·米勒，《第一个开拓者：殖民地美国的生活》，纽约：戴尔，1966，第269页。

3　同上，第271页。

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1]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第150页。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人的历次辩论中算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誓不罢休。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1]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

1　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1908，第4页。

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 3 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我们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男人，在斯普林菲尔德持续了几天的一次集市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在院子里作关于‘妇女在当今进步运动中的影响’的演讲”。[1]）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依赖集市或特别场合来满足自己对于演讲的需要。“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2] 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 7 个小时的演讲？或者 5 个小时？甚至 3

---

1 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第11页。

2 同上，第87页。

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在奥托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包括了三个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决议，这三个决议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他引用了他在另一个场合进行演讲的书面稿。虽然林肯的语言风格一向以简约著称，但在这些同道格拉斯进行的辩论中，他的句子结构却是复杂而微妙的，丝毫不亚于他的对手。在伊利诺伊州的弗里波特进行的第二场辩论中，林肯用以下这段话向道格拉斯作答：

> 你们很容易意识到，我不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涵盖一个像道格拉斯法官这样的能人在一个半小时里讲到的所有方面；所以，如果有什么是他已经提到的，你们也想听听我的看法，而我却未作任何评论，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要我充分评论他的所有观点是不可能的。[1]

很难想像，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听众们对于辩论内容显然有着充分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在奥托瓦，道格拉斯一下子抛给林肯七个问题，如果听众不熟悉其中的背景，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意义。这些背景包括斯科特案判决[2]、道格拉斯和布坎南总统的争吵、部分民主派

1　有人质疑这些辩论文字稿的准确性。罗伯特·黑特逐字报道了这些辩论，有人指责他修改了林肯辩论中的“用词不当”。当然，说这些话的肯定是林肯的政敌，他们因为林肯表现出来的超人感染力深感不安。黑特竭力否认他曾修改过林肯的演讲稿。

2　指美国黑奴斯科特向州法院要求自由人身份，结果败诉。——译注

人士的不满、废除黑奴制度的纲领以及林肯关于“分裂的房子”[1]的著名演讲。在后来回答道格拉斯的问题时，关于什么是他“有责任”倡导的、什么是他真正相信的，林肯作了非常微妙的区分。如果他不能确认听众明白他的目的，他是不会作此尝试的。最后，即使两人都到了开始使用简单吵架用语的地步（如对骂和攻击对方），他们仍然不忘利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的隐喻、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 1858 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大错特错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下来的），小贩叫卖他们的商品，孩子们奔跑嬉闹，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正如温思罗普·哈德孙指出的，即使是循道宗信徒举办的野营集会也把野餐和听演讲结合起来。[2]确实，大多数野营营地最初都是为了宗教目的而设立的——纽约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新泽西州的海洋树林、密歇根州的海湾之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朱纳路斯卡，但后来都被改为会议中心，用于教育和开发民智。换句话说，作为复杂论证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公众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方式。

要了解那些聆听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听众，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人都是启蒙运动者的孙子和孙女。他们是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和汤姆·潘恩的后裔，是被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称为“理性王国”的 18 世纪美国的继承者。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些人中也有边远地区的居民，他

---

1 指南方和北方在黑奴问题上的分歧，林肯借“分裂的房子”暗喻国家所处的危险状态。——译注

2 哈德孙，《美国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瑞伯纳家族，1965，第5页。

们有的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有的是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我们也应该承认，到1858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王国的时代，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一直到20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的。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中期。1858年，艾德温·马卡姆[1] 6岁，马克·吐温23岁，艾米丽·狄更生[2] 28岁，惠特曼[3]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4] 39岁，梭罗[5] 41岁，麦尔维尔[6] 39岁，惠蒂尔[7]和朗费罗[8] 51岁，霍桑[9]和爱默生[10]分别是54岁和55岁，爱伦·坡[11]则已经辞世9年了。

我选择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作为本章的开头，不仅因为他们是19世纪中叶政治话语的杰出典范，同时也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讲。在那种喧闹的社交场所，除了语言，演讲者无所奉献，听众无所期盼；而且，那种语言完全是书面语的风格。对于那些读过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道格拉斯在开始演讲前作了下面这番介绍，很能代表他后来演讲的风格：

>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出现在你们面前，是为了讨论几个困扰

1　艾德温·马卡姆 (Edwin Markham，1852—1940)，美国诗人。——译注

2　艾米丽·狄更生（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女诗人。——译注

3　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译注

4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 Lowell，1819—1891），美国诗人，评论家，外交家。——译注

5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译注

6　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作家。——译注

7　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07—1892），美国诗人。——译注

8　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 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译注

9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小说家。——译注

10　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译注

11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作家，文艺评论家。——译注

> 民众思想的政治问题。根据我和林肯先生的安排，作为两个重要政党的代表，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两党存在分歧的问题进行一次联合讨论。今天到场的听众如此之多，证明这些问题确实是和民众息息相关的。[1]

这样的语言完全是书面语，即使是用于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从如今已经无法和铅字产生强烈共鸣的人们来看，用耳朵加工如此复杂的信息实在令人叹服。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要批评他的听众，他说他需要的是听众的理解而不是激情，他的听众应该是沉思默想的读者，而他的演讲就是他们进行思考的文章。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书面形式的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意？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怪，但是，既然我要在下文中论证当今话语中意义的丧失，我不妨多费些笔墨先说几句。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也许这个想法平淡无奇，这个事实毫不相干，这个观点漏洞百出，但是只要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义。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例外，但如果要写下一个英语句子却不想表达任何意义，那是很困

---

1 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第86页。

难的。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除非这些句子的作者是具有超凡诗歌才能的人。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流行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从 16 世纪的伊拉斯谟[1]到 20 世纪的伊利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格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

1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译注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我并不是说在书面文字存在之前分析思维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所指的不是个人的潜力，而是一种文化气质的倾向。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

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到了18世纪，科学——对知识进行分析管理的典范，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理性而开明的经济生活制度，宗教迷信遭到猛烈攻击，王权的神圣受到挑战，人们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的进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也许下面这段选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自传的文字能够代表印刷术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 我父亲完全信任人自身的影响力，他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读书识字，如果人们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自由地了解各种观点，如果通过投票人们可以指定一个立法机关来执行他们所接受的观点，那么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2]

---

1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2 穆勒，《自传和其他作品》，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69，第64页。

当然，这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愿望。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印刷术从来没有让理性如此彻底地出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不难证明，18 和 19 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

让我们用宗教话语为例来加以论证。18 世纪的宗教信徒们深受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新的世界让人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意味着，除了理性，没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为不信教者指点迷津。“在这里自然神论大有用武之地，”埃兹拉·斯蒂尔斯 1783 年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这样说，“无神论者无须抱怨受到任何武器的威胁，他们面对的只有温和而有力的论点和事实。”[1]

且不说这些无神论者，我们知道自然神论者确实是生逢其时了。美国的前四任总统可能都是自然神论者。杰弗逊当然是不信耶稣的，他担任总统的时候，写过不同版本的四本福音书，其中绝口不提那些“奇妙”的故事，只保留了耶稣教义的伦理内容。相传杰弗逊当选总统后，年老的妇女含泪藏起了她们的《圣经》。如此说来，如果托马斯·潘恩当选总统或成为政府什么其他高官，这些妇人要作如何反应就很难想像了。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大力抨击《圣经》和后来的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耶稣，潘恩承认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亲切和蔼的人，但那些关于他神性的故事却被潘恩斥为荒诞不经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利和利益而建立的。”[2]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直到今天，美国的历史课本对此仍态度暧昧）。埃兹拉·斯蒂尔斯没有说过

1　哈德孙，《美国的宗教》，第110页。

2　潘恩，《理性时代》，纽约：彼得·艾克勒出版公司，1919，第6页。

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是受人爱戴的：只有让理性作为陪审团时，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开放的法庭上拥有发言权。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燃起的热情，自然神论者的斗争成了一次全民的运动。他们攻击教堂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批评宗教迷信是理性的敌人。[1] 当然，教堂奋起反击，在自然神论者失去吸引力之后，他们开始内部争斗。到十八世纪中期，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和威廉姆·坦南特在长老会教友中领导了一次宗教奋兴运动。在他们之后有三个伟大人物参与了美国的“大觉醒运动”，他们是乔纳森·爱德华兹[2]、约翰·怀特菲尔德和后来19世纪的查尔斯·芬尼。

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传教者，他们的影响达到了理性无法控制的意识领域。据说，怀特菲尔德只要说出“美索不达米亚”这几个字，就会让他的听众泪流满面。这也许就如亨利·考斯威尔1839年所写的：“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3]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和19世纪奋兴运动倡导者和传统教堂为不同教义的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和书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比利·格雷厄姆或其他电视上的福音奋兴派人士当作当今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或查尔斯·芬尼，那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富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他对神学的贡献几乎一样重要。他潜心学术，常常每天在书房里呆上很长时间。他从不即兴向听众发言，他总是**朗读**他的布道词，他对神学教义的论述观点明确、逻辑严密。[4] 听众可能会被爱德华兹的语言感动，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理解其意义。爱德华兹的名声源自他1737年出版的《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

---

1 哈德孙，《美国的宗教》，第132页。

2 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美国基督教清教派最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3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第15页。

4 哈德孙，《美国的宗教》，第65页。

魂之忠实记录》。他后来于1746年出版的《信仰的激情》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

和今天“大觉醒运动”的重要人物不同的是，昔日美国奋兴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学养精深之人，他们崇尚理性，具有不凡的辩论天赋。他们与宗教组织的争论不仅涉及神学和意识的本质，同时也涉及宗教的启示。例如，芬尼绝不是其对手有时贬称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乡巴佬”[1]，他接受过律师的训练，写过一本关于系统神学的重要著作，后来还成为奥伯林大学的教授和校长。

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在18世纪是通过论述严谨的说理进行的，到了19世纪则是利用建立大学作为解决矛盾的应急手段。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美国的教堂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哈佛大学是为了给基督教公理会培养教士而于1636年创办的。65年后，当公理会内部为教义争论不休时，耶鲁大学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纠正哈佛大学的松散风气（但到了今天，它自己也难免这样的弊端）。公理会这种重视知识的努力得到了其他教派的效仿，尤其是他们创办大学的热情。长老会创办了田纳西大学（1784年）、华盛顿和杰弗逊大学（1802年）和拉斐德大学（1826年）。浸礼会创办了高格特大学（181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1821年）、福尔曼大学（1826年）、登尼森大学（1832年）和维克福雷斯特大学（1834年）。新教圣公会创办了何巴特大学（1822年）、三圣一大学（1823年）和肯因大学（1824年）。循道宗教在1830年至1851年之间创办了8所大学，包括卫斯里安大学、埃莫利大学和德鲍大学。除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公理会还创办了威廉姆斯大学（1793年）、米都柏利大学（1800年）、阿姆赫斯特大学（1821年）和奥伯林大学（1833年）。

如果说这种对于文化和学识的痴迷是一种“精神病的形式”，就像考斯威尔在评论美国宗教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就让这种精神病更多一些吧。

1　哈德孙，《美国的宗教》，第143页。

在18和19世纪，美国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被一种质朴、博学的话语形式统治着，而这正是今天的宗教生活所缺少的。要想找出过去和现代公众话语形式的不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乔纳森·爱德华兹同当今杰瑞·法威尔、比利·格雷厄姆或奥拉尔·罗伯茨之流的神学观点进行对比。要想理解爱德华兹的神学观点，人们必须开启智力；但是，如果当今电视新教徒们也有什么神学观点的话，恐怕他们还未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法律系统，也同样会发现，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和以电视为基础的文化中，话语特征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中，律师往往受过良好教育，相信理性，擅长论证。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如阿历克西斯·托克维尔所说的，律师这个职业代表了“脑力劳动的一个特权团体”。一些律师被奉为民间英雄，如亚拉巴马州的普兰提斯，或伊利诺伊州“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而当今电视里出庭律师的表演根本无法同林肯操纵陪审团的机智表现相比。美国法律界的大牌人物，如约翰·马歇尔、约瑟夫·斯托瑞、詹姆斯·肯特、大卫·霍夫曼、威廉姆·维尔特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都是崇尚理性、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典范。他们认为，虽然民主有种种的好处，但它无疑形成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们希望在美国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1]基于这样崇高的理想，他们相信，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行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开明的行业。著名的法学教授约伯·泰森提出，一个律师应该熟悉塞涅卡[2]、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著作。[3]乔治·沙斯伍德也许是预见到了20世纪法律教育的衰落，早在1854年就指出，单纯阅读法律书籍有

---

1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第119页。

2 塞涅卡 (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晚期斯多葛派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3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第140页。

害大脑，“如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就会丧失对事物进行宏观全面认识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里也一样”。[1]

美国及各州都有一部明文的宪法，法律条文的制定非常明确严格，这更要求法律界人士必须具有开明、理性和清晰的头脑。律师需要具备超过常人的读写能力，因为理性思维是判断法律事宜的主要依据。约翰·马歇尔无疑是“理性思维的杰出典范，是和纳蒂·班波[2]一样家喻户晓的代表人物”[3]。他是印刷术时代的优秀代表——冷静、理智、崇尚逻辑、憎恶自相矛盾。据说，他在阐明观点的时候从不运用类比，而是用“我们已经确定……”来开始他的论述。一旦你承认了他的前提，你也只好接受他的结论了。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早期的美国人不仅熟知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法律事件，甚至还熟悉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时使用的语言。丹尼尔·韦伯斯特就是一个例子。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中选择了丹尼尔·韦伯斯特来和魔鬼辩论，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魔鬼怎么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具有非凡语言能力的人呢？下面是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瑞对韦伯斯特语言特点的描述：

> ……他措辞简洁明确，涉猎广泛，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旁征博引；他分析透彻，敢于解决难题；对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他善于化繁为简并用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解决；他擅长归纳，常常利用对手的论述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理智慎重，从不因为忘形而在辩论中处于被动之地，或是为了无用的观点而浪费口舌。[4]

1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第140—141页。

2　纳蒂·班波 (Natty Bumppo)，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珀小说中的主人公，代表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形象。—译注

3　同1，第120页。

4　同上，第153页。

我全文引用了这段话，是因为它对19世纪深受铅字影响的人所形成的话语特征作了最好的描写。詹姆斯·穆勒对于印刷术所能创造的奇迹有过种种预测，而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心中的理想和典范了。如果说这样的典范有些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成为律师们奋斗的理想。

这个理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律师或牧师行业。即使在我们日常的商业社会里，印刷术产生的共鸣也随处可以感觉得到。如果我们可以把广告作为商业的发言人，那么其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8和19世纪，那些有商品出售的人绝对是把每个顾客都当成了丹尼尔·韦伯斯特：他们以为那些潜在的顾客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都能做出理性的分析。确实，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法兰克·普瑞斯布利在其经典著作《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中，讨论了印刷术的衰落，他把印刷术的衰亡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把这个阶段之前的时期称作排印技术的“黑暗年代”。[1]他所指的“黑暗年代”开始于1704年，那一年美国的《波士顿新闻信札》上第一次出现了付费广告。当时共有3个广告，占了报纸一栏的4英寸。其中一个是为抓小偷悬赏；另一个是为找回被不知名者“占用”的铁砧悬赏；第三个广告是想卖什么东西，但和我们今天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房地产广告毫无相似之处：

> 在纽约长岛的牡蛎湾，有一个很好的漂洗作坊，可供出租或出售。此处亦可作为农场，有一新造的砖石房屋，旁边有另一房子可作厨房和作坊，有粮仓、马厩、果园和20亩空地。作坊可以单独出让或和农场一起出让。有意者可向纽约的威廉姆·布赖德福特·普林特询问详情。[2]

1、2 普瑞斯布利，《广告的历史和发展》，纽约花园城：达伯戴，多兰出版公司，1929，第244页。

150 多年之后，广告的形式变化不大。例如，在布赖德福特先生为牡蛎湾的房产作广告 64 年之后，保罗·瑞威尔在《波士顿报》上刊登了下面这则广告：

> 很多人不幸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失去了他们的门牙，不仅在外观上不够美观，公共场合和私下讲话也多有不便：特此告知所有这些人，他们可以安装假牙，效果保证和真牙一样好。有意者请联系波士顿戈德史密斯的保罗·瑞威尔，靠近克拉克医生码头的尽头。[1]

在另一段广告里，瑞威尔继续写道，那些由约翰·贝克补的牙，或是那些补过的牙仍然松动的，可以到他那里加固。他透露，他的补牙技术师承约翰·贝克本人。

直到瑞威尔广告 100 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求的线形排版。[2] 直到 19 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即使在 1890 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是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斯蒂芬·道格拉斯[3] 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话就是：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实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19 世纪 90 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例如，19 世纪 90 年代的广告商开始在广告中运用口号。法兰克·普瑞斯布利认为现代广告的起源是这两句口号：“你按下按钮，剩下的我们来做”和“看见那头骆驼了吗？”[4]

1、2　普瑞斯布利，《广告的历史和发展》，纽约花园城：达伯戴，多兰出版公司，1929，第244页。

3　斯蒂芬·道格拉斯 (Stephen Douglas，1813—1861)，美国民主党领袖和演说家。毕生疯狂鼓吹美国扩张政策。——译注

4　骆驼牌香烟的广告。——译注

几乎在同时，广告短诗也开始被广为采用。1892 年，宝洁公司向社会征集短诗，作为象牙牌香皂的广告。1896 年，亨氏公司第一次采用了婴儿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宝宝坐在宝宝椅里，面前摆着一碗麦片粥，手里拿着调羹，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 和 19 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这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娱乐的文化和一个充满娱乐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农家小孩一手执书一手扶犁，母亲在周日的下午向家人大声朗读，商人宣读剪刀进货的通知——这些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阅读对于他们有一种神圣的因素，即使说不上神圣，至少也是一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每日一次或每周一次的仪式。我们还应该记住，那时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电，凭借烛光或煤油灯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那时的人们大多

只能在拂晓和开始工作前的那段时间进行阅读，所以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在 1790 年或 1830 年或 1860 年的人眼中，把阅读独立于其他活动而作为一种测试读者“理解能力”的手段，可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除了理解，阅读还有什么意义呢？据我们所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阅读问题”，当然，除了那些无法上学的人以外。上学就意味着学习阅读，因为如果不能阅读，你就不能加入到文化的对话中去。大多数人都能够阅读并且也参加了文化对话。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回顾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美国，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铅字的共鸣，尤其是它和各种公众表达方式之间的那种无法理清的关系。查尔斯·比尔德[1]说过，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宪法制定者的首要动机。这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制定这样的法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参加公众生活必须具备驾驭铅字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州的选举年龄定为 21 岁，为什么杰弗逊认为普及教育是美国最大希望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如阿兰·内文斯[2]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指出的，没有财产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选举，而没有文化的人却不行的原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3]在一本书中写道，激励美国人的是一种

1　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Beard，1874—1948)，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强调社会经济的冲突和变动对历史起推动作用。——译注

2　阿兰·内文斯 (Allan Nevins，1890—1971)，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和教育家。——译注

3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rick Jackson Jurner，1861—1932)，美国著名教师和学者。强调要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来阐明历史的真谛。——译注

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这也许没错。但同时，正如保罗·安德森所说的："不管读的是莎士比亚、爱默生或是梭罗，农家孩子一手执书一手扶犁绝不是摆摆样子的。"[1]使堪萨斯成为第一个允许妇女参加学校选举的州，或者，使怀俄明成为第一个实现完全平等选举权的州，光靠开拓精神是不够的。妇女也许比男子更擅长阅读，甚至在边远地区，公众话语的主要途径也是来源于铅字。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佩里·米勒说过，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为他们注入了能量，或者，如早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诞生于一种应运而生的理想。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对的，我无心质疑。我只想指出一点，他们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

1 何罗·安德森，《中西部的柏拉图主义》，宾西法尼亚：坦波尔大学出版社，1963，第17页。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引用托马斯·杰弗逊1787年1月15日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杰弗逊谴责英国人企图将美国人的发明占为己有：用简单的一块木头做出轮子。杰弗逊声称新泽西的农民从荷马的史诗中学会了怎样做轮子。英国人从美国人这里照搬了整个过程。杰弗逊写道："因为我们的农民是唯一能读懂荷马的农民。"

第五章　躲躲猫[1]的世界

到19世纪中期，两种观念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它们的结合大大冲击了“阐释时代”，为“娱乐业时代”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一个观念是很新的，另一个则是和古老的洞穴壁画一样有年头了。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讨论那个古老的观念。而那个新的观念是指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

19世纪的美国人非常关心怎样“征服”空间的问题。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边境线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基本铁路系统使得人和货物可以在全国范围流动。但是直到40年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说，只能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由于这种局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仍然只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一盘散沙，各个地区有自己不同的对话方式和利害

1　躲躲猫 (Peek-a-Boo)：一种面孔一隐一现以逗小孩的游戏。——译注

冲突，要想实现全美洲统一的对话还只是一个梦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电，这一点连小学生都知道。众望所归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美国人找到了把电用于通讯服务的有效方法，并由此一次性解决了空间的问题。当然，我指的是塞缪尔·F.B.莫尔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太空人”。他的电报消除了州际界线，消灭了地区概念，把整个美国纳入了同一个信息网络，从而使统一美国话语成为可能。

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莫尔斯预测电报将“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电报会产生其他的结果。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亨利·大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一个人，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1]

事实证明梭罗是完全正确的。他深知电报会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定义，电报不仅允许而且执意要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进行对话，并且还要求对话的内容与以往印刷术统治下的内容不同。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19 世纪 30 年代稍早于电报出现的小报，已经开始了把无聊素材奉为新闻的过程。这类报

---

1 梭罗，《瓦尔登湖》，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57，第36页。

纸，如本杰明·戴[1]的《纽约太阳报》和詹姆斯·贝内特[2]的《纽约先驱报》，背离了发表理性政治观点和紧急商业信息的传统，尽管他们的报纸充满了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大多是有关犯罪和性的内容。这些“具有人情味的新闻”虽然不能影响读者的决定和行动，但至少是事关当地的，是关于他们熟悉的人和地方的，这些故事往往不需要一定是最新的报道。小报上的这类故事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们的吸引力不在于其时效性，而在于其对于时间的超越。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刊登这样的内容，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它们提供的信息不仅要事关当地，而且还要具有实用功能——要同读者面临的问题和决定密切相关，并且能帮助他们处理个人和公共事务。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并且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的。莫尔斯进行第一次公开演示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于电报创造了超越时空的奇迹，当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新闻便失去了在报纸上的中心位置。报纸利用电报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莫尔斯公开演示电报功效的一天之后。《巴尔的摩爱国者》利用莫尔斯建立的华盛顿—巴尔的摩线路，为读者提供了众议院对俄勒冈事件所采取行动的报道。报纸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条消息：“……我们为读者提供的是截止到两点钟的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空间的隔阂已被彻底消除。”[3]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因为电报线路的紧张）使新闻保留了作为功能性信息的定义。但是美国出版商中那些具有远见的人很快看清了未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整个美洲大陆设立电报线路。威廉姆·斯温，《费城大众报》的拥有者，不仅大力投资磁性电报

1　本杰明·戴 (Benjamin Day,1810—1889)，美国印刷业者和新闻工作者，美国第一张“便士”报纸——《纽约太阳报》的创办人。——译注

2　詹姆斯·贝内特 (James Bennett,1795—1872)，对现代新闻事业卓有贡献的编辑。主张报纸的职能“不是教诲读者，而是使读者警觉”。——译注

3　哈娄，《老的路线和新的浪潮：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的历史》，纽约：艾波顿世纪，1936，第100页。

公司——第一个商业电报公司，而且还在1850年成了它的总裁。

不久之后，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纽约先驱报》的詹姆斯·贝内特声称，在1848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的报纸中包括了7.9万个字的电报内容[1]——至于这些内容和读者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说。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开辟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4年后，美联社成立了，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大多是阿德雷德公主得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和政治版本——开始成为所谓“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2]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或根本不关心的。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彼此之间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既然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

---

1 茨特罗姆，《媒体和美国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柴普西尔：北卡罗来纳出版社，1982，第15—16页。

2 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aleridge,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评论家。——译注

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

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它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于是，对于莫尔斯提出的问题——上帝创造了什么——我们有了一

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当然，上帝和这一切无关。但是，尽管电报有如此的力量，但是，如果它只是作为一种新的话语象征，那么印刷术文化很可能能够经得住它的冲击，至少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在莫尔斯重新定义信息的意义时，路易斯·达盖尔[1]重新定义了自然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说，重新定义了现实的意义。1838年，为了吸引投资者，达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2]

当然，不论是再现自然的必要性还是自然本身获得再生的力量，都意味着自然是可以被改造的，通过改造它可以变得容易理解和控制。早期洞穴壁画很可能是对尚未发生的捕猎的视觉表现，是期待征服自然的一种愿望。"改造自然"这种说法已经历史悠久了。但是达盖尔脑中并没有"改造"这个概念，他的本意是说摄影术能够使每个人都拥有随时尽情复制自然的能力。他想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克隆"技术，他还想说，摄影术和视觉经验的关系就像印刷机和书面文字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光靠达盖尔银版法还不能达到达盖尔讲的这种对等关系。威廉·亨利·福克斯·陶尔伯特，一个英国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发明了从底片翻出正片，直到这时，照片的大批量冲洗和发行才成为可能。[3]"摄影术"这个名称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F.W.赫歇尔起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在英语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也许赫歇尔起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大家都明白，摄影和书写（任何形式的语言）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的。

但是，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

1　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1789—1851），法国画家和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最早的实用摄影方法——达盖尔式照相法，使曝光时间从八小时缩短至二三十分钟。——译注

2　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斯特劳斯·法拉和吉路斯，1977，第165页。

3　纽豪，《从1839年至今摄影术的历史》，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64，第33页。

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正如“整个大自然”和“整个海洋”无法被拍摄下来一样，在照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的词汇。“表现”和“谈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加弗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1]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同之处，然后进行归类。在大自然里没有“人”或“树”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分类，有的只是变化多端和形形色色。照片记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照片中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片断，照片可以证明某个人在那里或发生了某事，但这样的证明却无法提供任何意见——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或者“本来可能怎样”。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照片没有认识倾向。苏珊·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2]但她又进一

1 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洛杉矶：爵西—巴斯，1979，第36页。

2 桑塔格，《论摄影》，第20页。

步论述，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真”“假”这样的表述只能出自语言的范畴。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这是真的吗？”只能表示“这是某时某地的真实再现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就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理由，因为不相信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然是荒唐的。照片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代表着确定无误的事实。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把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桑塔格女士写道：“所有的界限……似乎都是随意的。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断：重要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主题。”[1]她说明的是，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图像和文字功能不同，抽象程度不同，反映模式也不同。绘画至少比文字古老三倍，图像在交流中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到了19世纪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的“图像革命”。布尔斯廷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提醒众人注意到各种机械制作的图像对语言进行的猛烈攻击——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这些图像无可遏止地迅速蔓延于整个美国文化。我这里特意用了

1　桑塔格，《论摄影》，第20页。

“攻击”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布尔斯廷的“图像革命”中表达的深刻含义。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关于布尔斯廷对图像革命的暗示，我想在这里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从早期的广告牌、海报和广告到后来的所谓“新闻”杂志和报纸，如《生活》、《纽约每日镜报》和《每日新闻》，图片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就把它驱逐出境。到19世纪后期，广告商和新闻记者发现，一张照片不仅胜过1000个字，而且，如果从销售情况来看，好处更多。对于无数美国人来说，“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这些电报式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正好为这些奇怪的干巴巴条目提供了具体的图像，在那些陌生的名字旁附上一张张脸孔。这样，我们至少有这样一种错觉：“新闻”和我们的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些照片为“今日新闻”创造了一个表面的语境，而“今日新闻”反过来又为照片提供了语境。

但这种照片和新闻共同形成的语境其实纯属错觉。通过下面这个例子，你可能会更好地了解我的观点。你想像一下，一个陌生人告诉你，伊利克斯是一种蚓状植物的亚种，生活在爱尔多农杰斯岛上，长着有关节的叶子，每年开两次花。你可能会表现出很不屑的样子说：“是呀，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陌生人回答说：“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你可以看看。”然后他递给你一张照片，上面标明是“爱尔多农杰斯岛上的伊利克斯”。“哦，对，现在我明白了。”你可能会低声自语。确实，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这件事是完全独立的，和你过去的知识或未来的打算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那个陌生人的相遇开始于此，也结束于此，那么这个由句子和图片共同创造的语境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也许除了

以后要避开手拿照片的陌生人以外），伊利克斯将从你的脑海中消失，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至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闲聊的谈资或在填纵横字谜时多一个词汇，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说到纵横字谜，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报和照片成功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成没有语境的事实时，纵横字谜在美国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广播智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广受欢迎的“欢乐问答”[2]。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乐？在《图像》一书中，布尔斯廷认为图像革命的主要产物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用于被报道的事件，如记者招待会之类。我这里想说的是，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

当然，摄影术和电报并不是一锤击倒了印刷文化的大厦。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阐释的习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习惯统治着世纪之交的美国人的思想。事实上，20 世纪的前几十年也见证了语言和文学的辉煌时代。在《美国信使》和《纽约客》这样的杂志里，在福克纳[2]、

1　美国的一档电视娱乐问答节目。

2　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菲茨杰拉德[1]、斯坦贝克[2]和海明威的小说中，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这些大报的栏目中，所有的文字都散发出震撼人心的魅力，愉悦着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但这却是“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甜美。这预示着“阐释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它即将逝去的旋律下，一个新的音符已经响起，确定曲调的正是摄影术和电报。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电影，从本质上就具有这样的潜能。其他的媒介，如广播，比较倾向理性的话语，但在新的认识论的冲击之下也转而成为新认识论的俘虏。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

---

1 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a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属“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译注

2 斯坦贝克 (John Ernest Steirbeck,1902—1968)，美国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家万户。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视时代的第二代观众，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观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和杂志、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这里还有一个具讽刺意义的小例子：在过去数年中，我们了解到电脑是未来的技术。总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会使用电脑，我们便无法完成学业，继而会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也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电脑，就无法经营生意，无法列出购物单，无法把支票本保持整洁。但是，关于电脑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对于它的任何了解都来自电视。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奇迹；我们不再只把电视机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间里；我们不再怀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丢到了九霄云外。这个问

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像有人问耳朵和眼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一样。20 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的生态学（不仅包括其物质特征和象征符号，而且还包括我们和它的关系），如今在我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了。

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电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它已经彻底地融入了美国文化，我们已经注意不到电视机在黑暗中轻轻发出的嘶嘶声或摇曳着的灰色灯光。这些都证明，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建立起来的躲躲猫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本书后面的一个目标是要让电视认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我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 50 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所，结果发现他唯一的一盏台灯已经坏得无法再修了。一阵惊慌之后，他逐渐恢复了冷静。为了第二天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打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照亮书本的光源。

但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文字。我们都住过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机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地滚动出现有关当天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机的另一个用途——电子布告牌。

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老式落地电视机上可以放 30 本书，我认识的一个女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放在 21 英寸的威斯汀豪斯牌电视机上。这是电视机的第三个用途——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

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里有一个嘲笑这种幼稚想法的笑话：爱迪生本来可能把发明电灯的消息早一些公布于众，只可惜他每次打开灯后，只会把灯放在嘴边然后说："喂？喂？"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我们可以想像把印刷术专用于照片的复制，我们再想像一下，16世纪的天主教可能不会反对这种用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用路德[1]的话来说，如果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上帝

---

1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注

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来为他们释义了。但事实上，印刷术从来没有被专用于、或大量用于复制图像。从 15 世纪诞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作是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不会派这些用场。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没有全天 24 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为 10 万到 20 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1] 在过去若干年中，像《宝藏》、《碟中谍》、《星际旅行》、《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英国、日本、以色列和挪威受到欢迎的程度，

1　1984年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部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订合约，在中国播放64小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们很快还要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及美国广播公司签订合约。

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听说（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前，拉普人[1]为了看《达拉斯》中到底是谁杀了J.R.，竟然推迟了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9000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1 拉普人 (Lapps)，即萨阿米人 (Saamis)，从事放牧、养驯鹿，部分从事渔猎。——译注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佼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为了说明上面的观点，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广播公司1983年11月20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从今以后》播放之后进行的一次80分钟的讨论节目。虽然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记忆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但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首先，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其次，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瑞·法威尔神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

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基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利·威塞尔，[1]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目中，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萨根、威廉·巴克利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

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首先作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六位嘉宾每人有大约 5 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作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想对第一个发言的巴克利先生进行评论，那么在这两个先生的发言之间就会有四个评论，大约占 20 分钟，这样观众（不是威塞尔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记是什么论点激发了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嘉宾——大多数都是电视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评论别人的观点，他们利用节目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和后来每个人分内的发言时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或打动别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让观众因为他不再是他们的国务卿而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提醒每个人他写过的书、提出过的议案和主持过的谈判。麦克纳马拉先生首先告诉观众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国吃的午饭，然后他又说他有至少 15 个削减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会提到削减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对他在德国

---

1 埃利·威塞尔 (Elie Wiesel，1928—)，美国作家。由于在反对暴力镇压和种族歧视方面做出的贡献，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的午餐更感兴趣。（后来，他主动提到其中的3个提案，但这些提案都还没有时间讨论。）埃利·威塞尔通过引用一系列类似寓言和隽语的东西，强调指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表述有点混乱，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闯进了非犹太教的集会。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4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作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作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1]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1　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剧本为《等待戈多》，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萨根放弃了在做另一档节目中穿过的圆领套衫，他甚至还特意为出席这个节目修剪了头发。他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个地球说话的理性的科学家，保罗·纽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怀疑，也许里奥纳多·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非常得体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说话简洁干脆，态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国家安全捍卫者的模样。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对国际事务无所不知的政治家，时时担负着阻止灾难的责任。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在威廉·巴克利自己的节目《火线》中，有时会表现正在思考的人，当然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一定是正好对准他们的。还有其他一些节目，如《记者访谈》或《自由心灵》，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例如，40 年代早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角是一个口技表演者，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在“梅杰·鲍斯的爱好者时间”里听到踢踏舞演员的舞步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节目有一次还请来过一个哑剧演员。）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格雷格·萨科威茨教士是芝加哥的一个天主教神父，他的特点是把传教和摇滚音乐结合起来。据美联社报道，他既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圣灵教堂的副牧师，又是 WKQX 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他的节目《心灵旅途》中，萨科威茨神父用他轻柔的声音聊着有关家庭关系或忠诚的话题，并在布道的间隙播放“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他说他的传教不是用“教堂的方式”，他还补充说：“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圣帕特里克教堂，约翰·J.奥康纳神父在就任纽约大主教区大主教的仪式上戴着纽约扬基棒球队的帽子，并一直扮着鬼脸，他不时地插科打诨，其中有一个是特别针对爱德华·科克市长的。在后来的一次公开露面中，新任大主教又换上了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帽

子。这些画面当然都上了电视，而且很讨观众的欢心，主要的原因是奥康纳神父（现在已经是红衣大主教了）比萨科威茨教士更胜一筹：后者认为“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前者干脆就认为你根本不必虔诚。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爱德华·迪特里奇医生要给伯纳德·舒勒的心脏作三路分流手术。手术是成功的，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幸事。美国至少有50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讲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奇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

1984年WCBS电视台和WNBC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一个演讲稿的八大组成部分。提出这个建议的乔科·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事实上，亨德森先生并不是这个主意的发明人，真正的发明人是儿童电视工作室，他们的电视节目《芝麻街》通过成本昂贵的制作，试图证明教育和娱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亨德森先生有他的不同之处。《芝麻街》只是想证明学习阅读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轻松的娱乐，而宾夕法尼亚州学校的做法则是要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强奸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他们一出喜欢的午间肥皂剧。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定期播放一些不同严重程度的审判，包括谋杀，这些节目

---

1 这个故事被几家报纸同时刊登，其中包括1983年2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4版，第2页。

在人们眼里比电视剧里虚构的法庭戏更吸引人。这些节目播放的宗旨是为了“教育公众”，出于同样的目的，据说有人正在着手把忏悔也作为电视节目。这个被命名为“忏悔室里的秘密”的节目肯定会包含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建议父母们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 12 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 128 岁的答案，结果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着笑话，更是一点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1985 年 2 月 7 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路特格斯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查尔斯·派因教授被议会命名为“年度杰出教授”，以鼓励他在支持和发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解释他为何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时，派因教授说：“我有一些常用的把戏，如果我的板书已经到了黑板边缘，我会继续在墙上写，学生们总是会哄堂大笑。我展示玻璃分子怎样运动的方法是跑向一面墙，然后从墙上弹回来，跑向另一面墙。”他的学生也许还太年轻，没有看过詹姆斯·卡格尼在《胜利之歌》中关于“分子运动”的表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唐纳德·奥康纳在《雨中曲》中也模仿过这样的表演。但据我所知，用在教室里这是第二次：黑格尔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过辩证法。

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中的严紧派一直生活在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们的宗教反对膜拜图像，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允许看电影或拍照片的。但显然他们的宗教没有禁止他们观看其中有他们自己图像的电影。1984 年的夏天，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演职人员到达兰卡斯特镇拍摄电影《目击者》，这是一部关于一个侦探（哈里森·福特扮演）爱上一个严紧派女孩的故事。虽然当地的教会警告居民不要干涉电影的拍摄，但有些

焊工还是一做完手上的活就跑到拍片现场看热闹。一些虔诚的教徒躲在远处的草丛里，用望远镜看拍戏。一个严紧派妇女说："我们在报纸上了解这部电影的情况，孩子们还把哈里森的照片剪下来。"她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对哈里森本人感兴趣。有人告诉我们哈里森在《星球大战》中扮演过角色，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1]

1984年的冬天，《官方录像杂志》上出现了一幅整页的关于"创世记计划"的广告。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圣经》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最后的成果将被定名为"新媒介圣经"，由225小时的电影组成，耗资达2.5亿美元。曾执导过《周末狂热》和《油脂》的约翰·海曼是最热心于这个计划的导演之一，他说："我被《圣经》迷住了。"在《屋顶上的提琴手》中以扮演特维耶成名的以色列演员托波尔将扮演亚伯拉罕的角色。广告中没有提扮演上帝的候选人，但考虑到制片人的背景，有人说这个角色非约翰·特拉沃尔塔莫属。

耶鲁大学在1983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颁发了几个荣誉学位，其中有一个是颁给特丽莎嬷嬷[2]的。在她和其他几个人道主义者及学者接受学位时，观众的掌声热情但很节制，甚至透出一丝不耐烦，因为他们想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仍在后台等待露面的那个人。当主持人宣布她的杰出贡献时，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涌向台前，想要离那位伟大的女性近一点。在梅丽尔·斯特里普[3]的名字被宣读出来后，观众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足以吵醒纽黑文[4]的死人。一个出席过给鲍伯·霍普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人说，斯特里普博士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了霍普博士。因为深知如何取悦观众，耶鲁大学的领导人还邀请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

---

1 引自1984年6月7日的《纽约时报》，A版，第20页。

2 特丽莎嬷嬷 (Mother Teresa，1910—)，印度慈善工作者。曾先后获得印度尼赫鲁奖金、美国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奖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平奖金和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3 梅丽尔·斯特里普 (Meryl Streep，1949—)，美国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译注

4 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

威特为下一届典礼致开幕词。

在当今的所有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是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作一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里根总统在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他的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他的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1]

1　这首歌的原歌名是“*Theres'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本文作者将歌名改为“*Theres'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译注

第七章　“好……现在”

美国幽默家H.阿兰·史密斯曾经说过，在英语语言让人讨厌的词中，最可怕的是“呃噢”。想像一下，外科大夫看着你的X光片，紧锁着眉头说一声“呃噢”，你会是什么感觉？我想说的是，本章的题目“好……现在”也像“呃噢”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因为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们不会紧锁眉头，而是带着一种弱智者般的笑容。这个表达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评价它的话，是为我们的语法增添了一种词类，一种无法连接任何东西的连词，相反，它把一切都分割开来。它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公众话语支离破碎的一种象征。

“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更不要说是引人入胜的球

赛比分或预告自然灾害的天气预报了。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 45 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 90 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

“好……现在”这种世界观不是电视首创的，它是电报和摄影术媾和的产物，但却是通过电视才得到充分的滋养并逐渐成熟的。在电视上，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背景和情绪上都同前后的节目毫无关系。也许是因为电视节目的价码是根据分秒计算的，也许是因为电视使用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也许是因为为了让观众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观看，电视上的节目几乎每八分钟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

当然，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让人尴尬的方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

假设一下，如果你有机会为某个电视台制作一档电视新闻节目并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你会怎样着手呢？首先，你要选择演播人员，每个人都必须有一张“可爱”、“可靠”的脸。从那些应聘的人交来的特大光面照片中，你可以淘汰掉那些相貌不适合每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人。这意味着不漂亮的女人或 50 岁以上的女人、秃顶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那些鼻子太长两只眼睛靠得太紧的人都要被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你要做的是要集合一群会说话的时髦发型。至少，你不会选择那些在杂志封面上不受欢迎的脸。

克里斯廷·克拉夫特就有这样一张符合要求的脸，所以她应聘了堪萨斯市 KMBC 电视台的联合主持人职位。后来她以性别歧视的罪名把该电视台告上了法庭，据她的律师说，该电视台的管理层“喜欢克里斯廷的相貌”。她是 1981 年 1 月被聘用的，同年 8 月由于调查显示她的相貌

“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而被解聘。[1]“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和新闻又有什么关系？不论是对于电视新闻还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观众不喜欢看节目中的表演者。这句话还意味着观众不信任表演者，该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演员的表演让观众觉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闻节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着什么呢？联合主持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又是凭什么东西来判断表演不够逼真呢？观众会不会认为播音员在撒谎，或报道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他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想到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报道的真实性要取决于新闻播音员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种风俗，带来坏消息的人要被驱逐或杀死。难道电视新闻节目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又恢复了这样的传统吗？如果我们不喜欢播报新闻的人，是否也要驱逐他呢？难道电视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吗？

如果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值得认识论者注意了。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限于真理如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得到体现。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我怀疑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蒙羞，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在电视上表现得像个撒谎者。如果这是真的，没有人心里会觉得踏实，连最痛恨尼克松的人恐怕也不会例外，因为这也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有的人看上去

---

1 关于克拉夫特案件的详细报道，参见1983年7月29日的《纽约时报》。

像在撒谎，事实上说的却是实话；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说实话，其实却是在撒谎。

作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你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你必须按照大卫·梅里克和其他成功制片人的标准慎重选择演播人员。和他们一样，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目的娱乐价值上。例如，你要为节目选择一个音乐主题。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我发现很少有美国人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奇怪，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播放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题。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之类的，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事实上，报道的事件和事实的关系充其量就像剧情和戏剧的关系一样。

其他的几个特点也验证了新闻节目是一种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条新闻占用的时间平均为 45 秒。虽然简短并不总是意味着缺乏重要性，对于新闻来说却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要在不到 1 分钟的时间里报道一个具有相当严肃性的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作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你要通过图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被带进警察局的杀人嫌犯，受骗上当的顾客怒气冲冲的脸，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滚下来的桶（里面据说有一个人），从直升机上下来踏上白宫草坪的总统——这些都是足够精彩的画面，完全符合娱乐节目的要求。当然，这些画面并不一定要说明新闻的要点，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些画面。镜头本身就是理由，这是每个电视制片人都明白的道理。

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播音员在为电视节目配上开场白或收场白的时候，不要停下来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发抖，否则就无法达到一种高度的不真实感。确实，很多播音员似乎并不明白他们所说内容的意义，他们播报地震、大屠杀和其他灾难新闻的时候往往保持一种固定不变的、得体的热情。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在“好……现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在电视观众这方面，就像看戏的观众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个杀人犯在附近居民区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

观众还知道，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例如，在我写作本文的这天，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宣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无法避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这是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如果我写到这里停下来，告诉你我过一会儿再继续我的讨论，然后开始以联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名义写几句话，你会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的这本书？你肯定会认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这本书。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设在每一章中重复几次，你一定会认为这整本书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觉得电视节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希望书和其他一些媒介（如电影）应保持口气上的一致以及内容上的连贯，而对电视节目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对电视新闻。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厥倒。我们几乎无法想像这样的情况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危害，尤其是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们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都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都不必当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对于那些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人，我可以引用罗伯特·麦克尼尔对于电视新闻的描述来证明我的观点，他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兼联合主持人。他说，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1]。他还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2]

让罗伯特·麦克尼尔来证明电视新闻节目类似杂耍，是再合适不过了。《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也只有5到10分钟）。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电视节目的标准，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种节目。而且，你可能会比麦克尼尔描述的走得更远，你会想尽办法把你的新闻播音员捧成名

---

1 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2页。

2 同上，第4页。

人，你会在报纸和电视上为节目大做广告，你会制作“简明新闻”来吸引观众，你会让天气预报播音员成为喜剧性调味剂，你还会让体育播音员故意用上粗鲁的语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认可）。简单地说，你会像娱乐业中的任何一个制片人一样包装整个节目。

这样的电视节目使得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娱乐却得到最少信息的人。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尽管很多人都吹嘘电视作为世界的窗口已经使美国人成为消息最灵通的人，当然这要取决于“消息灵通”的定义。对于那些向我们透露70%的美国公民不知道国务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谁的民意测验，我不想多费笔墨，但我们可以拿“伊朗人质危机”作为例子。我想近年来没有哪个事件比它更受电视关注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美国人对于这个不愉快事件应该有足够的了解。那么现在，我问你：如果我说在100个美国人中找不到一个人知道伊朗人说什么语言，或知道“阿亚托拉”[1]的意思，或了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说出他们政治历史的概要，或知道“沙”[2]是何人来自何方，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这些看法往往特别有用。但这些看法和18或19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这一点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中不难看出。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

---

1 阿亚托拉 (Ayatollah)，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注

2 沙 (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译注

远。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被迷惑的。1983 年 2 月 15 日《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

里根误述　无人关注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 里根总统的助手们过去常常因为总统先生对于其政策及时事做出错误甚至误导的评述而感到惊恐万分。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了。
>
> 其实，总统先生还是照旧发表值得争议的观点，但报界对此不再像过去那样穷追不舍。据白宫官员分析，报纸减少报道反映了**公众兴趣的减退**。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新闻报道，还不如说是关于新闻的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不是罗纳德·里根的魅力。它告诉了我们新闻是怎样被定义的，我相信，不论是自由论者还是早些时候的独裁者看到这篇文章都会感到震惊。沃尔特·李普曼在 1920 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尽管他对恢复 18 和 19 世纪的那种公众话语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都同意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报界训练有素并可以充当测谎仪，那么公众对于总统的误述一定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有了测谎的方法，公众就不可能对谎言的结果无动于衷。

但他的假设不适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是公众拒绝表示兴趣。对于那些有关白宫谎言的新闻报道，公众会用维多利亚女王著名的一句话作答："我们不觉得好笑。"但是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也许，如果总统的谎言能够用图片展示出来并伴以音乐，公众就可能惊讶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对政府政策的错误解释被拍成一部像《惊天大阴谋》那样的电影，如果电影里再出现几个洗钱的恶棍，观众的兴趣就一定会大增。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尼克松总统在自己的谎言被"水门事件"听证会上的磁带彻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东西，里根总统**只是**说了不完全属实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

但这里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总统的很多"误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语境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同一语境"是个关键词，因为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会儿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橘子，一会儿又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苹果。如果一句话是在选择墙纸图案时说的，另一句话是在选择做甜点的水果时说的，我们就会说这两种意见是相反的，它们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这两句话是在同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说的，那么它们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时成立。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轻学生们关于他们写作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观点。我说："你看，在这一段里你这样说，在那一段里你又说了相反的话，到底应该是什么？"他们很有礼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们被我提出的问题弄糊涂了，而我紧接着也被他们的回答弄糊涂了。他们说："我知道，但一个是在**那里**，一个是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

“这里”和“那里”，“此时”和“彼时”，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都应该是彼此相连、前后贯通的，都属于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印刷术话语的方式，印刷术是我“来自”的世界，他们都这么说。而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在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没有了自相矛盾，公众怎么可能对总统**这会儿**说什么、**那会儿**说什么感兴趣呢？任何新闻都只是旧新闻的改写，没有什么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记者们面对公众的漠然所表现出来的迷惑不解。这整个事情极富讽刺意义，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面对这样的局面，像乔治·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了。这根本不是“奥威尔式”的情况。新闻界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变成《真理报》，美联社没有变成塔斯社，而且这里也没有“新话”[1]。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这一点，而奥威尔则没有。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

1 “新话” (Newspeak)：指以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为特点的宣传语言，源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

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虽然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电视在这当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会很赞成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话：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1]。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2]。

我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我的意思是，电视是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例如，美国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就是完全按照电视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摆在类似电视机的东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地短，它的版面设计大量使用照片、图表和其他图像，有的还是彩色的。它上面的天气预报图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视觉享受；它的体育版上无聊的数据多得可以让电脑发疯。结果，创刊于1982年9月的《今日美国》已经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三大日报（这是发行审计局截止到1984年7月公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偏好传统的记者们批评它肤浅夸张，但该报的编辑们对印刷术时代的标准继续不管不顾。该报的总编约翰·奎恩说：“我们并不想得大奖，何况他们也不会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3]这是他们为电视认识论产生的共鸣而献上的礼赞：在电视时代，段落已经成为报纸上新闻的基本单位。而且，奎恩先生也不必为不能得奖过于烦恼，随着其他报纸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给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

我们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成功杂志，如《人物》和

---

1 原文为“soma”，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为了解除烦忧服用的一种药丸。——译注

2 原文为“Howdy Doody”，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受儿童欢迎的电视节目。——译注

3 见1984年7月9日的《时代周刊》，第69页。

《美国》，不仅仅是电视型印刷媒介的典范，而且它们对于电视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有些电视节目，如《今夜娱乐》，把关于艺人和名人的信息转换成“严肃”的文化内容，这就使新闻的娱乐性更完整了：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娱乐。

在赫胥黎笔下充满现代技术麻醉剂的世界中，广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类。广播本身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合传播理性而复杂的语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在流行的、观众来电点播节目中，观众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类人的咕哝声。这样的节目没有内容，但也许还有一点考古意义，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1]之间的对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而且，在电视的影响下，广播新闻的语言也越来越脱离语境，变得断断续续，所以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被有效地截断了。在纽约市，WINS广播电台请求听众：“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他们说这句话时是诚恳的，听众们也不会把这个口号看作是痴人说梦。

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娱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

1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s)：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译注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有一个福音传教士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她的名字叫特丽。她看上去50出头，头发梳理得挺直僵硬，人们说她的头发只会被折断，而不会被弄乱。特丽教士精力旺盛而且不拘礼节，她的传教风格显然是效仿早些时候的密尔顿·伯尔。从观众的脸部特写镜头可以看出，他们几乎一直在笑。要不是他们的样子稍稍显得整洁健康一些，我们很难把他们和在拉斯维加斯观看演出的观众区分开来。特丽教士奉劝在座的以及那些“在家”的人通过找到耶稣改变自己的道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她向大家提供了一套“致富行动资料”，此举有双重目的：在走近耶稣的同时，还可以学习怎样使银行里的存款数目变大。此举使她的追随者欣喜不已，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致富是宗教的真正目的。但是也许上帝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特丽教士已经被迫宣布破产并暂时停止了她的传教活动。

帕特·罗伯逊是热门节目《700俱乐部》的主持人，这既是一个电视节目，同时又是具有某种宗教性质的组织，你每个月只要付15美元就可以加入了（当然，如果你装了有线电视，就可以免费观看）。罗伯逊

教士比特丽教士表现得要低调一些，他谦逊、睿智，具有电视观众喜欢的那种冷静的脱口秀主持人的魅力。他的感召力比特丽教士要大得多，至少从电视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他的节目仿效《今夜娱乐》节目的模式，包括采访、歌手访谈和成为再生基督徒的艺人的录像。例如，夏威夷唐·何[1]合唱团的姑娘们都是再生基督徒，在录像里，我们看到她们既在教堂里祈祷，又在舞台上表演（虽然不是同一时间）。这个节目还再现了曾经处于绝望边缘的人们看了《700 俱乐部》之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这些人在精心制作的文献电视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其中一个节目中，我们看见一个由于焦虑精神几近崩溃的妇女，她无法尽妻子应尽的义务，所有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都让她对世界产生恐惧。她开始成为妄想狂，认为自己亲生的孩子都想谋杀她。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见她坐在电视机前，偶尔发现了《700 俱乐部》。她对这个节目传递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开始接纳耶稣走进她的心灵。她被拯救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看见她平静而快乐地生活着，眼睛里洋溢着平和的光芒。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700 俱乐部》两次把她带入了超凡的境界：第一次是把她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第二次是使她成为一个电视明星。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人来说，到底哪一个是更高的境界他们都不清楚。

在每期《700 俱乐部》结束的时候都会播出下次节目的预告，而且这些预告的节目总是异常丰富多彩。节目最后是一句我们常听到的话："精彩节目不嫌多……明天同一时间《700 俱乐部》再见。"

吉米·斯瓦加特是一个有点老派的福音传教士。虽然他的钢琴技艺精湛，歌声也非常动人，而且也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电视资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那种激情澎湃的传教方式。但因为要出现在电视上，他便常常用普世教会的理论来缓和自己的态度。例如，在讨论"犹太人是否亵渎神灵"这个问题时，他首先回忆了耶稣的成人仪式，强调基督徒亏欠犹

1　唐·何 (Don Ho)，夏威夷著名歌星、娱乐界名人。——译注

太人太多，并由此得出结论，犹太人没有亵渎神灵。在结尾的时候，他又指出，犹太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神殿而迷失了方向。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犹太人是可悲的而不是可鄙的，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人。

这是完美的电视传道——精彩、动情，有一种让人奇怪的宽慰，甚至犹太观众也会有这种感觉。电视——上帝保佑它——绝不适合传递赤裸裸的仇恨。一方面，你不知道谁在看电视，所以最好不要过于挑衅；另一方面，满脸涨得通红、不断挥舞双手的仇恨者在电视上会显得非常愚蠢。这一点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就发现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还因此吃过亏。电视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但也有例外，像斯瓦加特这样的教士在谈到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这样的话题时是不可能沉默的，他们攻击敌人时总是不依不饶。也许这是因为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者都不在尼尔森收视率调查范围之内，而且他们也不看电视)

宗教组织目前拥有并管理着35家电视台，每家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宗教节目。为了写这个章节，我看了42小时的宗教节目，大多是罗伯特·舒勒、奥拉尔·罗伯茨、吉米·斯瓦加特、杰瑞·法威尔、吉姆·柏克和帕特·罗伯逊主持的节目。看42小时节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5个小时就足够让我得出结论，其中的两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确实，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见解狭隘还很偏执。他们自然无法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媲美，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查尔斯·芬尼，个

个都是学识过人，精通神学，具有高超的表述能力。但是，在缺陷方面，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甫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丝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意思，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大多数电视传教士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原本在教堂或帐篷里面对面的传教也可以在电视上进行，而且既不会丢失原意，也不会改变宗教经验的性质。他们没能认识到复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观众，让他们心生傲慢而无暇顾及其他了。

比利·格雷厄姆曾经写道："电视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我的每一期黄金时段的'特别节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近 300 个电视台同时播出，我一次电视直播的观众比耶稣一生中传教的对象要多千百

万。”[1]对此，帕特·罗伯逊补充说：“说教会不应该利用电视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但传递的方式可以改变……要让教会不利用美国最具有生成力量的工具简直愚不可及。”[2]

这样想真是太幼稚了。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它的周围环境，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教堂被设计成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东西都具有宗教的氛围。但是宗教仪式并不一定都要在教堂里举行，只要事先进行一番净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胜任。所谓“净化”，就是说要去除它一切世俗的用途。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在墙上放一个十字架，或在桌子上放一些蜡烛，或在醒目的地方放上一本《圣经》。通过这些，体育馆、餐厅或宾馆都可以被改造成朝圣的地方，都可以暂时从世俗世界中超越出来而再现为一种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达拉斯》，我们都不会改变在自己的客厅、卧室或厨房里进行的活动。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观众

---

1 格雷厄姆，《电视传教的未来》，《收视指南》第31期，1983，第5—8页。
关于格雷厄姆风格的详细分析，请参见麦克·瑞尔的《大众中介文化》。要想了解对他有趣而尖刻的分析，参见罗兰·巴特的作品。在《艾菲尔铁塔和其他神话》中，巴特说：“如果上帝真的通过格雷厄姆博士的嘴巴说话，那上帝就是一个笨蛋。”

2 引自罗伯特·阿拜尔曼和金伯利·纽恩道夫所著的《广播中的宗教》，第2页。

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

还有一点，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观众随时都会意识到，只要轻轻按一下遥控器，宗教节目就会马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世俗节目——曲棍球比赛、广告、卡通片。不仅如此，在大多数宗教节目的前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广告、流行节目的宣传以及各种各样其他世俗的形象和话语，所以屏幕本身就传递了娱乐不断的信息。不论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电视传教士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节目不能代表商业广播之外的另一片天空，而只能充当这个统一体里的一个部分。确实，很多宗教节目都不是按照传统在星期天播出的。有些受人欢迎的传教士非常愿意和世俗节目“齐头并进”，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使他们的节目更具吸引力。钱不是问题，这些宗教节目得到的赞助高达上百万，据估计，电子教堂的总收入每年超过5亿美元。

我提到这些数据是想解释，为什么这些传教士能够支付得起相当于商业节目的高额制作成本。这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大多数的宗教节目里都有水汽冲天的喷泉、色彩绚丽的花朵、训练有素的唱诗班和精心设计的布景，完全是一些著名商业节目的再现。很多时候，他们的节目要到拥有迷人奇异景色的地方进行“外景拍摄”。

此外，宗教节目还有众多俊男靓女的捧场，他们既出现在节目中，也出现在观众里。罗伯特·舒勒特别偏爱名人，尤其是电影明星，而他们也对他表现出无限忠诚。舒勒不仅让名人出现在他的节目中，还让他们出现在他的广告里来吸引观众。我想我可以很公平地说，吸引观众是这些节目的主要目的，就像《达拉斯》这样的电视剧一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市场推广手段，如派发免

费小册子、《圣经》和礼物，杰瑞·法威尔送出的是“耶稣至上”的别针。传教士们对自己如何控制传教内容以提高收视率毫不否认。如果你想从这些电视传教士那里知道富人死后进入天堂会遇到什么困难，那你一定得等上很长时间。全国宗教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执行主席总结了电视传教士的不成文规则：“只有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你才可以得到市场占有率。”[1]

我相信，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宗教信条。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但是，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只有在呈现动感的视觉形象时，电视才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它不适合复杂的语言或苛刻的要求。所以，电视上的传教完全不同于圣山上的传道。宗教节目充满了喝彩声，它们庆祝富有，让节目中的演员成为名人。虽然这些节目传递的信息琐碎无聊，但它们仍然会有很高的收视率，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琐碎无聊，它们才会拥有很高的收视率。

如果我说基督教是一种苛刻而严肃的宗教，我相信我没有说错。但是，当它被表现得轻松愉快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

当然，肯定会有人反对“电视使宗教堕落”这种说法，其中一个理由是，宗教和图像从来都是紧密相联的。除了贵格会[1]和其他几个禁欲的教派，很多宗教都努力通过艺术、音乐、神像和令人敬畏的仪式来表现自己的吸引力。宗教的美感是它吸引人们的重要原因。对于天主教和犹太教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在镶嵌着美丽彩色玻璃的教堂里，教徒们可以听到萦绕人心的曲调，看到华美的长袍、披肩和神奇的帽子，他们享受圣饼和美酒，聆听古老语言神秘的节奏。这些宗教仪式中的饰物

---

1 阿姆斯特朗，《电子教堂》，纳西威尔：托马斯·尼尔森，1979，第137页。

2 贵格会 (Quaker)：“公谊会”的别称。“贵格”是Quaker的音译，意为“颤抖者”。——译注

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鲜花、喷泉和布景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是宗教本身历史和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徒对它们应该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敬畏。犹太教徒祷告时不会因为戴无檐便帽在电视上好看而戴上它；天主教徒不会为了给圣坛增添光彩而点上蜡烛；犹太教、基督教和长老派的拉比、教士们不会在传教时停下来问电影明星是不是虔诚的教徒。我们在真正的宗教中看到的图像是以施展魔力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娱乐。这当中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我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我们走得离神越来越远。

电视上的大多数宗教节目都是“原教旨主义”的倡导者，它们明确鄙视仪式和神学，它们推崇的是同《圣经》、也就是上帝的直接交流。我不想让自己陷入我不擅长的神学争论中，但我还是可以公正地说，在电视上，上帝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次要角色。虽然他的圣名被一再提起，但传教士有血有肉的形象带给我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值得我们崇拜的是眼前的他，而不是那个看不见的**他**。我不是说传教士存心想这样做，而是说电视上彩色的特写镜头威力太大。毕竟，电视上的形象比金牛犊[1]的魅力要大得多。我怀疑（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天主教反对富尔顿·希恩主教上电视（几年以前）就是因为怕观众们错把对上帝的崇拜献给了希恩主教，他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令人敬畏的斗篷和神圣庄严的语调实在是像极了上帝。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正因为这样，所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一档关于宇宙的节目命名为《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如果你认为宇宙不需要沃尔特·克朗凯特[2]为它增添光彩，那你就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知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电视上比在银河系更有魅力。而吉米·斯瓦加特则比

1　古代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译注

2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16—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特派记者。1962—1981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沃尔特·克朗凯特晚间新闻》总编辑。——译注

上帝更有魅力，因为上帝只存在于我们心里，而斯瓦加特一直**在那里**，你可以看得见他，你可以敬仰他、膜拜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成为电视明星，比利·格雷厄姆能成为名人，奥拉尔·罗伯茨可以拥有自己的大学，罗伯特·舒勒可以拥有水晶教堂。如果我没有弄错，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一切，那就是“亵渎神灵”。

但归根到底，不管人们对电视宗教有多少批评，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电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这就验证了我前面引用过的比利·格雷厄姆和帕特·罗伯逊的话：广大民众需要它。汉娜·阿伦特[1]对这句话作了我所知道的最好回答，她在反思了大众文化的产物后，写了这样一段话：

> 这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状况可以被称为“大众文化”，它的倡导者既不是大众也不是艺人，而是那些试图用曾经是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来娱乐大众的人，或是那些试图证明《哈姆雷特》和《窈窕淑女》一样有趣、一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人。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有很多过去的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作品的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2]

如果我们用“宗教”代替上文中的《哈姆雷特》，用“伟大的宗教传统”代替“过去的伟大作家”，那么这段引文就可以成为对于电视宗教的精辟评论。毫无疑问，宗教可以被改造成具有娱乐性的东西，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改造，我们是不是把这种“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毁灭了呢？宗教在运用了电视资源后日渐攀升的受欢迎程度，会不会让更

---

1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1906—1975)，犹太裔美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等书。——译注

2 阿伦特，《人类的对话中的社会和文化》，弗罗伊·梅森和阿希利·门塔古编辑：自由出版社，1967，第352页。

多的传统宗教理念变成疯狂而琐屑的表演？我前面提到，奥康纳红衣主教为了得到观众欢心进行了令人尴尬的努力，某教区的神甫则尝试把摇滚音乐和传教结合起来。我还知道有一个犹太教的拉比非常郑重地向教会提议，邀请帕瓦罗蒂在赎罪日演唱悔罪祈祷曲，他相信这样一定会让教堂空前爆满。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但正如汉娜·阿伦特说的，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附属于全国基督教教堂委员会的神学、教育和电子媒介协会成员，我完全能够理解“官方”新教教派对把新教改造成一种适合电视播出的宗教所表现出来的担忧。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大家达成一种共识：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在埃德温·奥康纳关于波士顿党派政治的小说《最后的喝彩》中，弗兰克·斯凯芬顿希望通过政治机器的现实教导他年幼的侄子。他说，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1966年，罗纳德·里根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他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1]

虽然体育比赛已经成为娱乐业的一个分支，但它内在的一些本质还是让斯凯芬顿对政治的理解比里根的比喻更令人欣慰。不论在哪种体育比赛中，选手和观众对优秀的标准是有共识的，运动员的声誉随着距离这个标准的远近而起伏。运动员优秀与否是无法轻易伪装的，这意味着大卫·加思以0.218的击球率很难提升他作为外场手的形象，这也意味着用"谁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作为一个民意测验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民众的意见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玛蒂娜·纳夫拉蒂洛娃的发球才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也许还注意到，比赛现场的观众通常都熟知比赛的规则以及每

1　特鲁，《大选记：1980年总统竞选》，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1，第263页。

个动作的意义。在满垒的情况下三击不中而出局的击球手，不可能让观众相信他为他的球队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即使像霍华德·科塞尔那样夸夸其谈、滥用词语的人，也不会混淆击球中和不中、得分和失分、发球得分和发球失误之间的区别。如果政治真的像体育比赛，那么它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一目了然、公正诚实、超越平凡。

如果罗纳德·里根的比喻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又会具备哪些优点呢？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另一码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告"。在乔·麦克吉尼斯关于1968年尼克松竞选的著作《出卖总统》中，他对政治和广告作了很多评论。但他还没有穷尽政治和广告的关系，虽然出卖总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卑劣行为，但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看另外1万条广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当然，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

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为了理解其中的原由，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与科学和自由民主一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根据这个理论，市场

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么产品是好的。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他就应该败出。他们认为，买方的理性激励竞争者成为赢家，并且敦促赢家不断进步。在买方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应该介入使交易无效，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来禁止孩子签订合同。美国甚至有一项法律要求卖方如实介绍他们的产品，因为如果买方不能得到有关产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也要大大受到损害。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卡特尔和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理论，电视广告则把它弄得一团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要求，不论是商业的还是其他的，如果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更精确地说，是要用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这个话语世界正是我们判断对错的依据。如果我们丢弃了这个话语世界，那么实践检验、逻辑分析或任何其他理性的工具都将失去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例如，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

尽在其中了。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1]的病人。

所有这一切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是一个意外，就像政治的转变让可敬的乔治·奥威尔感到吃惊一样。确实，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奥威尔发明“新话”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商业广告的措辞”。但当奥威尔在他著名的散文《英语语言的政治》中说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的形式时，他想要说的是，虽然政治是腐败的，但它仍将继续以一种鲜明的话语模式存在着。他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多。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了担忧。前任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就提出要禁止政治“广告”。甚至电视评论员也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比尔·莫耶斯在纪录片《30 秒钟的总统》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对于电视广告的认识来自我几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我在纽约参与了拉姆塞·克拉克对雅各布·贾威茨的参议员竞选。克拉克十分迷信传统的政治话语模式，他精心准备了一份意见书，对从种族关系到核武力到中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明确的观点。他的意见书里充满了历史背景、经济和政治资料，具有非常开阔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他也许还应该画一些漫画。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雅各布·贾威茨确实利用了漫画。我们不知道贾威茨是否也

1　表演疗法：一种通过演剧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实施时由患者担任有关本人病例的角色，在其他病人及医生的帮助下作即兴表演，以收到调养心理的疗效。——译注

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知道他的竞选利用了一系列的30秒钟电视广告，在这些广告里，他运用了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把自己表现成一个经验丰富、正直虔诚的人。据我所知，贾威茨和拉姆塞·克拉克一样相信理性的重要，但他更加相信参议员位置的重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明白，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是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的，他以纽约州历史上最多的选票赢得了席位。在美国，任何慎重的竞选者都应该聘请形象设计师为他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老生常谈了。我想回到“形象政治”的含义这个话题来，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电视广告塑造政治话语的第二种方法。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繁琐，15秒到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如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那么这样的广告结构真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意见。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说电视广告的主题是产品就像说乔纳的故事主题是解剖

鲸鱼一样，完全不相干。说得深入一点，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电视广告可以用运动员、演员、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或伯爵夫人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产品代言，电视广告也让政治家们得以摆脱自己有限的一点专业知识。政治人物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任何事而不会让人觉得行为古怪、狂妄自大或不合时宜。他们已经作为公众名人深深地融入了电视文化之中。

名人和出名是完全不同的。哈里·杜鲁门广为人知，但他不是名人。不管人们何时看见他或听见他，他都在大谈政治。我们很难想像杜鲁门或他的夫人会作为嘉宾出现在《戈德堡一家》或《我记忆中的妈妈》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那时的政治和政治家与电视节目无关，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政治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

我们很难说政治家们是从什么时候起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的。20 世纪 50 年代，埃弗里特·德克森参议员作为嘉宾出现在《我的台词是什么?》中。竞选总统时，约翰·肯尼迪特别开恩，让埃德·默罗的《面对面》摄制组到他的私宅拍摄。理查德·尼克松在《大家笑》中出现了几秒钟，这个 1 小时长的喜剧节目完全以电视广告为蓝本。到了 70 年代，大众开始接受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到 80 年代，政治人物大规模涌向电视。副总统候选人威廉·米勒为美国运通信用卡做了一个广告；“水门事件”听证会的明星萨姆·欧文也成为广告代言人；

前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参加了《豪门恩怨》的谈话节目；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杜卡基斯出席过《你在何方》；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出席过《喝彩》；拉尔夫·纳德、乔治·麦戈文和爱德华·科克市长主持过《星期六晚上直播》，科克还在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电视版电影中扮演过一个角色；里根的夫人也曾出现在这类电视节目中。如果加利·哈特参议员出现在《西尔街蓝调》里，会有人感到吃惊吗？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政治家成为名人已经使政党不再重要，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政治家的仕途此起彼伏之间的联系。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过去，那时的选民对竞选者几乎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性格和私人生活也没有概念。在我年轻时的一个 11 月，我对是否选举一个民主党人的市长候选人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他既愚蠢又腐败。“这有什么关系？”我的父亲对我说，“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是既愚蠢又腐败的，但是你想让共和党赢吗？”他的意思是，一个明智的选民应该选择能够代表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视角的党派，选举“最佳人选”在他看来纯属幼稚之谈。他从不怀疑共和党里有相当出色的人物，但他知道他们不会为他这个阶级讲话。他非常欣赏纽约坦曼尼协会[1]鼎盛时期的领导人蒂姆·沙利文的态度。据特伦斯·莫兰在他的散文《1984 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中写道，有一次沙利文所在选区有 6382 张票投给了民主党，有两票投给了共和党，对这个结果他很不高兴。在评价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时，他说：“凯利来找我，说他妻子的表兄支持共和党派，为了家庭和睦，我同意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但是我想知道，还有一票是谁投的？”[2]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沙利文这些话里表现出来的智慧。也许确实有人会不顾党派差异把票投给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虽然我还不知道有这样

---

1 坦曼尼协会 (Tammany Hall)：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译注

2 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2页。

的情况)。我想说的是，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为了理解形象政治怎样在电视上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个著名的广告作为切入点，本章题目的前一部分就是取自这个广告。我指的是史蒂夫·霍恩导演的贝尔电话的广告，这个广告鼓励我们“伸出你的手去安抚某个人”。这个“某个人”通常是指一个住在丹佛或洛杉矶或亚特兰大的亲戚，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但每年我们都能在感恩节见到他。而在过去，这个“某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美国文化强烈反对“家庭”这个概念，但还是常有人警告，如果我们放弃了家庭，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就会丧失了。让我们来看一看霍恩先生的广告，这个30秒的广告重新给亲密关系进行了定义，电话线代替了老式的聚会。这个广告甚至为被汽车、飞机和其他扼杀家庭的工具弄得四分五裂的家庭提出了一种关于家庭凝聚力的新观念。在分析了这个广告后，杰·罗森说了以下这番话：“霍恩先生并不想表达什么东西，他没有信息需要传递。他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了解贝尔电话，而是要让大家从美国生活四处可见的破裂关系中意识到电话的重要性……霍恩没有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你也没有表达你自己的想法，霍恩表达的是你的想法。”[1]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

1　罗森，《广告的慢性自杀效应》，夏季刊，1984，第162页。

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我们看着电视屏幕，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邪恶的皇后一样问道："镜子，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上最美的人？"我们常常把票投给那些性格、家庭生活和风格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色的人。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所以，形象政治一方面保留了为个人利益投票的传统，一方面又改变了"个人利益"的含义。蒂姆·沙利文和我的父亲把票投给了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而"利益"对他们来说是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东西——赞助，优惠政策，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的伤害，支持他们的工会或社团，勤奋工作的家庭感恩节能享受火鸡的美味。按照这样的标准，黑人是美国唯一心智健全的选民，其他的大多数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但这些利益都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和电视广告一样，形象政治也是一种疗法，这就是为什么魅力、容貌、名气和个人隐私会如此充斥其中的道理。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就会记得，林肯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微笑的，他的妻子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本人很长时间也是郁郁寡欢的。对于形象政治来说，他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镜子里出现如此阴郁而缺少乐趣的形象。我想说的是，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托马斯·卡莱尔[1]说过："过去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他写这句话的时

1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等书。——译注

候，书还是严肃公众话语的主要媒介。一本书就是历史，它的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间里——从它的写作过程到它线形的陈述，再到通篇运用自如的过去时态。古往今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媒介能像书一样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是如此有用。在关于书的一次谈话中，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但是，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而且，和它的前辈——电报一样，电视只需要播放这些零星的信息，而不是收集和组织它们。卡莱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好的预见性：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1]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

1　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

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1]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如果上述这些观点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奥威尔的预测又错了，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这样。他预见到历史将消失，但他认为这是政府所为，是类似于“真理部”[2]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记录。当然，这正是苏联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奥威尔认为政府会通过赤裸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他的猜测是非常合理的。他的这个预言同历史完全吻合，因为只要书籍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下令销毁孔子的《论语》。而奥维德被奥古斯都驱逐出罗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写了《爱的艺术》。即使是在崇尚优秀文化的雅典，人们在阅读某些

---

1 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第125页。

2 真理部：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年》中的一个政府部门。——译注

书籍时也难免胆战心惊。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1]回顾了很多古希腊书籍遭禁的例子，其中包括普罗泰哥拉[2]，他因为在一次演讲的开头坦言他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神而受到著作被焚的惩罚。弥尔顿很细心地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所有案例中，只有两种书“会引起执法官的注意”：一种是亵渎神灵的书，另一种是诽谤他人的书。弥尔顿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在谷登堡[3]两百年之后写这本书时，清楚地知道，他那个时代的执法官，如果可能，会查禁一切题材的书籍。换句话说，弥尔顿知道查禁制度在印刷业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事实上，在印刷时代成熟之前，信息和思想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如果说一个字写下来会产生某种危险性，那么印刷出来的字就会有百倍的危险。有人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印刷术会带来危险，例如亨利八世，他的星室法庭[4]就被授权查禁书籍。伊丽莎白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和很多其他谷登堡之后的君主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中包括教皇保罗四世，他在位期间，制订了第一个教廷禁书目录。大卫·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炸药。

奥威尔的两项预见——(1) 政府控制和 (2) 印刷材料对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现在看来都错了。奥威尔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起草者们探讨过的问题。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大多数自由人都是通过传单、报纸或口头语言接触社会。他们以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语境中交流着彼此的政

1　弥尔顿 (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伟大诗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以长诗《失乐园》闻名于世。——译注

2　普罗泰哥拉 (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相对主义的主要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被控以不信神之罪，著作被焚。——译注

3　谷登堡 (Johnnes Gutenburg，约14世纪90年代—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译注

4　星室法庭：英国法庭，以专断暴虐著称，1641年废除。——译注

治观点，所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权力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专制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1]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我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是在这里），我也不想对公司国家有什么怨言。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忧虑，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学院的院长乔治·格布纳写下列这段话一样：

> 电视是私营文化部（三大广播公司）经营的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们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们靠的是隐蔽的税收。电视机开着你就要付钱，不管你是在看书，还是在看电视，也不管你想不想看……[2]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纳写道：

>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认为格布纳教授这里想要说的是，那些运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们的符号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也会认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学院接管三大广播公司，观众们也不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

---

1 公司国家 (corrorate state)：源出1970年美国查尔斯·A.赖克 (Charles A. Reich) 所作的《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注

2 引自1982年4月26日纽约举办的第二十四届媒体生态学会议上的讲话。要了解格布纳院长的全部观点，参见《电视：新的国家宗教》，第145—150页。

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让《芝麻街》在1969年面世真是一个明智之举，策划者们深信这个节目将受到孩子、父母及教育者的喜爱。孩子们喜欢这个节目，因为他们是在电视广告中长大的，他们知道广告是电视上最精心制作的娱乐节目。对于那些还没有上学或者刚刚开始上学的孩子来说，通过一系列广告进行**学习**的念头并不奇怪。他们认为电视理所应当起到娱乐的作用。

父母们喜欢《芝麻街》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节目减少了他们因为不能或不愿限制孩子看电视而产生的负罪感。《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们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同时，《芝麻街》还减轻了他们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责任——这在一个把孩子视为累赘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父母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芝麻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和流行在美国社会的那种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在《芝麻街》里，可爱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调和快速的编辑，无疑都能带给孩子们很多乐趣，并为他们将来融入一个热爱娱乐的文化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教育者这方面，他们也普遍对《芝麻街》持赞同态度。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喜欢尝试新的方法，特别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教育可以通过运用新的技术更有效地完成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不受教师影响的”课本、标准测试和电脑在课堂上大受欢迎的原因。）《芝麻街》在帮助解决怎样教美国人阅读这个问题上显然很有想像力，同时它还起到了鼓励孩子热爱学校的作用。

我们现在知道，只有当学校像“芝麻街”的时候，《芝麻街》才能起到鼓励孩子热爱学校的作用，也就是说，《芝麻街》改变了传统的学校概念。教室是一个社交场所，而电视机前的那点空间却是私人领地；在教室里，老师可以解答你提出的问题，而电视机屏幕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学校注重语言的发展，而电视提供的只有图像；上学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行为，而看电视是一种自由选择；在学校里不听老师讲课可能受到惩罚，而不看电视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学校里你必须遵守各些行为规范，而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必顾忌任何规章制度或行为规范；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传统的教室在电视机前的一片笑声中黯然退出了我们的生活，这并不能怪《芝麻街》以及后来随之出现的《电子伙伴》。如果现在的教室开始成为一个枯燥而无趣的学习场所，那么要怪就怪电视机的发明者，而不是儿童电视工作室。我们不能奢望那些想制作好节目的人时时刻刻挂念着教室的功能，他们挂念的只能是电视的功能。这并不意味着《芝麻街》没有教育性，事实上，它绝对具有教育性——每一个电视节目都有教育性。就像阅读能培养人们对于学习的某种倾向一样（不管是怎样的书），看电视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荒原上的小屋》、《喝彩》和《今夜秀》在促进所谓“电视式学习”方面和《芝麻街》一样有效。这种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同书本学习或学校学习是水火不容的。如果我们确实要怪罪《芝麻街》，我们也只能怪它不该装扮成教室的同类物，说到底这是它大胆利用基金和民众钞票的主要理由。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作为一个好的电视节目，《芝麻街》没有鼓励孩子热爱学校或任何

和学校有关的内容，它鼓励孩子热爱的是电视。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和数字完全不重要。约翰·杜威[1]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他在《经验和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2]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虽然我们无法从各种各样的建议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读书和看电视对于学习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关于教育的重要话题。事实上，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3]。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目前的教室还在利用铅字，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日渐削弱了。而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了定

---

1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译注

2 杜威，《经验和教育》，伦敦：考里尔出版社，1963年。

3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知识面相当广，对认识论、政治、教育和医学卓有贡献。——译注

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产业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这个产业的管理者不是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而是电视网络公司的董事会和节目制作人。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局面是某些人蓄意而为，也不是说那些控制电视的人应承担这个责任。我只是想说，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把电视称作“课程”是很确切的。在我看来，课程是一种特别的信息系统，其目的是要影响、教育、训练或培养年轻人的思想和性格。电视正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可以做到持之以恒。通过发挥这样的作用，电视成功地战胜了学校里的课程，甚至几乎消灭了学校里的课程。

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教学是一种保护活动》，在那本书里，我详细地分析了电视和学校这两种课程的对立性，这里我不想重复。但是我想重提两点，因为我觉得我在那本书里阐述得还不够，而且这两点对现在这本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没有人在他们对教育的论述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博览教育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过——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你甚至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电视提供了一个诱人而富有创意的不同选择，我们也许可以说，电视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这些戒律的影响在每一种电视节目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从《芝麻街》到《诺瓦》和《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纪录片到《幻想岛》到音乐电视。下面就是我所说的三条戒律：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因此，你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哪个电视节目开头的时候会警告观众：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节目，你就无法看懂眼前这个节目。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你不能令人困惑

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这也是《星际旅行》、《宇宙》、《芝麻街》和各种电视广告的特点，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

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

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在美国青年的生活中，除了睡觉，没有其他活动比看电视占据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众对于学习的态度正在重新定位。这就引出了我想强调的第二点：这种重新定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教室的传统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还体现在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费城学校进行的一个实验，在那里，教室被改造成摇滚音乐会。但这只是试图把教育定义为一种娱乐方式的众多例子中最愚蠢的一个。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的）：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填满各种关于教师怎样把教室变成二流电视节目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里，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咪咪的旅途》，这个节目如果不能算是新型教育的典范，至少也应该算是一个综合体现了。《咪咪的旅途》是一个开支庞大的科学项目的名字，它涉及了教育界最负盛名的一些机构：美国教育部、银行街教育学院、美国公共广播系统和霍特—瑞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这个项目获得了教育部 365 万美元的资助，因为教育部总是慎重地把钱用在有价值的项目上，而《咪咪的旅途》正是一个有价值的项目。为了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我从 1984 年 8 月 7 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四段话：

> 该项目由 26 集系列片组成，描写了一个流动鲸鱼研究实验室的惊险历程。为了配合这个电视节目的播出，他们还制作了配有精美插图的书籍以及模仿科学家和航海家工作的电脑游戏……
>
> 《咪咪的旅途》通过一系列 15 分钟的电视片描写了 4 个年轻人的冒险经历，他们陪伴两个科学家和一个脾气暴躁的船长踏上了监控缅因州海岸座头鲸的旅途。他们凭借一艘改造过的拖网渔船跟踪鲸鱼，在船只被风暴毁坏之后想方设法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存下来……

在每一集节目之后都有一个15分钟的涉及相关主题的纪录片。在其中的一集纪录片中，一个少年演员拜访了特德·泰勒，他是格林波特的一个核物理学家，他发明了一种通过冷凝海水来对海水进行净化的方法。

教师们可以随时从电视上录下这些节目用于教学，他们还可以选用配套的书籍和电脑练习。根据情节，这些练习中自然贯穿了四个学术主题：地图和航海技术、鲸鱼和它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系统和电脑运用能力。

美国公共广播系统播出了这个电视节目，霍特—瑞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出版了配套的书籍和电脑软件，银行街教育学院的教师们提供了教学方面的专门技术。由此可见，对《咪咪的旅途》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正如教育部弗兰克·威斯罗所说的："我们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王牌项目，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效仿的。"每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说起它的好处时总是如数家珍。霍特—瑞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的贾尼丝·特里比·理查兹强调说："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教育部的官员认为，把电视、铅字和电脑这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能够培养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威斯罗先生还说，像《咪咪的旅途》这样的节目可以节约很多财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比我们做的任何其他项目都要便宜"。威斯罗先生还就怎样为这类项目集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拍摄一部《芝麻街》，我们需要5年或6年时间来集资，但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广告衫和饼干罐头来赚钱。"

在思考《咪咪的旅途》所产生的意义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创意绝不新奇。所谓的"把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或"多媒体形式"，曾经有一个名字叫"视听教具"，这是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已经运用了多年的方法。几年前，教育部为了一个类似的节目向WNET电视台提供了一笔资金。这个节目叫《别说错》，在这个电视系列剧中，

那些滥用英语的年轻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们为教师们准备了与节目配套的课程。这个节目很有吸引力，但似乎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通过观看这个节目，学生们运用英语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说实话，每天的电视广告中不乏滥用英语的例子，我们不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冤枉钱来编造如此多的例子用作课堂教学的内容。大卫·萨斯坎德的任何一个节目录像中出现的错误用法都足以让英语老师分析一个学期。

但是，教育部仍然一如既往，因为他们相信——再次引用一下理查兹女士的话——“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最厚道的反应是说它误导人心。乔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们认真分析了2800项有关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1]而且，在科恩和萨洛蒙、麦林高夫、雅各比、霍耶和舍路卡、斯托弗、弗罗斯特和赖博尔特、斯特恩、威尔森、纽曼、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以及冈特的研究中，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雅各比和其他一些人发现，在观看了两

1　G.科姆斯托克、S.查菲、N.卡茨曼、M.麦克康姆斯和D.罗伯茨，《电视和人的行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

2　A.科恩和G.萨洛蒙的《孩子的观看电视：意外和可能的解释》，通讯杂志第29期（1979年）；L.M.麦林高夫的《照片在孩子理解故事中的作用》，论文在1982年4月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宣读；雅各比、霍耶和舍路卡的《电视化通讯的错误理解》（纽约：美国广告公司协会教育基金会，1980年）；斯托弗、弗罗斯特和赖博尔特的《广播新闻的回忆和学习：印刷材料更好吗?》广播杂志（夏季刊，1981年）：第253—262页；斯特恩的《全国广播协会的调查》、《广播的政治》，1971—1972年（纽约：托玛斯 Y.克罗威尔，1973年）；威尔森的《媒介对于信息丢失的作用》，新闻季刊第51期（春季刊，1974年）：第111—115页；纽曼的《电视新闻观众的回忆模式》，公众舆论季刊第40期（1976年）：第118—125页；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的《记忆新闻：照片帮助我们记忆了什么》，新闻季刊第54期（1977）：第233—242页；冈特的《记忆电视新闻：图像内容的作用》，普通心理学杂志第102期（1980年）：第127—133页。

个30秒长的商业电视节目和广告之后，只有3.5%的观众可以正确回答和节目有关的12个判断对错的问题。斯托弗和其他一些人在研究了学生对电视、广播和报纸上的新闻做出的不同反应后得出结论：学生对于报纸新闻中出现的人名和数字做出的回答正确率最高。斯特恩的研究结果表明，51%的观众在看完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之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威尔森发现，普通的电视观众只能记住电视剧中20%的信息。卡茨和其他一些人发现，21%的电视观众无法回忆起一个小时之内播放的任何新闻。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萨洛蒙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1]换句话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观看电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我们不能为了获得捐款就不顾事实。当某个项目岌岌可危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为了获得支持而吹嘘它的好处。当然，我不怀疑理查兹女士也可以找出几个研究结果来支持她的观点。问题是，如果你集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已经看了太多电视的孩子们再多看一些电视，那么你夸大其词的程度就令人担忧了。

《咪咪的旅途》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内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所有内容必须能够**通过电视**来表现。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座头鲸的习性？所谓"学术主题"的识图能力和航海技术到底有多重要？航海技术从来就没有被看作是"学术主题"，对于大城市里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为什么"鲸鱼和它们的生活环境"会成为一个如此有趣的话题，值得人们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来制作这个节目？

我认为，《咪咪的旅途》的创意很可能来自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的好处是什么？"而不是"教育的好处是什么？"电视的好处

---

1 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第81页。

在于它可以展示遇险的船只、航海历险、脾气暴躁的老船长以及接受电影明星采访的物理学家，这就是我们在《咪咪的旅途》中看到的。为这个情景喜剧量身定做的配有图片的书籍和电脑游戏，证明了电视节目可以控制学校课程。学生浏览的图片和他们玩的电脑游戏，都是由电视节目的内容决定的。书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视听教具，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之所以能在学校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当然，电视节目确实可以用于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甚至成为学习的重心。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学校课程的内容完全受制于电视节目，人们甚至开始认为教室是学生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媒介——包括电视——怎样影响人们态度和认知的地方。既然我们的学生在中学结束之前已经观看了大约 1.6 万个小时的电视，我们理应提出这样的问题，教育部的官员们也应该想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怎样看电视？什么时候不该看电视？《咪咪的旅途》避开了这些问题，他们希望学生们以观看《西尔街蓝调》的相同心态沉浸于节目之中。（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培养“电脑运用能力”也没有涉及电脑的认知倾向和社会效应之类的问题，而这些在我看来，正是我们关于新技术应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咪咪的旅途》按照媒体商人的旨意，盲目而无形地花掉了 365 万美元，结果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肯定，他们对鲸鱼有了一些了解，也许也获得了有关航海和识别地图的知识，但这些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如果他们的英语老师让他们通过摇滚音乐学习演讲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们的社会学老师用唱歌的方式教给他们有关 1812 年战争的史实，再或者，如果他们的物理课内容出现在饼干和广告衫上，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正是他们希望的，而且他们已经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以同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接受他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以及亚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

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

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技术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从很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其次，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几个建议结束本书。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

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1]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同样不现实的是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很多文明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电视播出的时间，以此来弱化电视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我相信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一旦电视这种快乐媒介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绝不会同意让它离开片刻。当然，还是有些美国人作过尝试，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期间，《纽约时报》（1984 年 9 月 27 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图书馆倡导“关掉电视”的文章。这次活动发生在去年，主题是让人们在一个月里不看电视。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文章引用了埃伦·巴布科克夫人的话，她的一家参加了这个活动。她说：“去年电视对这个活动进行过很多精彩的报道，我很想知道今年这个活动是否会产生和去年一样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巴布科克夫人希望人们通过看电视认识到他们应该停止看电视。我们很难想像巴布科克夫人没有看出自己立场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性。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些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

一个月不看电视到底有什么意义？充其量这是一种苦行。当这个地方的人们结束这种苦行回到他们日常的消遣时，他们会感到多么舒畅啊！但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就像我们为那些限制电视中某些内容——例如，过多的暴力、儿童节目中播放的商业广告——的努力鼓掌一样。我特别欣赏约翰·林赛关于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的建议，就像我们现在禁止烟酒广告一样。我会很乐意在联邦通讯委员会面前证明这个建议的众多好处。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愿意提出一个两全之策：在播放所有政治广告之前应该先播一条小小的声明，即，根据常识，观看政治广告有碍思想健康。

1　卢德分子（Luddite）：1811年至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该运动据说由工人卢德（Ned Ludd）发动。——译注

我对是否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不持乐观态度，我也不相信那些旨在提高电视节目质量的提议能有什么成效。我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喝彩》之类的节目不会威胁大众思想健康，但《新闻60分》、《目击新闻》和《芝麻街》之类无疑是一种威胁。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的答案差别很大），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

补充一句，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虽然我相信人们对于电脑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很明显，美国人对于电脑的态度也是盲目的，别人告诉他们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一句异议。对于电脑技术的中心命题——我们解决问题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不足——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我想，这样的展示应该模仿《星期六夜生活》这样的形式，其结果是让全国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认识到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些模仿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也就是说，对于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那些节目中的模仿者可能会成为名人，会出现在电影里，最后再回到电视上效力于商业广告。

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确实，哪怕你允许有 500 年的误差，你也

不可能在100个高中生中找到两个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我发现，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让学校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但是，我们提出解决措施应该具有超前的意识，否则还要什么梦想呢？而且，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

1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班格》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译注

参考文献

保罗·安德森，《中西部的柏拉图主义》，宾夕法尼亚：坦波尔大学出版社，1963。

汉娜·阿伦特，《人类的对话中的社会和文化》，弗罗伊·梅森和阿希利·门塔古编辑：自由出版社，1967。

本·阿姆斯特朗，《电子教堂》，纳西威尔：托马斯·尼尔森，1979。

麦克斯·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经历》，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铁锚丛书，1956。

美尔乐·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

丹尼尔·切特罗姆，《媒体和美国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柴普西尔：北卡罗来纳出版社，1982。

约翰·杜威，《经验和教育》，伦敦：考里尔出版社，1963。

伊丽萨白·特鲁，《大选记：1980 年总统竞选》，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1。

伊丽萨白·爱因斯坦，《作为催化剂的印刷机》，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9。

霍华德·法斯特，托马斯·潘恩：《人权导读》，纽约：继承出版社，1961。

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纽约：麦格纳姆出版社，1968。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

比利·格雷厄姆，《电视传教的未来》，收视指南第31期：第10页(1983)。

哈娄，艾尔文·费，《老的线路和新的浪潮：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的历史》，纽约：艾波顿—世纪，1936。

詹姆斯 D.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理智主义》，纽约：阿尔弗莱德·A.瑙普夫，1964。

温斯罗普·哈德孙，《美国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瑞伯纳家族，1965。

詹姆士·麦尔温·李，《美国新闻史》，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17。

堪尼斯·洛克里奇，《早期美国的读写教育，1650—1800》，选自《西部的读写教育和社会发展》，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罗伯特·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

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传和其他作品》，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69。

约翰 C.米勒，《第一个开拓者：殖民地美国的生活》，纽约：戴尔，1966。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

特伦斯·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

弗兰克·路德·莫特，《美国新闻：260年来美国报纸的历史，1690—1950年》，纽约：麦克米兰，1950。

路易斯·芒福德，《技艺与文明》，纽约：布瑞斯·哈考特和世界，1934。

波蒙特·纽豪，《从 1839 年至今摄影术的历史》，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64。

沃尔特·翁格，《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的未来》，《通讯杂志》30：1（冬季刊，1980）。

沃尔特·翁格，《口语和读写能力》，纽约：麦休恩，1982。

托马斯·潘恩，《理性时代》，纽约：彼得·艾克勒出版公司，1919。

弗兰克·普瑞斯布利，《广告的历史和发展》，纽约花园城：达伯戴，多兰出版公司，1929。

杰·罗森，《广告的慢性自杀效应》（夏季刊，1984）。

加夫瑞艾尔·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洛杉矶：爵西—巴斯，1979。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斯特劳斯·法拉和吉路斯，1977。

艾德温·厄勒·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 1858 年的辩论》，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1908。

劳伦斯·斯通，《英国的教育革命：1500—1640》，《过去和现在》，第 28 期（1964 年 7 月）。

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57。

阿历克西·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

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纽约：哈普兄弟出版社，1959。

译名对照表

美国广播公司电影《从今以后》及放映后讨论 ABC network movie *The Day After* and post's how discussion

广告：报纸、历史、政治、电视广告 advertising: newspaper, history of, political; television commercials

路易斯·阿加西 Agassiz, Louis

《理性时代》（潘恩）*Age of Reason* (Paine)

《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

《美国拼写课本》*American Spelling Book* (Webster)

《论语》*Analects* (Confucius)

保罗·安德森 Anderson, Paul

汉娜·阿伦特 Arendt, Hannah

《论出版自由》（弥尔顿）*Areopagitica* (Milton)

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Franklin)

汽车工业 Auto Industry

吉姆·柏克 Bakker，Jim

《巴尔的摩爱国者》*Baltimore Patriot*

浸礼会 Baptists

罗兰·巴特 Barthes，Roland

《海湾州圣歌》*Bay Psalm Book*

亨利·沃德·比彻 Beecher，Henry，Ward

詹姆斯·贝内特 Bennet，James

《圣经》*Bible*

《宝藏》*bonanza* (TV show)

书籍审查制度 book censorship

丹尼尔·布尔斯廷 Boorstin，Daniel

波士顿 Boston

《波士顿报》*Boston Gazette*

《波士顿新闻信札》*Boston News-Letter*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Brave New World* (Huxley)

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汤姆·布罗考 Brokaw，Tom

杰罗姆·布鲁纳 Bruner，Jerome

威廉·巴克利 Buckley，William

阿尔弗雷德·巴恩 Bunn, Alfred

乔治·伯恩斯 Burns，George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托马斯·卡莱尔 Carlyle，Thomas

吉米·卡特 Carter，Jimmy

卡西雷尔 Cassirer，Ernst

天主教 Catholicism

迪克·卡威特 Cavett，Dick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network

审查制度 censorship

《喝彩》(电视节目) *Cheers* (TV show)

芝加哥 Chicago

儿童电视工作室 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

西塞罗 Cicero

城市，作为国家性格的比喻 cities，as metaphors of national character

拉姆塞·克拉克 Clark，Ramsey

钟表 clocks

大学：学位授予典礼 collage：commencements，televised

殖民地美国 Colonial America，typography in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Commager，Henry Steele

电视广告 commercials. See television commercials

《常识》 (潘恩) *Common Sence* (Paine)

电脑 Computers

忏悔，电视播出 confessionals，televised

公理教教友 Congregationalists

美国宪法 Constitution，U.S.

话语 conversation

《宇宙》 *Cosmos* (TV series)

亨利·考斯威尔 Coswell，Henry

法庭审讯，电视播出 court trials，televised

克里斯廷·克拉夫特 Craft，Christine

沃尔特·克朗凯特 Cronkite，Walte

字谜 Crossword puzzles

路易斯·达盖尔 Daguerre，Louis

达盖尔银版法 daguerreotype

《每日新闻》 *Daily News*

《达拉斯》 (电视节目) *Dallas* (TV series)

辩论：林肯—道格拉斯 1984 年总统竞选 debates：Lincoln-Douglas 1984 presidential

"十诫" Decalogue

自然神论 Deism

《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 *Democracy in America* (Tocqueville)

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新英格兰记》 (史密斯)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Smith)

约翰·杜威 Dewey, John

狄更斯 Dickens, Charles

艾米丽·狄更生 Dickinson, Emily

爱德华·迪特里奇医生 Dietrich, Dr. Edward

埃弗里特·德克森 Dirksen, Everett

博士论文答辩 doctoral oral

斯蒂芬·道格拉斯 Douglas, Stephen A.

约翰·德莱顿 Dryden, John, Fables

雅各布·杜谢 Duché, Jacob

迈克·杜卡基斯 Dukakis, Mike

德美浸礼会教派 Dunkers

德怀特 Dwight, Timothy

《豪门恩怨》 (电视节目) *Dynasy* (TV series)

教育：殖民；控制电视；19 世纪；电视娱乐；《咪咪的旅途》education: Colonial, to control television; 19th-century; as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The Voyage of the Mimi programs

乔纳森·爱德华兹；《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信仰的激情》 Edwards, Jonathan;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hampton; 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18 世纪宗教和印刷术 18th-century religion and typography

爱因斯坦 Einstein, Albert

老年人和电视 elderly, and television

《电子伙伴》 (电视节目) *The Electric Company* (TV series)

R.W.爱默生 Emerson, Ralph Waldo

理性王国 Empire of Reason

英格兰 England

娱乐；教育、现代城市、政治、电视 entertainment; education; modern cities as; politics as; television as

《今夜娱乐》 (电视节目) *Entertainment Tonight* (TV show)

新教圣公会 Episcopalians

认识论 epistemology，media as

山姆·厄温 Ervin，Sam

《人类理解论》 (洛克)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经验和教育》 (杜威)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Dewey)

眼镜的发明 Eyeglasses，invention of

《目击新闻》 *Eye-Witness News* (TV show)

《寓言》 (德莱顿) *Fables* (Dryden)

杰瑞·法威尔 Falwell，Jerry

福克纳 Faulkner，Willam

《联邦新闻法》 *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支持美国宪法的文章 Federalist Paper (Publius)

电影 film

查尔斯·芬尼 Finney，Charles

《火线》 (电视节目) *Firing Line* (TV show)

杰拉尔德·福特 Ford，Gerald

亨利·福特 Ford，Henry

《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 (杰里·曼德) *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Mander)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anklin，Benjamin

詹姆士·富兰克林 Franklin，James

西奥多·弗里林海森 Frelinghuyesen，Theodore

弗洛伊德 Freud，Sigmund

诺思洛普·弗莱 Frye，Northrop

伽利略 Galileo

乔治·格布纳 Gerbner，George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 *German Ideology* (Marx)

塞缪尔·古德里奇 Goodrich，Samuel

杰克·古迪 Goody，Jack

比利·格雷厄姆 Graham，Billy

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希腊，经典，书籍审查制度，修辞 Greece，Classical; book censorship in; Rhetoric in

霍勒斯·格里利 Greeley，Horace

《卫报》（斯梯尔）*Guardian*（Steele）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Hamilton，Alexander

本杰明·哈里斯 Harris，Benjamin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艾瑞克·哈乌洛克 Havelock，Eric

霍桑 Hawthorne，Nathaniel

海明威 Hemingway，Ernest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 Henry Ⅷ，King of England

约翰·赫歇尔 Herschel，John F.W.

约翰·海曼 Heyman，John

《广告的历史和发展》*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dversting*（Presbrey）

大卫·霍夫曼 Hoffman，David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Hofstadter，Richard

乔西艾·霍尔布鲁克 Holbrook，Josiah

《荷马史诗》（蒲柏）*Homer*（Pope）

史蒂夫·霍恩 Horn，Steve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Huxley，Aldous; *Brave New World*

装饰华美的手稿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图像》（布尔斯廷）*Image*（Boorsting）

教廷禁书目录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伊朗人质危机 Iranian hostage crisis

杰西·杰克逊 Jackson，Jesse

日本 Japan

雅各布·贾威茨 Javits，Jacob
约翰·杰伊 Jay，John
朱利安·杰恩斯 Jaynes，Julian
托马斯·杰弗逊 Jefferson，Thomas
犹太人 Jews
J.F.W.约翰森 Johnston，J.F.W.
爱德华·肯尼迪 Kennedy，Edward
约翰·肯尼迪 Kennedy，John F.
詹姆斯·肯特 Kent，James
亨利·基辛格 Kissinger，Henry
爱德华·科克 Koch，Edward
泰德·科佩尔 Koppel，Ted
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大家笑》（电视节目）*Laugh-in*（TV show）
报告厅，19 世纪 lecture halls，19th-century
休闲，角色转换 leisure，changing role of
图书馆，19 世纪 Libraries，19th-century
《生活》*Life*
亚伯拉罕·林肯 Linciln，Abraham
林肯—道格拉斯的辩论 Lincole-Douglas debates
约翰·林赛 Lindsay，John
沃尔特·李普曼 Lippmann，Walter
扫盲率，殖民地，19 世纪 literacy rates：Colonial; 19th-century
《荒原上的小屋》（电视节目）*The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TV show）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Locke，Joh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朗费罗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 Lowell，James Russell
马丁·路德 Luther，Martin
吕西昂运动 Lyceum Movement
约瑟夫·麦卡锡 Mc Carthy，Joseph

乔·麦克吉尼斯，《出卖总统》McGinnis，Joe；*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乔治·麦戈文 McGovern，George

《麦加菲读本》*McGuffy Reader*

马歇尔·麦克卢汉 McLuhan，Marshall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McNamara，Robert

罗伯特·麦克尼尔 MacNell，Robert

《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MacNell–Lehrer Newshour* (TV show)

詹姆士·麦迪逊 Madison，James

磁性电报公司 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

杰里·曼德，《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Mander，Jerry，*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艾德温·马卡姆 Markham，Edwin

约翰·马歇尔 Marshall，John

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Karl; *The German Ideology*

“五月花”号 Mayflower

媒介，认识论 Media; as epistermology

媒介—隐喻 Media–metaphors

电视播出的手术 medical pratices，televised

媒介和技术，区别 medium and technology，distincti–ons between

《记者访谈》(电视节目) *Meet the Press* (TV show)

麦尔维尔 Melville，Herman

隐喻，媒介 metaphors，media

循道宗教 Methodists

显微镜 microscope

中世纪 Middle Ages

詹姆斯·穆勒 Mill，James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Mill，John Stuart

佩里·米勒 Miller，Perry

威廉·米勒 Miller，William

塞缪尔·米勒教士 Miller，Reverend Samuel

斯泽斯拉夫·米洛什 Milosz，Czeslaw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ilton，John；*Areopagitica*

《碟中谍》（电视节目）*Mission：Impossible*（TV show）

记忆 mnemorics

道德多数派 Moral Majority

特伦斯·莫兰 Moran, Terence

塞缪尔·莫尔斯 Morse，Samuel

比尔·莫耶斯 Moyers，Bill

路易斯·芒福德，《技艺与文明》Mumford，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音乐：摇滚，电视 music：rock; television

拉尔夫·纳德 Nader，Ralph

全国宗教节目主持人协会 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

全国广播公司 NBC network

阿兰·内文斯 Nevins，Allan

《新英格兰报》*New-England Courant*

《新媒介圣经》（电影）*The New Media Bible*（movies）

报纸：广告、历史、电视模式、各种报纸名称 Newspaper：advertising in; history of; modeled on television; See also specific names of newspaper

纽约学徒图书馆 New York Apprentices' Library

纽约市 New York City

《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

《纽约客》*New Yorker，The*

《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尼采 Nietzsche，Friedrich

19 世纪，广告、教育、法律制度、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摄影术、宗教、电报、交通、印刷术 19th century; advertising; education; legal system; Lincole-Douglas debates; photography...

理查德·尼克松 Nixon，Richard

“好……现在”的话语模式 “Now ... this” mode of discourse

奥康纳红衣主教 O'Connor, Cardinal John J.

《官方录像杂志》*Offical Video Journal*

蒂普·奥尼尔 O'Neill, Tip

沃尔特·翁格 Ong, Walter

《自由心灵》 (电视节目) *The Open Mind* (TV show)

口头表达的传统 oral traditions

乔治·奥威尔，《英语语言的政治》Orwell, George; *The Politic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奥维德，《爱的艺术》Ovid; *Arts Amatoria*

托马斯·潘恩，《理性时代》，《常识》Paine, Thomas; *The Age of Reason; Common Sence*

小册子，殖民地 pamphlets, colonial

教皇保罗四世 Paul Ⅳ, Pope

费城门诺派中的严紧派，电影 Pennsylvania Amish, filming of

廉价报纸 Penny newspaper

《人物》*People*

费城 Philadelphia

哲学 phylosophy

凤凰城 Phoenix

摄影术 photography

象形文字 pictographic writing

柏拉图，论书面文字 Plato; on written word

爱伦·坡 Poe, Edgar Allan

政治，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总统竞选辩论，奥威尔 politics; Lincole-Douglas debates; presidential debates

政治，电视，广告，政治家的外貌 politic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of politician

《英国语言的政治》 (奥威尔) *The Politic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rwell)

民意测验 polls

蒲柏，《荷马史诗》Pope，Alexander; *Homer*

长老会教徒 Presbyterians

总统竞选辩论 presidential debates，1984

印刷文字：广告，历史，衰败，电报和印刷术的影响，发明，19 世纪... printing press; invention of，19th-century

印刷机，发明 printing press; invention

普罗泰哥拉 Protagoras

新教派 Protestantism

谚语 proverbs

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国内外要闻》*Public Occurrence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k*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广播 radio

铁路 railroads

丹·拉瑟 Rather，Dan

阅读，角色转换 reading，changing role of

南希·里根 Reagan，Nancy

罗纳德·里根 Reagan，Ronald

记录 records

宗教，殖民地，18 和 19 世纪，在电视上 religion; Colonial; 18th- and 19th-century; on television

共鸣 resonance

保罗·瑞威尔 Revere，Paul

修辞：古典希腊，林肯—道格拉斯辩论 rhetoric：Classical Greek; of Lincole-Douglas debates

奥拉尔·罗伯茨 Roberts，Oral

克里夫·罗伯逊 Robertson，Cliff

帕特·罗伯逊 Robertson，Pat

摇滚音乐 rock music

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杰·罗森 Rosen，Jay

罗素 Russell，Bertrand

约翰·奎恩 Quinn，John

卡尔·萨根 Sagan，Carl

格雷格·萨科威茨教士 “St. Elsewhere” (TV show)

撒旦 Russell，Bertrand

《星期六夜生活》 (电视节目) *Saturday Night Live* (TV show)

卡尔·肖斯科 Schorske，Carl

萧伯纳 Schuler，Bemard

罗伯特·舒勒 Schuller，Robert

科学 science

沃尔特·司各特 Scott，Walter

《忏悔室的秘密》 (电视节目) *Secrets of the Confessional Box* (TV show)

《出卖总统》 (麦克吉尼斯)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McGinnis)

《芝麻街》 (电视节目) *Sesame Street* (TV show)

《700 俱乐部》 (电视节目) *700 Club* (TV show)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illiam

乔治·沙斯伍德 Sharswood，George

富尔顿·希恩主教 Sheen，Bishop Fulton

《60 分钟》 (电视节目) *60 Minutes* (TV show)

口号 slogans

亚当·斯密 Smith，Adam

H. 阿兰·史密斯 Smith，H. Allen

约翰·史密斯，《新英格兰记》 Smith，John;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吸烟标志 smoke signals

苏格拉底 Socrates

萨洛蒙 Solomon

苏珊·桑塔格 Sontag，Susan

诡辩者 Sophists

《旁观者》 *Spectator*

运动 sports

《星际旅行》 (电视节目) *Star Trek* (TV show)

斯梯尔，《卫报》Steele，Richard; *Guardian*

斯坦贝克 Steinbeck，John

乔治·斯坦纳 Steiner，George

埃兹拉·斯蒂尔斯 Stiles，Ezra

约瑟夫·斯托瑞 Story，Joseph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Stowe，Harriet Beecher; *Uncle Tom's Cabin*

梅丽尔·斯特里普 Streep，Meryl

蒂姆·沙利文 Sullivan，Big Tom

手术，电视播出 surgery，televised

吉米·斯瓦加特 Swaggart，Jimmy

威廉姆·斯卫恩 Swain，William

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Swift，Jonathan; *A Tale of a Tub*

霍华德·威廉姆·塔夫特 Taft，William Howard

威廉·亨利·福克斯·陶尔伯特 Talbot，William Henry Fox

《闲谈者》*Tatler*

《技艺与文明》 (芒福德)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Mumford)

技术和媒介，区别 technology and medium，distinctions between

电报 telegraph

电话 telephone

电视，教育，为了控制的教育，娱乐，认识论，垃圾，神话，政治，美国电视节目在国外的受欢迎，宗教，技术和媒介 television; as education; education for control of; as entertainment; as epistemology; as junk; as myth; as politics; popularity of American programs abroad; as religion; as technology vs. medium

电视广告，政治话语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s political discourse

电视新闻节目，播音员的外貌和可信度，关于《从今以后》的讨论，假信息，音乐，“好……现在”话语模式 television news shows; appearance and credibility of newscaster; discussion following *The Day After* (ABC movie); as

disinformation; music on; "Now ... this" mode of discourse

威廉姆·坦南特 Tennent, William

特丽莎嬷嬷 Teresa, Mother

特丽教士 Terry, Reverend

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Thoreau, Henry David; *Walden*

透特 (埃及神) Thoth (Egyptian god)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TV show)

丰田 Toyota

交通，19 世纪 transportation, 19th-century

《信仰的激情》(爱德华兹)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Edwards)

《欢乐问答》(游戏) *Trivial Pursuit* (game)

杜鲁门 Truman, Harry

真理，媒介 truth, media as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马克·吐温 Twain, Mark

印刷术，见印刷文字 typography. See printed word

约伯·泰森 Tyson, Job

《今日美国》*USA Today*

越南战争 Vietnam War

《弗吉尼亚报》*Virginia Gazette*

选举 voting

《咪咪的旅途》(电视系列片) *The Voyage of the Mimi* (TV series)

《走过 20 世纪》(电视系列片) *A Walk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TV series)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电视节目) *Walter Cronkite's Universe* (TV show)

乔治·华盛顿 Washington, George

《别说错》(电视节目) *Watch Your Mouth* (TV dramatizations)

丹尼尔·韦伯斯特 Webster, Daniel

韦伯斯特的《美国拼写课本》Webster, Noah; *American Spelling Book*

H.G.威尔斯 Wells, H.G.

鲁斯·威斯西马博士 Westheimer, Dr. Ruth

《我的台词是什么?》(电视节目) *What's My Line?* (TV show)

乔治·怀特菲尔德 Whitefield, George

惠特曼 Whitman, Walt

埃利·威塞尔 Wiesel, Elie

威廉姆·维尔特 Wirt, William

《目击者》(电影) *Witness* (movie)

女人 women, frontier

书面文字:衰落,早期发展,柏拉图,参见印刷文字 written word: decline of; early development of; Plato on. See also printed word

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童年的消逝



维塔奇书局[1]版序言

在准备为这本已有12年历史的书再版写序言时，我重新熟悉了书里相当多的细节。这并非一桩苦差事，因为在我写的所有的书中，唯独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但我并不想过分娇宠它。我尤其注意寻找那些无论是隐含的还是明说的，而实际证明却是错误的断言。我是想告诉读者，我犯了那些错误，并希望利用这个版本来纠正错误。无论你相信与否，我希望能发现几个大错。本书论述的毕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主题，而且，由于本书对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完全没有解答——这就越发令人不快。如果自本书写成之日至今，童年消逝的一些趋势至少被抑制住了，或者扭转了，我会感到欢欣鼓舞。至于曾经预言我认为将要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那些我知道将要发生的却不会发生了，这并不会对我个人或这本书带来羞耻。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让这本书保持它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写作时的原样。当然，我提出的那些证明童年和成年的界限正被日益破坏的例证，对年轻的读者来说会很陌生。他们不得不自己提供例证。这样的例子

---

1 维塔奇书局维塔奇书局（Vintage Books）是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一家分店。本书初版于1982年。——译者注

可以信手拈来，不胜枚举。今天所有的例子，带有几年前我想像不到的自以为是，却又极为相关。坦白地说，本书的目的在于描述童年概念的起源，它为何盛行了350年，又为何迅速地消逝。现在我重读这本书，很遗憾的是，并没有使我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那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仍然在发生。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在过去的12年里，我了解了一些东西，这使得我必须在书中加入一些原来不存在的内容。我相信原来书中不会有。但是，我很高兴在此作些修改。

在过去的12年里，许多教师，从小学到中学，跟他们的学生探讨书中提出的论点和根据。一些学生还写信给我，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尤其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观点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当其时。这个年龄的儿童不仅会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而且可以对这些影响进行讨论，甚至进行反思。这个年龄的学生也往往行文直率和简练，还没有被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思想。例如，一个叫纳里艾拉（Nariele）的女孩结束她的短信时说，我的想法“稀奇古怪”。一个叫杰克（Jack）的男孩说：“我认为你的文章不怎么好。童年没有消逝——哈！——就这样没有啦?!”约瑟夫（Joseph）写道：“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我觉得那太过分了。童年非常宝贵，用超过半周的时间去上学，太浪费了。”蒂娜（Tina）写道：“当你是孩子时，你并不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孩子们应该多一些玩耍。”约翰（John）写道：“我认为18岁才应该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帕蒂（Patty）说：“我不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看了成人节目，就不再是儿童了。”安迪（Andy）说：“大多数孩子看电视节目，知道那不是真的。”

当然，从这些评论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但它们给我的主要教训是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那当然不是政治力量。那是一种道德力量。在这些问题上，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道德多数”。看起来，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需要有个界限；他们也许比成人更明白，如果这一界限被模糊，那么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

我忠实于本书的主题：美国文化敌视童年的概念。但是想到儿童并非如此，还是让人感到安慰和振奋的。

尼尔·波兹曼

纽约市

1994 年

引言

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忘却自己需要再生繁衍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没有儿童这样一个社会概念，文化却完全可能生存。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生存的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儿童”这个词归结为意指一类特殊的人，他们的年龄在7岁到——比如说——17岁之间，需要特殊形式的抚育和保护，并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与成人不同，那么，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儿童的存在还不到400年的历史。的确，如果我们完全用一个普通美国人对“儿童”这个词的理解，那么童年的存在不超过150年。且举个小小的例子：庆祝孩子生日的习俗，在18世纪的美国大多是不存在的[1]，而且，事实上，以任何形式准确标注孩子的年龄都是一个相对新的文化习惯，不过200年之久而已。[2]

---

1 Walzer, John F. “A Period of Ambivalence: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358页。

2 普拉姆, Plumb, 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 第6页。

再举个更重要的例子：直到1890年，美国的中学只招收7%的年龄在14到17岁的人口。[1]另外93%的人口，和许多更加年幼的儿童一起从事着成人的劳动。一些儿童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在各大城市比比皆是。

然而，我们首先不能将社会事实和社会概念混为一谈。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与科学、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以及宗教自由一起，大约在16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像一切社会产物一样，它的持久存在并不是必然的。其实，写作本书的想法起源于我个人的观察，那就是童年正在消逝，而且飞快地消逝。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的任务，一部分是展现童年消逝的证据，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尽管我怀疑大多数读者不会要求多少说服就会相信。有关童年消逝的话题，不论我到何处演讲，不论我何时写作，听众和读者不仅没有对这个观点表示异议，而且急不可耐地从自身的经验中为我提供证据。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迅速模糊，这个观察对于关注它的人平淡无奇；对于不关注它的人，也不置可否。不甚为人知晓的是，首先童年从何而来。至于为什么童年会消逝，就更鲜为人知了。

我相信我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明白易懂的答案。它们大多是通过观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交过程而产生的一系列推测；尤其是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换句话说，以我本人对我写本书的内容的理解，本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断言童年正在消逝，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何以发生的理论。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表述“童年”这个概念的起源；具体地说，就是童年起初不需要存在，而后却发展成不可避免的存在，它们各自的传播条件是什么。第二部分将我们置身于现代时空，企图揭示从谷登堡（Gutenberg）的印刷世界转换到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电报密码世界，这个过程使童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

---

1 布尔斯廷，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 New York：Harper & Row, 1978，第64页。

那么，我们能为童年的消逝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本书将不对此进行探讨。理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这么说，心里既轻松又沮丧。轻松是因为我不必背负教别人如何生活的包袱。在我以前写的书里，我都冒昧地指出较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我相信这是职业教育家应该做的事。事实上，承认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他们发现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不相上下，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当然，沮丧也是出自同一个原因。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但是我会这么想来安慰自己：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

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里。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莉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至1979年间，15岁以下的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百分之一万一千。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过去。那时候，青少年逃课去学校厕所抽支烟，都被看作是“问题”。

念旧的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同样会记得，过去成人服装和儿童服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过去的10年里，儿童服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所有实用意义上的“童装”都已经消失了。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1]

1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译者注

提出过一个在18世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儿童和成人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服装。他的主张现在却遭到成人和儿童的完全排斥。

就像形式各异的服装，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也正在消失。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官、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the Little League baseball）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Pee Wee football），他们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现在还有谁看见九岁以上的孩子在玩抛接石子（Playing Jacks）、骑木马（Johnny on the Pony）、捉迷藏（Blindman's Buff）或边打球边唱歌（Ball-bouncing rhymes）这样的游戏？ 两位出色的英国史学家彼特和艾沃娜·奥佩（Peter and Iona Opie）专门研究儿童游戏。他们鉴定了几百项传统的儿童游戏，当今美国儿童仍然常常玩的游戏几乎没有一种。就连两千多年前在伯里克利（Periclean）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1] 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实际上，童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无疑，这正好说明了要求重新修订儿童合法权利的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儿童多多少少可以跟成人享有一样的权利。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 的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s*）就是一例。这个运动反对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宣称，原来以为是让儿童处于一种对他们较为有利的地位，其实不过是对儿童的压制，迫使他们不能全面地参与社会活动。

---

1 Cowley, Robert. “Their Work Is Child's Play.”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第14页。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探讨支持童年在消逝这一观点的证据。但我想在此指出，在现有的一切证据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比童年的历史已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一大产业这个事实更能说明问题。马歇尔·麦克卢汉[1]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仿佛要证实他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写出了大量有关童年历史的重要作品，而在1800年到1960年之间，[2]类似的作品非常少见。确实，我们也许可以公平地说，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于1962年出版的《几百年的童年》（*Centuries of Childhood*）开辟了这个领域，引发了研究童年历史的热潮。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然而，即使我把社会突然热衷于记录童年历史的现象误认为是童年日渐衰亡的一种迹象，我们至少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终于能够找到有关童年的起源的研究资料了。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童年这个概念是如何出炉的，同时可以推测它又为何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从现有的材料中最大限度地拼凑出来的有关童年的故事。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却很少给它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

1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认为电视、计算机、电子通讯等对社会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在形成其思想的风格方面会发生强烈影响；书籍注定是要消灭的。著有《媒介即信息》等。——译者注

2　根据劳伦斯·斯通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Shelby Cullom Davis 历史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71到1976年间出版的有关童年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重要著作和文章有900多部/篇之多。相比之下，他指出，在30年代，每年仅出版大约10部/篇学术著作和文章。

念。在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1]

在希腊浩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说的儿童的论述，但那些论述由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人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希腊人头脑中对“儿童”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看法。例如，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讲述了一个男子和年轻妻子之间的关系。她还不满 15 岁。在成长过程中，她接受的是体面的教养，“尽可能少看、少听和少提问题”。由于她也透露说母亲告诉她，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她丈夫才举足轻重，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我们所了解的是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还是对儿童的态度。我们的确知道，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时代的希腊人，对杀害婴儿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约束。尽管亚里斯多德认为对这种可怕的传统应该加以限制，但他对此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2]由此可见，希腊人对儿童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个臆断有时候并不管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过不少故事。故事中表达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的想法类似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十个科林斯人到一个人家去杀一个小男孩。根据神谕，那孩子成人后会毁

---

1 在《希腊方式》（*The Greek Way*）一书中，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讲述了一则有关希腊画家的传说。传说表明，为男孩子作画可能并没什么不寻常：一个希腊画家展出一幅画作，画上一个男孩拿着一串葡萄。葡萄栩栩如生，鸟飞过来啄它们。当有人夸奖画家为大师时，他回答道：“如果我是大师的话，那么那男孩应该能让鸟儿不敢靠近。”汉密尔顿小姐因此得出结论说，在希腊人心目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跟现实一样美。葡萄要画得像葡萄，男孩要像男孩。但实际上，在希腊人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这类男孩子的画像——假定用我们所说的“男孩”这个词的意思。

2 德莫塞，deMause，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6页。

灭他们的城市。当他们到了这家以后，男孩的母亲以为他们只是友好拜访，便将男孩放在了其中一人的双臂中。这时男孩笑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的笑容捕捉住了这些人的心。因此他们就离开了，没有执行那可怕的任务。男孩究竟有多大，这并不清楚，但显然他还小，可以抱在成人的怀里。也许，如果他大到八九岁，那些人就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希腊人可能对童年的本质的看法模棱两可，甚至迷惑不解（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但是他们一心一意地热衷于教育。最伟大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Plato）对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的不同方案。此外，他的一些最为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他相信是可以的。）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就连凶悍的斯巴达人，虽不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强调思考和学习，但也建立了学校。根据普卢塔克（Plutarch）在《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Lives）里所写的利库尔戈斯[1]的一生，斯巴达人把7岁的男孩招进学校，让他们在班上共同训练和玩耍。他们也学习读书、写字。“只教一些，”普卢塔克告诉我们，“刚够满足他们为国效力的需要。”

至于雅典人，众所周知，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其中有些成为向世界各地传播希腊文化的工具。他们有运动场，有为18到20岁刚成为公民的男青年开办的大学，有演说家训练学校，甚至有教认字和算术的小学。青年教师的年龄，拿小学来说吧，会比我们想像的更年长（许多希腊男孩长到青春期才开始学习认字）。凡是有学校的地方，人们

1　利库尔戈斯（Lycurgus，约前390—约前324），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译者注

就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不过，人们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希腊人热衷于办学校，就意味着他们的童年概念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即便我们把斯巴达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管教方法在现代人看来是折磨——希腊人在如何管教未成年人方面，并不具备现代人认为是正常的同情心和理解。“对于管教儿童的方法问题，”劳埃德·德莫塞（Lloyd deMause）指出，“我收集的证据导致我相信，在18世纪以前，有很大一部分儿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受虐儿童’。”[1]确实，德莫塞推测，“一百代做母亲的”被动地看着自己的婴孩承受各种苦难，因为母亲（很显然，还有父亲）缺乏同情儿童所必要的心理机制。[2]他的这种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生活在今天的父母没有能力去同情儿童的，这居然是在有了儿童意识的400年之后。因此，当年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里说起收拾不听话的儿童时，提出要用“恐吓和棍棒，像对付弯曲的树木一样”，将他们扳直。我们可以相信这是比古老的警告——孩子不打不成器——更为原始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尽管他们有学校，尽管他们关心如何把美德传给青年，但希腊人还是会对儿童心理学或者儿童养育概念大惑不解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希腊人为我们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把许多观念的产生看作是人类智力开化的结果。对于童年的诞生，我们应当感谢希腊人的贡献。他们虽然没有创造出童年，但是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在2000年以后，当童年产生时，我们便能识别它的希腊之源。

当然，罗马人借用了希腊的教育思想，但他们发展出了超越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比如，罗马艺术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意识，

---

1 德莫塞，deMause，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0页。

2 同上，第16页。

包括未成年人和成长中的孩子的意识。这种艺术表现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在西方的艺术中再现”。[1]此外，罗马人开始把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观念联系起来，尽管这在现代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且，在探讨童年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社会衰退的问题时，我需要引证这种联系。其目的，说实在话，就是**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罗马人把握了这个精髓，值得永远受到赞扬，尽管看来他们把握的还不是全部，也不够全面。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写过一篇出色的探讨教育的文章，他谴责同辈们在罗马贵族儿童面前所表现的无耻行为：

> 假如他们说话过于自由，我们感到满心欢喜；一些我们不该容忍的字眼，即便是从亚历山大的侍从官口中说出，人们还是报之以欢笑和亲吻。……他们听到我们使用那些字眼，看到我们的主妇和奴仆；每一个晚宴都喧闹非凡，充斥着令人恶心的曲调，一些我们本应羞于提及的事物被呈现在他们眼前。[2]

在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场景。它提出了童年定义的部分含义，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尤其是性秘密。昆体良责备成人忽略了向未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诺伯特·伊莱亚斯在他的巨著《论文明之进程》中表示的看法的极好例证。他宣称我们开明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欲要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私密化（尤其是性冲动），并且在儿

1　普拉姆，Plumb，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Vol. 13，No. 1，Winter 1971，第7页。

2　德莫塞，deMause，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5页。

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人的性欲望和冲动三缄其口，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1]

当然，昆体良是一位演讲术和修辞学的教师。在我们熟知的著作里，他讲述了如何从婴儿期开始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儿童的特性的感受要比多数与他同时代的人进步得多。尽管如此，在昆体良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已知的第一部禁止杀害婴儿的法律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联系的。那部法律直到公元 374 年才出现，比昆体良晚了 300 年。[2]但它是儿童需要保护、养育、接受教育并且免于知晓成人秘密的观念的延伸。

可是，在罗马人之后，所有这一切观念都烟消云散了。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北方蛮人入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学校的教科书很好地论述了时代的变迁，不过有四点经常被忽略，而它们对童年的来龙去脉关系尤深。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而第四点是前三点所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要理解这一后果，我们必须仔细地检讨前三点的发展情况。

为什么人的读写能力会消失？这跟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印刷机的发明之间所跨越的 1000 年内所有的未解之谜一样深不可测。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埃里克·哈夫洛克在《西方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模式框架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他问道，“为什么认识罗马字母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普通百姓都停止阅读和书写，因此先前已经社会化的大众识字文化回复到事实上的工匠识字文化的状

---

1 伊莱亚斯，Elias，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182页。

2 德莫塞，deMause，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8页。

态，又一次颠倒了历史的步伐？”[1]哈夫洛克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区分了“社会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的不同。所谓社会识字文化（social literacy），他指的是一种几乎大多数人都能够读书、并且的确读书的状态。所谓工匠识字文化（craft literacy）[2]，他指的是阅读的艺术局限在一些构成“抄写一族”的人，他们于是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定义一个识字文化（literate culture）不是基于它是否拥有一个文字系统，而是基于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识字，那么识字能力为什么会下降就很容易找到一些貌似有理的推断。

其中一种推断便来自哈夫洛克。他指出，在愚蠢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字母书写的风格层出不穷，字母的形状五花八门，不易辨认。这么看来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要使识字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辨认（正是希腊文中用来表示识字的词）必须快速而且不假思索。也就是说，字母的形状必须一目了然，因为有关字母写作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一旦人们学会这些字母，就无须再考虑它们。它们在人的心理上消失，不会在读者和语音记忆之间形成思维障碍。如果书法只注重字形本身，或是书写模糊不清，让人费解，那么识字的主要意义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字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民众。哈夫洛克写道：“精湛的书法技巧刺激了工匠识字文化，而后者又助长了书法艺术求新求变，而这种情况正是社会识字文化的劲敌。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希腊和罗马版字母遭遇的不幸经历足以证明这个事实。”[3]在欧洲所发生的，简单地来说，不是字母消失了，而是人们理解字母的能力丧失了。再引用一段哈夫洛克的话：“有一段时间，欧洲人的识字能

1　哈夫洛克，Havelock，Eric.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52页。

2　craft意指手艺、工艺。识字能力成为一些人谋生的手艺。台湾版将之译成“专家”。但译者认为“工匠”在此更确切。

3　哈夫洛克，Havelock，Eric.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65页。

力实际上回复到了跟希腊文明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相似的状态。”[1]

还有一种关于读写能力之所以丧失的解释，它和前一种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古代纸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来源变得稀少；若不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是严酷的生活现实不允许人们花费精力去生产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纸张是到了13世纪才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的。这时，欧洲人立即开始生产纸张。不过，他们不是用手和脚这样古老的方式造纸，而是用水能驱动的工厂来造纸。[2]中世纪一些优秀的大学纷纷建立，与之相呼应的是人们对识字又旧情复燃，这恰好跟引进纸张和生产纸张同时发生。这种巧合的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几百年来，欧洲匮乏书写用的平面物品，从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社会识字文化发展的局面，这种说法看来合情合理。

我们同样可以推断，罗马教会并不是没有看到工匠识字文化的好处，因为它是一种能够控制数量众多而且多元化的人口的工具，也就是说，它能控制数量众多而且多元化的人民的思想、组织和忠诚。当然，教会可以提倡一种更有限的文字使用，让它的预备修士们组成一个抄写阶层，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神学和知识的奥秘。即使教会这样做，也完全是符合教会的利益的。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社会识字文化消逝了近1000年，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任何解释能比一个中世纪读者劳心劳力地阅读一个文本这样的图景更能表达文字消逝的含义。除极少数例外，中世纪的读者，无论年龄大小，都不会、也不能像我们一样的阅读。假如中世纪的人有机会看到现代读者迅速翻阅一本书的情景：悄然无声，眼球快速地转动，嘴唇完全不动，他也许会把这看作魔术表演。典型的中世纪读者阅读时跟那些倔强的一年级学生不相上下：逐字逐句，喃喃自语，高声朗诵，用

---

1 哈夫洛克，Havelock，Eric.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65页。

2 Gimpel，Jean. *The Medieval Machine*. New York：Holt，Rinchart & Winston，1976.

手指点着每个字，并不考虑弄懂这些字的含义。[1]而且，这里我指的还是中世纪的学者，因为大多数人是根本不读书的文盲。

这表明，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交往都是通过口头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的。在中世纪，巴巴拉·塔奇曼[2]告诉我们："一般人主要通过耳朵来 获得知识。他们聆听公开的布道，观看神秘剧，听人们朗诵叙事诗、唱民谣和讲故事。"[3]因此，欧洲人回到了一种人类交流的"自然"状态，一种以谈话为主、通过歌唱来强化的状态。纵观人类的历史，那正是人类办事和创造文化的方式。诚如哈夫洛克所指出的，从生物学上看，我们毕竟都是口语动物，我们的基因是为口语而设定的。另一方面，读写能力是文化熏陶的产物。[4]对于这一点，极力倡导"高尚的野蛮人"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定会表示赞同，他甚至会补充说，人类若想 尽可能生活得靠近自然，他们必须鄙视书本和阅读。在《爱弥儿》（*Emile*）一书中，卢梭告诉我们："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相信，卢梭是正确的。如果人们把他的话解释为阅读是**永久的**童年的结束，那么，阅读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阅读使人得以进入一个观察不到的、抽象的知识世界，它在不能阅读和能够阅读的人之间产生了分化。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包括地图、图表、合同和产权契约，收集并保存了各种有价值的秘密。因此，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在文字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

1　Chaytor，H.J. *From Script to Print*. Cambridge，England：The University Press，1945,第10页。

2　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1912—　），美国历史学家。所著《八月的炮声》（1962年）曾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3　塔奇曼，Tuchman，Barbara W. *A Distant Mirror*.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8,第61页。

4　哈夫洛克，"The Coming of Literate Communication to Western Cul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Winter 1980，第91页。

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诚如塔奇曼女士所指出，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人，不论年龄大小，其行为都以幼稚为特征的原因所在。[1]在口语世界里，成人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此，儿童的概念就更不用提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表明中世纪的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的原因所在。为什么是7岁？因为儿童在7岁时已经能够驾驭语言。他们会说而且明白成人所能说的和理解的一切。他们知道通过口舌透露的一切秘密，而他们知道这些秘密已经足够了。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天主教会指定7岁为理性的年龄，即人长到7岁时便应该明白是非的差别。这种现象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直到17世纪用来指代青年男性的词也可以用来指代30、40或50岁的男子，因为在法语、德语或英语里，指代7岁到16岁之间的青年男性的词并不存在。**“儿童”**这个词当时表达的是亲属关系，与年龄无关。[2]然而，最重要的是，中世纪的口语文化有助于我们解释当时为何没有小学，因为人的生物结构决定人的交际能力，所以开设那样的学校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学校在中世纪并非完全不为人知。一些学校跟教会有关，还有一些是私人办学。但是，中世纪完全缺乏通过初级教育来教人们读书写字，为继续学习奠定基础这样一个概念，这恰好证明了它也缺少文字教育的概念。中世纪的学习方式是口口相传的方式；它基本上是通过学徒和服务，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在职训练”来完成的。当时存在的学校的特点是，“缺乏根据题材难易程度来编排课程的分级制度，各种题材同时教授、学生年龄混杂不一和学生自由选课”。[3]若是中世纪的孩子能

---

1 塔奇曼，Tuchman，Barbara W. A Distant Mirror.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8，第53页。

2 普拉姆，Plumb，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Vol. 13，No. 1，Winter 1971，第6页。

3 阿里耶斯，Ariès，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20页。

去上学，他也要到了10岁、甚至更晚才会开始。他可能住在城里的客栈，远离家人，独自生活。在他的班里发现各种年龄的成人，也是常见的事。而且他不会把自己看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他自然不会发现学生的年龄和他们所学的内容之间有什么联系。课上教授的内容会不断地重复，因为一直有新同学到来，他们没有听过老师先前所讲的内容。当然，那时没有女学生。只要学生们从教室纪律的约束下释放出来，在外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想做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世纪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也没有学习需要具备必要前提和循序渐进的概念，更没有学校教育是为进入成人世界作准备的概念。正如阿里耶斯总结的："中世纪的文明已经忘记了古人养育儿童的方法，但对现代教育又一无所知。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不懂教育为何物。"[1]

人们一定会立即补充说，中世纪也没有羞耻的概念，至少没有现代人所理解的羞耻心。如昆体良所说，羞耻的概念部分地在于相信有秘密存在。人们可以说，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适宜儿童知道；若将这些东西不加区分地暴露给儿童，确实是不体面的。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是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但是，只有在一个严格区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并且有表达这种区别的社会公共机构存在的文化里，这种想法才是可行的。中世纪没有这种区分，因而也没有这样的社会公共机构。

中世纪的孩子身处在一个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跟成人一样的社会范围，没有分离机构加以限制。他们有机会接触该文化中几乎一切的行为方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个7岁的男性都是一个男

1　阿里耶斯，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411页。

人，除了他不会做爱、不会发动战争。[1]“当然，” J. H. 普拉姆写道，“那时没有分离的童年世界。儿童跟成年人一样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玩具，听同样的童话故事。他们在一起过同样的生活，从不分开。布鲁格赫尔（Brueghel)）所描绘的粗俗的乡村节日，展示男人和女人沉迷于饮酒，在放纵的情欲驱使下公然互相触摸，孩子们在一旁和成人一道吃吃喝喝。”[2]

布鲁格赫尔的描绘其实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两点：当时的文化不能够、也不情愿对儿童有任何隐瞒。这是羞耻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当时也没有16世纪为人所知的礼仪。这是羞耻概念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社会并不存在一套内容详实的礼仪可供未成年人学习。在中世纪，礼仪规则究竟有多么贫乏，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直至1523年，伊拉斯谟才在《避难所》（*Diversoria*）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德国客栈：客栈里有八九十人坐在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年龄各不相同。一个人在洗衣服，然后挂在炉上烘干，另一个人在桌子上清理靴子。店里有一个盆供大家来洗手，但里面的水很脏。大蒜的气味和其他各种气味四处飘逸。随时可见有人吐痰，而且吐到哪里也随心所欲。人人都大汗淋漓，因为房间里温度太高。有些人在衣服上擦鼻涕，并不转身回避。当饭端进来时，人人都把面包伸进一个公用的菜里蘸一下，然后咬一口，再伸进去蘸一下。没有叉可用。人人都用手在同一个盘子里拿肉，从同一个高脚杯里饮酒，从同一个碗里喝汤。[3]

为了理解人们何以能够忍受这一切——其实，他们甚至根本不在意这些——我们必须明白，诚如诺伯特·伊莱亚斯所提醒我们的：“当时那些人处于一种跟我们如今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这不仅牵涉清楚、理性的意

---

1 普拉姆，Plumb，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Vol. 13，No. 1，Winter 1971，第6页。

2 同上，第7页。

3 这个描述是伊莱亚斯原话的意译，伊莱亚斯，Elias，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72页。

识程度；他们的情感生活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特点。”[1]例如，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私人空间的概念；他们不会对人体的某些气味或身体的功能感到不快；他们不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身体的机能有什么可耻；他们跟别人的手和嘴接触也不会反感。有鉴于此，当我们了解到中世纪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们对婴儿进行早期的大小便训练，也就不足为奇了。[2]也许我们会设想当时的人丝毫不避讳在儿童面前谈论性的问题，其实事实正是如此。成人从未想过要隐瞒性冲动，不让儿童知道性秘密更是闻所未闻的。“在儿童面前，成人百无禁忌：粗俗的语言，淫秽的行为和场面；儿童无所不听，无所不见。”[3]确实，中世纪的成人可以随意玩弄儿童的性器官，这是很常见的。在中世纪人的心目中，这种做法只是粗俗的玩乐而已。阿里耶斯评论道：“玩弄儿童的生殖器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传统……”[4]但是在今天，那传统可以让你坐30年的牢。

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这些都是中世纪童年不存在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生活条件的严酷，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部分是因为儿童不能存活，成人不会、也不能以我们视为正常的标准给予儿童那份感情的承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生许多孩子，寄希望于两个或三个能活下来。基于这些原因，人们显然不能让自己对小辈投入太多的感情。阿里耶斯引用了一份文件中某个邻居对一个母亲说的话。这个母亲有5个孩子，当时心情烦躁几近发狂。为了安慰母亲，邻居说：“他们还没长到来烦你的时候，

1　伊莱亚斯，Elias，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69页。

2　德莫塞，deMause，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39页。

3　Pere de Dainville，转引自阿里耶斯，Ariès，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103页。

4　阿里耶斯，Ariès，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103页。

就会有一半、甚至有可能全部夭折。”[1]直到14世纪后期，儿童才出现在遗嘱里，这恰好表明成人并不指望他们能活很久。[2]实际上，很可能正因为如此，在欧洲有些地方，儿童被当作是中性的。例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人们并不记录死亡的孩子的性别。[3]但我相信，过度地强调儿童的高死亡率，用它来解释中世纪童年这个概念不存在的原因，是错误的。在伦敦，1730年至1779年间死亡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年龄在5岁以下，然而，那时英国早已经有“童年”这个概念了。[4]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正如我在下一章试图阐述的，由于印刷和社会识字文化的出现，一种新的传播环境在16世纪成形了。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在新的传播环境到来之前，婴孩期在7岁结束，成年跟着就开始了。这中间没有过渡阶段，因为没有这种需要。正因为如此，所以16世纪以前没有关于养育儿童的书，关于妇女应该如何承担母亲这个角色的书也极为罕见。[5]正因为如此，所以儿童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包括葬礼，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知道死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像儿童文学这样的东西当时并不存在。其实，在文学作品里，“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通常是淹死、窒息而死或遭遗弃……”。[6]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儿科学的书根本不存在。此外，为何

---

1 阿里耶斯，Ariès，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38页。

2 Burke，James. Connections. Boston：Little，Brown Company，1978，第161页。

3 塔克尔，Tucker，M. J. “The Child as Beginning and End：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31页。

4 平奇贝克，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Volume Ⅱ：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Children Act of 1948.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3，第300页。

5 塔奇曼接着说明，女性大多数被描绘成“通俗故事里的调情者、妓女、不忠的妻子；戏剧里的圣人和烈士；浪漫传奇里的狂热、非法情爱的不可及的尤物”。塔奇曼，第50—51页。

6 塔奇曼，Tuchman，Barbara W. A Distant Mirror.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8,第50页。

绘画作品一概把儿童画作微型的成人，因为只要儿童一旦脱离尿布，他们马上就穿得像成人一样，符合他们各自的阶级身份。成人和儿童使用的语言也别无二致。比方说，17 世纪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儿童的专用语；而 17 世纪之后，儿童专用语又多得不计其数。[1]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大多数儿童并不去上学，因为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可以传授给他们；多数儿童离家出走是去干低下的粗活或者当学徒。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童年的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塔奇曼这样总结道："在涉及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种种特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时候对儿童相对缺少兴趣。"[2]

此后，谁曾料到，一个来自德国美因兹的金匠，凭借一台破旧的葡萄压榨机的帮助，使童年的概念得以诞生。

1　阿里耶斯，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47页。

2　塔奇曼，Tuchman，Barbara W. *A Distant Mirror*.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8,第50页。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很显然，像童年这样的概念得以产生，成人世界一定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重要性上，而且一定要性质特别。具体地说，它一定要产生一个新的“成人”定义。在中世纪，曾经发生过各种社会变化，出现过一些重要的发明，例如机械钟，还有许多其他的重大事件，包括黑死病。但所有这些都不要求成人对“成人”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修改。然而，在15世纪中叶，这样的事件的确发生了，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本章的目的在于阐述印刷机的发明如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而这个符号世界却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年的概念。就定义而言，新的成年概念不包括儿童在内。由于儿童被从成人的世界里驱逐出来，另找一个世界让他们安身就变得非常必要。这另外的世界就是人所众知的童年。

世界上至少有7个城市自称是印刷机的诞生地，每个城市都指认一个发明家。这样的争议，就其本身而言，就印证了印刷机所带来的一个最惊人的影响，即它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名声和个人成就的追求。“这并非偶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印刷机：变化的动因》中是这样评论的，“……印刷机是让人类卷入争夺优先权和竞争国家占有权的第一

个发明。”[1]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指出，因为印刷使一个人说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印刷机恰似一部时间机器，很容易跟 H. G. 威尔斯（H. G. Wells）的小发明一样富有影响力，让人感到好奇。像另一部了不起的时间机器——机械钟一样，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是，路易斯·芒福德[2]认为，钟表消灭了“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入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永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究竟是谁发明了马镫、大弓钮扣，甚至眼镜，没人知道，因为个人成就的问题在中世纪几乎不受重视。其实，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作家”这个概念，用现代意义来衡量是根本不存在的。圣博纳文图拉（Saint Bonaventura）为我们详细描绘过 当时所谓的作家。他说，在 13 世纪，做书有四种方法：

> 有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依样画葫芦，不作任何添加和改变，这种人仅仅被称作“抄写员”。……另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添加一些别人的意见，他被称作“汇编者”。……另一种人既抄写别人的作品，也写自己的，但以别人的作品为主，添加一些自己的解释，他则被称作“评注者”。……还有一种人既写自己的作品，也写别人的，但以自己的作品为主，加别人的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称为“作家”。……[3]

1　爱森斯坦，Eisenstein，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19页。

2　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　），美国人文学者、教师。撰有大量有关美国文学、艺术和建筑的论著，内容集中于一个主题，即共同行动可以改善生活素质。——译者注

3　转引自爱森斯坦，Eisenstein，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21—122页。

圣博纳文图拉所说的不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原创著作，而且他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把文字抄写下来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所以个人的概念、高度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在抄写传统下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抄写者在抄写时不仅会抄错，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添加、删减、澄清、更新甚至以自己的需要对抄写的内容进行改写。就连英国大宪章这样如此珍贵的文献，虽然每年都会在英格兰各郡通读两次，但是到了 1237 年，它已成为争议的焦点，原因是人们无法确定几个版本中哪一个是真的。[1]

印刷术发明之后，“谁写了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跟“谁干了什么”的问题也变得一样重要。后世变成了一个活的概念，哪些名字可以合法地流芳后世，是一件值得奋斗的事情。从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推断，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既定的传统，即我认同约翰·根斯弗莱希·谷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Gutenberg）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尽管此类印刷术最早的记录，其实是谷登堡的搭档——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和彼得·舍费尔（Peter Shoeffer）所印刷的《美因兹的诗篇》（*Mainz Psalter*）。但无论是谁真正享有所有权，无论是谷登堡、劳伦斯·科斯特（Laurens Coster）、尼古拉·詹森（Nicolas Jenson），还是富斯特、舍费尔等等，[2] 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谷登堡宣布他已成功地制作了一本书，且“不用芦苇、尖笔或水笔，而是靠奇妙的冲压和活字之间的一致、比例和协调……”[3] 时，他，包括其他印刷匠，并不知道他们已为社会注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巧妙装置，也就是说，墙上的打印文字，正清楚地说明中世纪的末日来临了。虽然许多

---

1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119页。

2 有关各种各样宣称所有权的全面讨论，参见巴特勒，Butler, Pierce. Origin of Printing. Cambridge, England: The University Press, 1945, 第88—110页。

3 转引自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19页。

学者就这一事实提出了看法，迈伦·吉尔摩在《人道主义的世界》中的陈述非常直截了当地概括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知识生活的状态带来了最巨大的变革……它的影响迟早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中被感受到。"[1]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2]最简单地来说，每一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例如，我们无法知道，当时谷登堡心里在想什么，使得他把葡萄压榨机跟图书制作联系了起来，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他毫无意愿扩大个人主义，或者，就此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用阿瑟·凯斯特勒[3]的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发明家都是梦游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弗兰肯斯坦"[4]，而把这整个过程称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Frankenstein Syndrome），即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如英尼斯试图揭示

1　吉尔摩，Gilmore，Myron. The World of Humanism.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76，第186页。

2　对此，詹姆斯·凯里，伊利诺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在一篇未出版的论文里作过概括，"加拿大传播理论：哈罗德·英尼斯学派的延伸和说明"（"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eory：Exten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arold Innis."）。

4　勒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　），匈牙利出生的小说家、科普作家、新闻记者和评论家。撰写过有关道德和政治责任等问题的作品。——译者注

5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s），著名电影怪物角色。出自1818年M.W.雪莉写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书中弗兰肯斯坦是一个专攻秘术的瑞士学生，他造出了这个怪物，而最终却被他所造的这个怪物杀死。但后来弗兰肯斯坦却成了这个怪物的名字。——译者注

的——还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一部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时间概念，如机械钟；或者空间和规模的概念，如望远镜；或者知识的概念，如字母；或者改善人类生物性能的可能性，如眼镜。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1]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技术的后果总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后果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创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魔鬼”，当它醒来后向四周望去，发觉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又回去倒头大睡了。在18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有马镫可利用，可惜当时没有天才看出它那些可能的用途。法兰克人既有马镫，还有查理·马特尔[2]的天才，因而他们用马镫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后来更不用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3]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谷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版印刷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们的“魔鬼”又回去睡觉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墨西哥的原住民阿兹特克人（Aztecs）发明了轮子。后来，他们把轮子安装在儿童的玩具上，就以为它的潜在价值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技术未必一定向文化注入新思想的实例。

小林恩·怀特用另一个比喻来阐述这个观点，他说：“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增加，我们很清楚，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它不会强迫人类走进去。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或者若是接受

---

1 转引自詹姆斯·凯里未发表的论文。

2 查理·马特尔（Charles 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732年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阿拉伯人，阻止其向西欧扩张，获“马特”（意为“锤子”）称号。——译者注

3 详细研究马镫对欧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影响，参见小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了，它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像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1]

当然，就谷登堡的印刷术而言，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文化已是万事俱备，准备接受它的。欧洲不仅有2000年历史的字母书写系统，而且有相当丰富的手稿传统。这意味着有许多重要的文本等待印刷出版。欧洲人早就知道如何造纸，而且已经有了200年的历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文盲很普遍，但会读会写的抄写员还是存在的，他们能教别人读书写字。13世纪时，欧洲重振学习的风气，并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这些都刺激了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随后，欧洲的商业发展和探险时代的开始又刺激了对新闻、耐久的合同契约、可靠和标准的地图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15世纪中期，欧洲的知识状况使得印刷术成为必需。这无疑也说明了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事实。用怀特的比喻就是，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

要认识印刷的一些含义，并不需要天才。在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共印刷了800多万本书。到了1480年，共有110个城市拥有印刷机，它们分布在6个不同的国家。然而，仅意大利一国，就有50台印刷机。到了1482年，威尼斯成了世界印刷之都，而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一个威尼斯人，很可能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忙的印刷商。他店外的招牌显示了他用双关语的天分，也表明了他的生意状况：“若想跟阿尔杜斯说话，快，时间紧迫。”[2]阿尔杜斯有半数的雇员是遭流放的希腊人或难民，以至于在1515年他去世时，每一个知名的希腊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印刷出版了。[3]

1　怀特，White，Lynn，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Clarendon Press，1962，第28页。

2　原文为Time presses。press在此意为“紧迫”，但press同时又有“印刷”的意思。因此阿尔杜斯巧妙地用了一个双关语。

3　Burke，James. *Connections*. Boston：Little，Brown Company，1978,第105页。

大约在阿尔杜斯去世的时候，印刷开创了第一个记者职业、第一个文学敲诈者、第一个色情作品的批量生产者，这三种身份全部集中在皮特罗·阿伦提诺（Pietro Arentino）一人身上。[1]阿伦提诺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我们也可以把忏悔性写作（confessional writing）的起源归之于他。除个别例外，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过去的文学传统从未有过暴露私人生活的作品，也没有个人观点得以公开表现的既定“声音”或语气，自然也没有对想像中的、其实不存在的人群讲话的习俗。[2]阿伦提诺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教诲（因为此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抢先印出一连串的反教权主义的淫秽作品、诽谤性的故事、公开的指责和个人观点。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新闻传统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不衰。他发明的“黄色”新闻和与此相应的表现风格，使他名利双收。当时他以“王公贵族的祸患”著称，是那个时代的“公民凯恩”[3]。

阿伦提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传统。他以亲切的措辞满足了一大批无形的大众。如果说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这种新文学传统的肮脏的一面，那么蒙田（Montaigne）的作品则代表了较有益的一面。蒙田生于1533年，那时阿伦提诺已经41岁了。蒙田发明了一种写作风格、一种语言形式、一种人格面貌。通过这些手法，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沉着自信而且直言不讳地向无形的当代之人和后世之人表达意见。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就像民谣提倡公众观念一样，蒙田的随笔提倡个人主义，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就它的谦逊、幽默、睿智而言，蒙田的作品不赞美公众，却只赞美他自己，赞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怪僻和偏

---

1 麦克卢汉，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第233页。

2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230页。

3 公民凯恩是同名美国影片中的报业巨头。——译者注。

见。400 年后，当诺尔曼·梅勒（Norman Mailer）写出了《自我推销》（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书时，他只不过是在延续蒙田的传统，给它一个恰当的名称而已。这个传统就是作者自我宣传，自我暴露，作者作为个人对立于社会。麦克卢汉以其独特的方式说道："凭借着印刷，人们立即发现了方言能够广泛传播的功能。"[1]麦克卢汉想到的不只是阿伦提诺和蒙田，他还特别提到了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拉伯雷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歌颂的能力是举世无双的。例如，他吹嘘说他的《高康大》（Gargantua）在两个月内卖掉的册数要比《圣经》在十年里卖掉的都要多。[2]由于这番话，他被指责为违反神旨和亵渎上帝。这一段插曲让人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约翰·列农说披头士乐队比耶稣基督更有影响，因此也遭到了严厉的谴责。问题的关键在于抄写文化是跟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知识个性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抄写文化的状态……压制了人的自恋情结。"[3]而印刷却使它获得解放。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4]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 16 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

1　麦克卢汉，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第233页。

2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400页。

3　同上，第233页。

4　直至19世纪，为面对公众讲话而进行训练的阅读传统依然存在。例如，《麦克古菲丛书》（*The McGuffey Readers*）的目的重在训练耳朵而不是眼睛。

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列奥·洛温塔尔（Leo Lowenthal）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1]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当然，童年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它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成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转的特征。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从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因此，比方说，到了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儿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将之称为"必要的损耗"）的情况已经大部分消失。实际上，大约在16世纪末，儿童的死亡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父母的坟墓上。也许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正好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然而，单有个人主义并不能产生童年。童年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将人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基础。因此，还需要另一个动因的出现。这个动因也的确出现了。由于没有更好的措辞，我暂且称它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地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

---

1 洛温塔尔，Lowenthal，Leo.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Beacon Press，1957，第41页。

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线。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术发明以后，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这些内容都在书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路易斯·芒福德是这样描述这种状态的："印刷的书，比其他任何设备都更能把人从此时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印刷品使事件变得比它本身更有影响……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变得更虚无缥缈。**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1]

书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人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首先，有"入门工具书"（"how to do it"）：有关冶金学、植物学、语言学、礼仪规范，终于还有了儿科医学方面的书。托马斯·费尔（Thomas Phaire）在1544年出版的《儿童之书》（The Book of Children）一般被认为是英国人写的第一部有关儿科学的书。〔意大利人保罗·巴杰拉尔多（Paolo Bagellardo）出版的一本比他更早，在1498年。〕费尔在书中建议使用出牙嚼环，并面面俱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可能患的"严重和危险的疾病"，包括"apostume of the brayne"（很可能是脑膜炎）、噩梦、瘙痒、眼充血、腹绞痛和肚子胀气[2]儿科学和礼仪书籍的出版强烈显示，在印刷机发明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童年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核心问题在于，印刷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爆炸"。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人，人们需要超越习俗和原有的记忆，去探索过去不知道也不曾考虑过的世界。因为除了一般信息，如在"入门"类书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指导和手册里可以找到的，在商业世界里，还有印在纸张上的、日多一日的合同、契约、期票以及地图。（毫不奇怪，在信息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可以重复时，地图绘制员开始将"天堂"从他们的图表

1　芒福德，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34, 第136页。

2　平奇贝克，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Ⅰ: 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第5—6页。

上删除，理由是它的地点太不确定了[1]。）

事实上，如此多的信息、如此五花八门的种类不断被生产出来，书商已不再可能用抄写的手稿来作为书的模型。到了16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实验新的出版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用阿拉伯数字来编页码。第一个为人所知的这样编页码的实例，是约翰·弗罗本[2]所出的第一版伊拉斯谟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印刷于1516年。编排页码必然导致更精确的索引、注释和相互参照。这又反过来或导致、或同时伴随着其他创新，如标点符号、段落标题、分段、书名页和页首标题。到了16世纪末，机器制作的书已经有了一种排印格式，从外表上看，其实在功能上，都可以和今天的书媲美。在16世纪早期，书商们关心的是书籍格式的美观和效率。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头十年》（*First Decennale*）当时非常成功。该书的印刷商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本书的一个盗版。他把那盗印的版本描绘成"蹩脚的廉价货……破烂的装订，没有页边，很小的书名页，前后都没有扉页，歪歪扭扭的字形，有许多印刷上的错误"。[3]

在此很值得回想一下哈罗德·英尼斯提出的原则：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印刷书籍所具有的一成不变的线性特点——一句一句排列的序列性，它的分段，按字母顺序的索引，标准化的拼写和语法——导致一种詹姆斯·乔伊斯[4]戏称为"ABC式"的思维习惯，即一种跟排

---

1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78页。

2 约翰·弗罗本（约1460—1527），瑞士巴塞尔最著名的印刷家，出版过许多学术名著，第一部出版物是1491年出版的拉丁文《圣经》。——译者注

3 Barincou, Edmond. Machiavelli.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5.

4 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1920年起定居巴黎。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译者注

版结构非常相似的意识结构。对于印刷术的这个结果，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即便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这样小心翼翼的学者也相信，新兴的书籍的版式，它特有的编纂信息的方式，“有助于重新整理所有读者的思想，而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1]

人们不会怀疑把书组织成章节的形式逐渐成为公认的组织课题的方法：书籍呈现材料的形式演变成该学科的原理。爱森斯坦列举了法学领域里一个有趣和显而易见的例子。中世纪时，由于很少有老师完整地看过《法典大全》（*the Corpus Juris*），因此教授《法典大全》的老师既不能向学生、也不能向自己说明每一个法律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跟完整的原理体系相联系的。但从1553年开始，以印刷为目的的一代法律学者着手进行编辑整部手稿的任务，包括重新组织各个部分，根据内容把它们归入不同的段落，以及为引文编制索引。这样做，他们使这部古典文献变得完全可以为读者所用了，文体上明白易懂，内在逻辑通畅。也就是说，他们彻底改造了这个学科。[2]同样地，爱森斯坦指出：“仅仅是为教授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等级的课本作准备，就等于鼓励重新评审既定的步骤和重新安排对不同领域的处理方法。”[3]换言之，同一学科往往有不同的课本，但这些课本在各部分安排的顺序上要有一致性；而确定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过程，便是课本作者在改造他们的学科领域。

与此同时，无可避免的是，16世纪的书籍的编辑非常注意书籍内在组织的清晰度和逻辑性。“每个学科都能够按主题来处理的信条，”杰拉尔德·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写道，“最好的阐述方式是通过分析

1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105页。

2　同上，第103—104页。

3　同上，第102页。

来进行。出版商和编辑都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信条。”[1]当然，他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价值观，是针对一个学科来对人类思想进行组织的最好方法。它是书籍和排版结构所固有的价值。但它决不是唯一的价值。当书法消失时，别具风格的手稿也随之消失了，不具个人色彩和可以反复使用的印字排版承担了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直到今天，尽管作家还是各具特性，一般人仍然倾向于相信印刷出来的东西。的确，无论印刷的书籍怎样缺少独特的个人印记，就像课本和百科全书，但是人们把印刷的书籍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之声的潮流几乎难以抗拒。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排版决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当然，书页的排版结构以及印刷书籍的便于携带和可重复再版，不仅对随笔散文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以小说著称的文体的产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早期的小说家自己本身就是印刷商，如塞缪尔·里查森（Samuel Richardson）。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写作人类第一部科幻小说《乌托邦》（*Utopia*）时，参与了印刷该书的每一阶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决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像拥有阅读能力在十六七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句子的小偷只会受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罪犯保尔能

1 转引自爱森斯坦，Eisenstein，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02页。

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小偷的判刑记录。他们在 1613 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Sussex）的公爵家而被判刑。[1]

印刷术首次使方言进入大众媒介。这个事实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容置疑，固定的视觉语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沙文主义恰好跟印刷的发展同时发生：“母语”的观念是排版的产物。基督教新教主义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动乱像新教改革一样跟印刷有更直接、更无可争辩的联系。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路德主义和书是分不开的。尽管路德很精明，很善于用印刷的小册子和书籍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但是他有时也对印刷无可置疑的威力感到惊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在给教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论文……是如何传播到那么多地方去的。它们原本只是针对我们当地的学术界的……我文章中所用的语言是平民百姓几乎看不懂的。”如果路德听说过苏格拉底（Socrates）在《斐多篇》（*Phaedrus*）里表述过的有关写作的警告，也许就不会如此大惑不解了。“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在此忽略了印刷书籍的可携带性。虽然他的论文是用学术性的拉丁文写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德国各地和其他国家，而印刷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译成不同的方言。

当然，路德极力提倡用方言印刷出版书籍，同时大大利用书面语可以四处传播“不知道该给谁看”的事实。他撰写了德语版的《圣经》，

1　斯通，Stone，Lawrenc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1500—1640.” Past and Present，No. 28，July 1964，第43页。

因此“上帝的信息”传到了人数最多的民族。如果在此处大谈印刷术和宗教叛乱之间诸多的相互联系，显然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是强调下面的事实是非常必需的，即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厨房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或者说，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开始这样相信。“基督教，”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道，“是书本的宗教，即《圣经》。一旦《圣经》不再是只有牧师才能宣读的文字和由他们严格把持的秘密，建立文字社会的压力也应运而生了。”[1]《圣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内容，同时也成为人们用以思考的工具。假如世上有媒介和信息在倾向上不谋而合的实例，那就非印刷术和基督教新教主义莫属了。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了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受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现代科学取代中世纪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印刷术的作用。哥白尼（Copernicus）是在15世纪末诞生的。许多科学家如安德里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提科·布拉赫（Tycho Brahe）、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伽利略（Galileo）、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和笛卡尔（Descartes），他们都出生在16世纪；也就是说，现

---

1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76—77页。

代科学的基础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的100年内已经奠定。只要仔细想想1543年，人们也许就能体会到从中世纪的思想到现代科学观念的转变是多么引人注目。在那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和维萨里的《人体结构》（*De Fabrica*）同时问世了，前者重新改写了天文学，而后者则改写了解剖学。新的传播环境究竟是如何使科学发现和天才层出不穷的呢？

首先，印刷不仅创造了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来源，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其次，标准化的印刷形式导致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因此，伽利略可以把数学称作“自然的语言”，并且自信其他科学家也能使用和理解这种语言。此外，标准化的印刷大半消除了文本中的模糊不清，并减少了图解、图表、表格和地图上的错误。印刷使直观教具现成可用，这样也使大自然显得更加千篇一律，因此更通俗易懂。

通过不同的方言，印刷还导致了科学思想的普及。尽管一些16世纪的科学家，如哈维，坚持用拉丁文写作，而其他科学家，如培根，则迫不及待地用方言写作，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中世纪炼金术士把持秘密的时代结束了。科学成为众人之事。培根的《学习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出版于1605年，是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重要科学著作。一年后，伽利略出版了一本显然是在自家印刷的、用方言写作的小册子。伽利略对用方言印刷这种自我宣传的手段所具有的威力并非无动于衷，实际上，他正是利用这种方法确立了自己是望远镜的发明者。另外，中世纪的学者不知道或者无法弄到的各种各样的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如今通过印刷，它们也得以重见天日。例如，英文版的欧几里得到了1570年才首度出版。[1]

到了16世纪末，不仅欧几里得，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的书籍都可供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享用。新形式的文学作品随手可得。

1　欧几里得（Euclid）为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一直流传至今。

《圣经》随手可得。商业文献随手可得。有关机械、农业和医学的实践经验的书籍也随手可得。在100年里，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信息和抽象经验。它要求人们有新技术、新态度，尤其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生存。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

简单地说，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因此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印刷术问世后的头50年被称作“incunabula”，字面上是“摇篮时代”的意思。到了印刷机步出摇篮之时，童年的概念已经进入了摇篮。然而，童年的摇篮期持续了大约两百年。在十六七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J.H.普拉姆在写有关童年的摇篮期时指出：“儿童越来越成为受尊重的对象，它是一个特别的产物，有它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与成人世界分离并受到保护。”[1]“分离”当然是个关键词。在将人进行分离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各阶级的人，其中，儿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人性的范例。但普拉姆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儿童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并非因为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他们被分离，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要学习如何读书写字，如何成

1　普拉姆，Plumb，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Vol. 13，No. 1，Winter 1971，第9页。

为印刷文化所要求的那种人，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起初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究竟能够或者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人们普遍对变得有文化这个过程的认识很天真，正如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认识也很天真一样。例如，商人阶级想要他们的孩子懂得 ABC，以便日后他们可以处理商业世界中的各种文字。[1] 路德会教徒希望人们既能读懂以方言写作的《圣经》，又能读解对教会的不满。一些天主教徒在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灌输对《圣经》进一步服膺的手段。清教徒则希望使阅读成为对抗“无知、亵渎和懒惰这三大罪恶”[2] 的武器。

到 16 世纪中期，天主教徒开始打退堂鼓，不再鼓励人们识字，感到阅读是一个分裂的动原，最后甚至禁止阅读各种方言版的《圣经》，包括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阅读跟异端邪说画上了等号，后来出现禁书书目也是很自然的事。新教徒显然偏爱离经叛道，此外，还寄希望于识字阅读有助于破除迷信。因此，他们继续发掘印刷的各种资源，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新世界。然而，我们发现，长老制的苏格兰其实对让所有人接受识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最强烈的承诺。例如，在 1560 年第一本长老会信纲（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中，他们就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倡议。在长老会教徒的政治权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制定了立法（《1646 年法案》）；在 1696 年他们卷土重来之时，又恢复并强化了这个立法。[3]

天主教背离印刷而新教与之形成联盟的一个结果，是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出现了惊人的颠倒。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文化修养和

---

1 芒福德，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34，第137页。

2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71页。

3 同上，第80页。

情感修养方面要远远高于北欧各国。可是，到了17世纪末，这种局面完全反了过来。天主教保持了一种形象上的宗教。它继续偶像崇拜且变本加厉，过分注意经营教堂和仪式服务的各种细节。基督教新教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结果是阻止偶像崇拜，走向一个禁欲的符号体系。约瑟夫·凯[1]曾经说过，在19世纪，若想把穷人吸引到教会来，人们必须要么像天主教一样“装点场面”，要么像新教徒那样“教育民众”。[2]也许对如何吸引穷人，凯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有识字能力的民族能够开发出比文盲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形象为中心、铺张装饰的天主教对穷人并不一定那么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天主教具体、偶像式的象征符号的各阶层的公众，也没什么不适应。基督教新教则提倡简朴。它的出现对那些早已受到书籍的熏陶、能更抽象地思维的人自然是非常合适的。

此外，这同时意味着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因为当我们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筛选后，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便出现了：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在不列颠群岛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早出现、并且有更清晰的轮廓的原因。早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代，威廉·福里斯特（William Forrest）就倡导小学教育。他提出，儿童在4岁时就应该送进学校去“学一些文学”，这样他们才会理解上帝的旨意。[3]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他的《对话》（*Dialogue*）中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主张设立教区学校，让所有7岁以下的儿童上学。[4]在

1　约瑟夫·凯（Joseph Kay，1821—1878），英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贫民问题。著有《英国和欧洲的贫民教育》、《英国和欧洲人民的社会处境》等。——译者注

2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No. 42，February 1969，第78—79页。

3　平奇贝克，Pinchbeck，Ivy，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Volume 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第23页。

4　同上，第23—24页。

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英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有许多学校的岛屿。在16世纪，许多村庄的村民留下遗产赠物，要求建立免费的学校，使当地儿童能够接受初级教育。[1] W.K.乔丹（W. K. Jordan）作过的一份调查显示：1480年，英国有34所学校。到了1660年，有444所学校，每4400人中便有一所学校，大约每隔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2]

实际上，当时共发展出三种学校：初级或者“小型”学校，教三个“R”——读、写、算；免费学校，教数学、英语作文和修辞；还有文法学校，教英语语法和古典语言学，目的是为大学和律师学院培养青年人才。莎士比亚就读的是斯特拉特福的一所文法学院。他在那里的经历促使他表达了一个著名的意见〔因为他很可能被要求读黎利（Lily）的《拉丁文法》〕。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第二篇中这样写道：

> 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文法学校来腐蚀王国的青年……我要径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许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的可恶的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然而，多数英国人并不赞同莎士比亚所说的创办学校是为了腐蚀王国的青年的说法。其实，英国人甚至不反对送女孩去学校接受教育：诺里奇（Norwich）提供的免费教育对男孩和女孩都是开放的。然而，人们必须明白，去学校接受教育多半是中上层阶级的头号任务，但有根据显示，即使在穷人中也有些妇女是识字的。

不过，男性的识字人数当然要多得多。1612年到1614年间，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审判的204个因初犯而判死刑的男犯中，有95人请求使用“神职人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应付从《圣经》里读一句的挑战，从而免于绞刑的厄

1、2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 第42页。

运。[1]劳伦斯·斯通教授由此得出结论，如果47%的罪犯阶层能够识字，那么整个人口中男性的识字率一定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当然，也可能“罪犯阶层”要比斯通教授想像的更聪明，学习认字属于他们生活中优先考虑的事情。）

无论如何，非常准确的识字率是很难获得的。据托马斯·莫尔爵士推测，1533年，超过一半的人口有能力阅读英文版的《圣经》。多数学者认为这个估计太高，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到1675年，男性的识字率大约在40%。然而，下面这些数字都是确凿无疑的：1642年出版了2000多份小册子。1645年发行了700多份报纸。在1640年到1660年之间，小册子和报纸加起来一共是2.2万份。[2]因此，到了17世纪中叶，“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英国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文化的社会”。[3]无可否认地，到了17世纪初，它的政治领袖都是有识字能力的。在法国，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在英国，最后一个身居高官的文盲是拉特兰郡（Rutland）的第一伯爵。在法国，则是蒙莫朗西元帅（Constable Montmorency）。[4]虽然法国在识字教育方面的成就（即学校的发展）落在了英国后面，但是到了1627年，法国大约有4万儿童在接受教育。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人而设计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形的成人。学校教育开始认同儿童自身的特殊天性。阿里耶斯指出：“在学校上下……按年龄组织安排教学。”正如19世纪的青少年是通过征兵来定义一样，在16世纪和17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中、小学）

1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43页。

2　同上，第99页。

3　同上，第68页。

4　同上，第74页。

“男生”（schoolboy）成为“儿童”的同义词。艾维·平奇贝克和玛格丽特·休伊特（Margaret Hewitt）是这样说的：

> 尽管在传统的〔学徒〕制度下，“童年”实际上在七岁就结束了……但是有组织的正式教育的结果是延长了儿童不必承担成人世界的要求和责任的时间。其实，童年远不是只有些许重要性的生物需求；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而且变得日益重要。[1]

这里所说的是：**童年已经成为对某一阶段象征性成就的描述**。婴儿期在掌握语言技能之后就结束了。童年是以学习阅读开始的。确实，**孩子**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那些不能阅读的成人，包括智力上被认为孩子气的成人。到了17世纪，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亦如普拉姆所说：“识字教育的步骤应该根据儿童的发展来设置：识字应该在大约四五岁时开始，接下来是写字，然后逐渐添加更复杂的学科……教育变得几乎不容变更地跟儿童的实足年龄联系起来了。”[2]

可是，教育和实足年龄之间的联系是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初次为学生分班、分年级的尝试，是基于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实足年龄。[3]根据年龄来划分是后来的事。阿里耶斯解释说，学校按学生的阅读能力的不同等级进行分班，使人们“认识到儿童、青年的特殊天性，同时也认识到在儿童和青年这两种分类中，仍有各种类别存在”。[4]阿里耶斯在此处表达的是前面已经暗示过的一种社会观念：当

---

1 平奇贝克，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Ⅰ: 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42页。

2 普拉姆，Plumb, 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第9页。

3 阿里耶斯，Arie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188页。

4 同上，第187页。

一个群体，任何群体，是以某个单一特征为基础而形成时，它带有的其他特征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注意。起先只是必须学会阅读的一类人，结果却成为被认为在多方面都很独特的一类人。由于童年本身成为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分类，童年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鲜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概括了这一点："〔儿童〕新近在学校被分隔开来，接受针对不同学习阶段而设计的特别的印刷材料，最后，不同的'同龄群体'出现了，一个个性鲜明的'青年文化'……就此产生了。"[1]

随之而来的一切也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在事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儿童的服装变得与成人不同。到了16世纪末，童年应该有特别的服装，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实。[2]儿童服装上的不同，以及成人所感知的儿童在生理特征上的不同，在16世纪及以后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好的证明，即儿童不再被描绘成微型的成人。儿童的语言开始与成人话语也有所区别。正如先前所指出的，儿童专用的混杂语和俚语在17世纪前并不为人所知。后来，它的发展非常迅速且日益丰富。有关儿科学的书籍也大量出现。由托马斯·雷诺德（Thomas Raynald）撰写的一本儿科学的书非常受欢迎，在1600年以前就已经印刷出版了7个版本，而且继续出版到1676年。甚至连给孩子起名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也经历了变化，这反映出儿童新的社会地位。在中世纪，父母给所有的孩子起一模一样的名字，只按出生先后加以区分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但到了17世纪，这种习俗已经消失，父母通常给每个孩子起一个独特的名字，往往以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期待来决定。[3]儿童文学有些落后，到1744年才

1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133—134页。

2　阿里耶斯，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 第57页。

3　详细探讨17世纪孩子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参阅伊里克，Illick, Joseph. "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第303—350页。

开始出现。那一年，伦敦出版商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印刷出版了《巨人杀手杰克》（Jack the Giant Killer）的故事。到1780年，许多职业作家把注意力转向青少年文学作品。[1]

当童年的形态变得具体起来以后，现代家庭的形式也渐渐开始成形。创造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事件，阿里耶斯强调说，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发明和扩展。[2]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教育，这导致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家长的期望和责任变得越来越重大，而且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因为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爱森斯坦为这种演变又加上一条理由："永无止境的道德说教文学像潮水一样侵入了家庭这方净土……'家庭'一时间又被赋予各种新的教育和宗教功能。"[3]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各样题材的书籍应有尽有，不只在学校而且在市场上，家长被迫承担教育者和神学家的角色，并一心一意把孩子培养成为敬畏上帝、有文化的成人。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家庭进而成为教育机构，这不单是因为家庭必须保证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而且因为它不得不在家提供辅助教育。

但是，家庭中发生的另一些事情影响了童年概念的形成，这也不应该被忽视。拿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在英国，一个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有钱，而且愿意花钱。根据杜布莱（F.R.H. Du Boulay）的说法，中产阶级是这样花钱的："他们投资买较大的房子，有额外的房间可使自己不受干扰，他们还投资为自己和家人画像，投资在孩子的教育和服装上。**多余的钱使他们能够把孩子当**

---

1 平奇贝克，*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Volume* Ⅱ：*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Children Act of 1948*.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3，第299页。

2 阿里耶斯，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369页。

3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33页。

作炫耀性消费的对象。”[1]

在此，杜布莱希望我们考虑的是，经济条件的改善，在加强儿童观念和使儿童在社会上更引人注目上起了作用。我们要牢记，男孩实际上是特殊化人群中的第一个阶层，我们也必须记住，他们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毫无疑问，童年最初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想法，部分地是因为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培植这个概念。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想法才慢慢传入社会较底层的阶级。

所有这些发展都只是一个新兴阶级出现的外部迹象。他们说话与成人不同，每天消磨时间的方式也不同，他们穿着不同，学习的内容不同，而最终连思考的东西也不同。所发生的这一切，即根本的结构变化，显示出凭借印刷和服务于印刷的事物及学校，成人发现自己对未成年人的符号环境有着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因此他们能够并且要求为儿童成为成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

话虽如此，我并不是说成人始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或为什么要做某一件事。在相当的程度上，有关童年的各种发展是受书本和学校的性质所支配的。例如，通过写作有先后顺序的课本，按照儿童的实际年龄组织学校班级，校长等于开创了童年的各个阶段。我们对于孩子能学或该学什么、在什么年龄学之类问题的认识，大多来自有序的课程设置的概念，也就是说，来自前提条件的概念。

“自从16世纪以来，”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说道，“认识一堆由毫无意义的符号和声音所代表的互不相干的字母，记住这些字母的固定顺序，始终是西方世界所有儿童通往书本学习的大门。”[2]爱森斯坦教授在此所指的是通往成年的第一步：熟练掌握所有的字母，当时一般认为应

1　杜布莱，Du Boulay, F.R.H. An Age of Ambition: 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第90—91页。

2　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89页。

该是在4到6岁之间完成的任务。可问题是，熟练掌握字母，继而精通所有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构成了课程设置，而且构成了儿童发展的定义。通过建立不同等级的知识和技能，成人创造了儿童发展的结构。事实上，正如普拉姆所观察的："……许多我们认为几乎是人的天性的假定在这时开始被采纳。"[1]既然学校的课程设置完全是为顺应识字的要求而设计的，那么教育工作者居然还没有广泛评价"童年的本质"和印刷的偏见之间的关系，这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儿童走向成年需要获得那些我们心目中的好读者所具备的能力，即活跃的个性意识，有逻辑、有次序的思考能力，能使自己与符号保持距离的能力，能操控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能力和延迟满足感的能力。

当然，还需要有超凡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人们有时会忽视，书本学习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青少年精神高度的集中和镇定，而这些恰好跟他们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在"童年"的概念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假定，年轻人的习性比成人更"好动"和精力充沛。其实，菲利普·阿里耶斯之所以哀叹童年的起源，是因为它往往抑制了青年人好动的天性。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动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高度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6世纪初，校长和家长开始强加给儿童相当严格的纪律。儿童的天然本性开始被视为不仅妨碍书本学习，而且是邪恶性格的表现。因此，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结果和净化的灵魂，"天性"不得不被征服。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的能力，成为成年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目的；对于有些人，它是教育的绝对必要的目的。

清教徒罗伯特·克利弗（Robert Cleaver）和约翰·多德（John Dod）

---

1 普拉姆，Plumb，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Vol. 13，No. 1，Winter 1971，第9页。

在1621年出版的著作《虔诚的家庭管理》（*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中写道："躺在摇篮里年幼的孩子，既任性又让人怜爱。虽然他身体娇小，却有〔使坏〕之心，完全可能作恶……如果这星星点点的火花任其燃烧，必会越烧越旺，直至烧毁整座房子。我们接受改造，才成为好人，因为我们并非生来就好，而是教育使然。"[1]

尽管卢梭反对这种论调，而且他的意见颇具影响力，但是，多少世纪以来，儿童接受的始终是旨在使他们"变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是使他们压抑天然的充沛精力的教育。当然，儿童从不觉得他们喜欢这样的常规训练。早在1597年，莎士比亚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感人肺腑且难以忘怀的儿童形象，因为孩子们知道学校是走向成年的严峻考验。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著名的"人生的阶段"（ages of man）这段话里，莎士比亚写道："一个哼哼唧唧的男生，背着书包/脸色像早晨一样灿烂，行路却慢腾腾像蜗牛一样/不情愿去上学堂。"

自我控制，作为智力和神学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关于这两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作是伊拉斯谟1516年出版的《箴言》（*Colloquies*）。该书试图提出男孩必须控制他们出于本能的生活方法。把这本书看作是第一部广为流传的、以羞耻心为主题的世俗书籍，我认为是公平的。但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伊拉斯谟探讨的问题在18世纪已经被禁止出现在儿童的书籍里。例如，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假想的例子：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妓女相遇，男青年拒绝妓女的勾引，反而为她指出通向美德之路。伊拉斯谟也描写了一个青年向一个姑娘求爱，以及一个妇人抱怨丈夫任性之行为。换句话说，书中告诫年轻人如何对待性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说，伊拉斯谟敢于冒着断送自己名声的危险，他

1　伊里克，Illick，Joseph. "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316—317页。

是那个时代的朱迪·布卢姆[1]。但是，不同于这位写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儿童性问题小说的现代流行作家，伊拉斯谟的用意不是削弱羞耻感，而是要增强它。伊拉斯谟明白——一如后来的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即使去除神学的内涵，羞耻心依然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征服我们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书本和书本学习的世界几乎算不上我们超越动物本能的胜利；一个识字社会的要求使一种精雕细琢的羞耻感变得非常必要。若稍加引申，我们便可以说，由于印刷将信息和送信人分开，由于印刷创造了一个抽象思维的世界，由于印刷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由于印刷强调思考的美德，所以，印刷强化了人们对头脑和身体的二元性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印刷赋予我们的是脱离躯壳的头脑，但却留下了一个我们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其余部分的问题。羞耻心正是这种控制得以实现的途径。

到16世纪末，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个围绕着书籍的神学理论，一种新的、以印刷为基础的日益成长的商业体系和一个依照学校教育来组织家庭的新概念。综合起来，这些现象都竭力提倡在所有事情上保持克制的观念以及对私下和公开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渐渐地，”诺伯特·伊莱亚斯写道，“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联，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2]伊莱亚斯在此处是说，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

这本身是一个奇特的讽刺。因为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

---

1 朱迪·布卢姆（Judy Blume），当代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

2 伊莱亚斯，Elias，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179页。

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最后，了解这些文化秘密成为成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直到最近，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是成人拥有据信是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在儿童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分阶段向他们揭示这些秘密，至“性启蒙”为结束。

正因为如此，所以到16世纪末，学校老师已经拒绝让儿童接触某些“不体面的书”，并对说脏话的儿童进行惩罚。此外，他们阻止儿童进行赌博，而中世纪的年轻人最喜欢以赌博消磨时间。[1]因为人们不再期待儿童了解成人公开行为的秘密，有关行为举止的书变得很常见。这一回，伊拉斯谟又领先了一步。在他的《论男孩子的礼仪》（*De Civilitate Morium Puerilium*）一书里，为了启迪年轻人，他制定了在公众场合下言行举止的一些规则。“吐痰时要转过脸去，”他说，“免得唾液落在别人身上。若吐到地上的是脓性物，要用脚把它踩掉，免得让人恶心。如果你不方便这么做，就把痰吐在一小块布上。咽回唾液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跟我们见到的那些每说几句话就要吐痰的人一样，那是一种习惯而不是需要。”

至于擤鼻涕，伊拉斯谟坚持说：“对着帽子或衣服擤鼻涕是很粗鲁的……用手也不见得更加礼貌……用手帕擦鼻孔才是适当的，而且要转过脸去，**假如有更尊贵的人物在场**。”

伊斯拉谟在此同时做着几件事。首先，他在诱发年轻人的羞耻感。没有羞耻感，未成年人是不能成为成年人的。同时他还把年轻人比作“野蛮人”，因为在童年发展的过程中，如前所述，人们产生了一种想

1　阿里耶斯，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 第82页。

法，即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教育，需要以成人的方式接受训练。学校的书本向他们揭示了知识的秘密，而礼仪书则揭示了公众举止的秘密。“正如苏格拉底将哲学从上天带到了人间一样，”伊拉斯谟说起他的书时曾表示，“我把哲学引入游戏和宴会当中。”不过，伊拉斯谟不仅仅是在向年轻人揭示成人的秘密，他同时也在创造秘密。伊拉斯谟有关公众举止的书既是为成人也是为儿童写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同时在建立成人的概念和儿童的概念。我们必须记住，巴巴拉·塔奇曼说过，中世纪的成人非常孩子气，也就是说，当书本和学校创造了儿童时，它们也创造了现代的成人概念。那么，当我在后面几章试图揭示童年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消逝的时候，我想要说，一定形式的成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消逝。

无论如何，当儿童和成人变得越来越有区别时，每个阶层都尽情发展各自的符号世界，最终人们开始接受儿童不会、也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趣味、爱好和社交生活。成人的任务其实是要帮助儿童为将来能够应付成人的符号世界而作准备。到了19世纪50年代，几百年的童年发展已颇具成效，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都已经成为社会准则和社会事实。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没有人注意到，大约与此同时，童年消亡的种子也已经埋下了。

第四章　童年的旅程

在探讨最终导致童年概念土崩瓦解的符号世界的种种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17世纪以来童年的演变过程。当我说到童年的消逝时，我指的是一个概念的消逝。如果我们还记得童年概念的诞生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以及支持它成长的种种影响，那么我们也许会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不用说由于童年概念的消逝而感到的失落。

例如，我们万万不可认定童年是在谷登堡的印刷术和校长的分班影响下骤然成熟起来的。一如我在前几章里努力揭示的，这些事件的确是童年概念在现代世界中得以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同其他任何观念一样，尤其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观念，童年带给不同时代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试图理解童年的概念，并将它融入各自的文化时，童年所面临的是与产生地大不相同的经济、宗教和知识的环境。在有些情况下，童年被丰富了；在有些情况下，它被忽略了；还有些情况下，它被贬低了。然而，童年始终不曾消逝，尽管有时濒于消逝的边缘。

例如，18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始终是童年的劲敌。直到17世纪

末，英国的识字、学校教育和童年的概念都发展得非常迅速。但由于大型工业城市的兴起，工厂和煤矿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儿童的特殊天性不得不退居于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利用价值之下。“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果之一，”劳伦斯·斯通写道，“是……助长了学校的惩戒、处分功能。有些人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大半是不顾儿童的意愿，促使儿童适应工厂里的日常劳动。”[1]情况的确如此，假如儿童有幸去上学的话。因为整个 18 世纪和部分的 19 世纪，英国社会对待穷人的孩子尤其残酷无情，穷人的孩子充当了英国这部大工业机器的燃料。

“我在高伯（Gauber Pit）井下控制风门，我不得不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 4：00，有时 3：30 我就去上班，直到 5：00 或 5：30 才出来。我从来没有睡着过。当有灯光的时候，我有时会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样我不敢唱。”这是 19 世纪中叶年仅 8 岁的女孩萨拉·古德（Sarah Gooder）描绘的矿井中的一天。[2]萨拉以及其他儿童揭示的残酷现象最终导致英国立法，禁止矿井雇用儿童，即 10 岁以下的儿童！

更早些时候，在 1814 年，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立法，规定偷盗儿童是可以提起公诉的罪行。脱光偷来儿童的衣服一直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于实际偷盗儿童或把儿童卖给乞丐的行为，法律却没有任何惩罚。不过，法律对儿童所犯下的罪行却严惩不贷，没有丝毫恻隐之心。直到 1780 年，在两百多项可以判绞刑的罪行中，儿童若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会被一视同仁，处以绞刑。在诺里奇（Norwich），一个 7 岁的女孩被绞死，罪名是她偷了一条衬裙。在戈登暴乱[3]之后，几个儿童被公开处以绞刑。“我从未见过男孩子如此痛哭不已。”目击绞

---

1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No. 42，February 1969，第92页。

2 Pinchbeck，Ivy，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Volume* 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第二卷，第354页。

3 戈登暴乱：发生于1780年的伦敦反天主教暴乱，持续一周，死伤近500人。

刑的乔治·塞尔温（George Selwyn）说。[1]

在1761年进行的一次审讯中，安·马丁因弄瞎一些孩子的眼睛，随后带他们到全国各地乞讨而被判有罪。[2]她只被判在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服两年的刑。如果孩子是她自己的，很可能她根本不会被判有罪。她的罪行，看上去只是由于损坏了别人财产而构成的。

有大量的书，包括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描写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穷人的孩子遭受恐怖的统治：济贫院，服刑机构，纺织厂，矿井，不识字，缺乏学校。我小心翼翼地选择“恐怖的统治”（reign of terror）一词，因为我认为阐明下面的观点很重要：正如法国的恐怖统治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政治民主的思想一样，残酷对待底层阶级的儿童没有、也不可能摧毁童年的概念。童年的概念比那些从未受益于此概念的儿童更加坚强耐磨。这一点值得我们对未来感到欣慰。

童年之所以能从工业化的英国的贪婪中幸存下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使这个概念保存下来，并精心培养和扩展它。对萨拉·古德个人而言，这个事实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或些许安慰。但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对英国尤其如此。有关童年的想法和前提一旦被引进，从此便在英国扎根，从未离开过。有时它们只是受到阻隔，不能进入某个阶层。虽然英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直到最近，它依然是西方世界中最有阶级意识的社会，但是童年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最终还是渗透到了底层阶级。又如，1840年以后，初级教育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末，无论哪个阶级，男人或女人，文盲现象已经基本上消除。[3]

童年并不是那种可以永远隐瞒、不让社会各阶层知道的一个概念。

1　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Ⅰ: *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第二卷，第351—352页。

2　显然这种可怖的行径在当时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是非常普遍的。

3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119页。

即使英国的中、上层阶级努力这么做——他们的确也这么做了，童年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对情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在17世纪，童年的概念从英国穿越海峡到达欧洲，在18和19世纪，它从欧洲又重新穿过海峡回到了英国。举例来说，到18世纪末，欧洲大陆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缺乏教育和年轻人犯罪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1824年，一个访问了英国的德国人说道："单单在英国，它每年处以死刑的人数就要比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它听任200万人民到处游荡，极度无知。"[1]1833年，《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估计，就欧洲的教育而言，英国人落在标尺的底部，德国人则在最顶端。[2]若不是德国人，那么肯定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到了18世纪末已经发展出欧洲最大的初级教育体系，还有也许是最好的中等教育。问题在于，童年的含义意味着这个概念可以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虽然时而受到阻止和打击，但总能继续它的旅程。尽管当地情况会影响它的面貌和进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消逝。例如在法国，反对社会识字文化和教育的势力，不是来自没有人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耶稣会。因为耶稣会的成员担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会被"新教化"。可到了19世纪中叶，在识字率和儿童的入学率上，法国都赶上了英国，因此，童年的意义在法国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欧洲范围内兴起的倡导一个人性化的童年的潮流，部分是由于政府增强了对儿童福利的责任意识。我们关注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近些年来，政府过度干预家庭生活的行为已遭到批评。依我之见，批评得有道理。[3]可是在十八九世纪，尤其在英国，比较贫穷阶层的成年人经常不能对儿童发展出或是表现出我们认为正常的爱心和责任。据德莫塞的假设，很可能是许多成人根本就缺乏对儿童产生柔情的心理机制，[1]也

---

1 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90页。

2 同上，第129页。

3 Donzelot, Jacques. *The Policing of the Famil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

可能是因为经济能力低下，结果限制了这种感情的存在。无论如何，众所周知，家长经常把孩子不仅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且当作动产，他们的健康、幸福可以以家庭生存的名义被消耗掉。在18世纪，认为国家有权成为儿童的保护者的观念不仅新鲜，而且甚至激进。然而，逐渐地，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性地修改了，这样，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迫和政府形成合作，共同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

政府为何开始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参照几股力量来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欧洲范围的改革和学习精神。我们一定还记得，欧洲的18世纪是属于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康德（Kant）、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这些伟人的世纪，也是洛克和卢梭的世纪。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童年而言，法国的耶稣会根本不能和卢梭相提并论，就像英国的工业机器不能抵挡约翰·洛克的思想一样。我这么说，是指18世纪的知识氛围，即所谓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有助于培养和传播童年的思想。

拿洛克来说，在1693年出版的优秀著作《对教育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他对童年概念的成长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同在他之前的伊拉斯谟一样，洛克看到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提出了一种教育，主张把儿童视为珍贵的资源，但仍然严格要求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尽管洛克对儿童身体生长方面的观点很开明，但他还是把开发儿童的理性能力作为目的。一个孩子必须有精力旺盛的身体，他写道："这样，身体才能服从和执行**头脑**发出的指令。"洛克还抓住了羞耻感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保持童年和成年之间区别的工具。"在一切事物中，名誉和耻辱，"他写道，"一旦人们喜欢上它们，是最能刺激心灵之物。假如你能使孩子形成珍惜名誉、憎恨耻辱，你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植下了正确的原则。"

1　德莫塞，deMause，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

但最重要的是，洛克有一句至理名言：人类的头脑生来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a blank tablet）、一张空白的书写板（a tabula rasa）。由此，洛克推进了童年的理论。所以，最终在儿童的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校长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一如200年后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压抑的学说，洛克的空白书写板的观点在父母身上产生了一种与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内疚感，并为把认真培养儿童作为国家优先的大事提供了心理上和认识上的根据，至少在洛克所属的商人阶层，即他的选民当中是如此。虽然洛克不同于贺拉斯·曼[1]，因为洛克的想像力并不容许所有的儿童接受同等的教育，但他的确提出了教育穷苦儿童的学徒方案。穷人孩子的头脑毕竟跟中上层阶级孩子的头脑一样具有可塑性。

关于童年的概念，18世纪出现的第二个重要的知识性影响，当然非卢梭莫属。尽管我相信卢梭心里并不清楚地明白童年为何会出现、它如何被保存下来（而洛克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对童年的发展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儿童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就跟洛克大相径庭，因为洛克认为儿童始终是潜在的公民或者商人。卢梭的思想也并非完全独到，因为卢梭写作的时代，法国对童年的魅力和价值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尊敬。确实，卢梭自己曾引用一位老绅士的话：当路易十五问这位老绅士，拿17世纪和18世纪相比，他更喜欢哪一个。这位老先生回答道："陛下，过去我用我年轻的岁月去敬重老人，现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用老年的时光去敬重青年。"不过，卢梭既是个有影响力的作家，也极富个人魅力。当伏尔泰和卢梭的敌人揭露卢梭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孤儿院里时，他多

---

1 贺拉斯·曼（Horace Mann，1796—1859），美国教育活动家。推广公共学校制度，对学校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女子教育等提出大量改革意见，因而有"美国公共教育之父"的称号。——译者注

数的追随者甚至拒绝相信这种说法。无论他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卢梭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对儿童天性的好奇，而这种好奇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在学术上，弗雷德里克·福禄培尔[1]、约翰·裴斯泰洛齐[2]、玛丽亚·蒙台梭利[3]、让·皮亚杰[4]、阿诺德·盖塞尔[5]和A.S.尼尔[6]都是卢梭的继承人。（福禄培尔和裴斯泰洛齐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归功于卢梭。）当然，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都是儿童的心理状态不同于成人，对这一点应单独评价。

卢梭的第二个思想是，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教育和培养儿童，而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卢梭非常重视这个状态，在这一点上，无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包括他的学术继承人。在著名的《爱弥儿》（*Èmile*）一书中，卢梭探讨的是理想的儿童教育的问题，他只允许儿童读一本书：《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仅此一本，因为该书展示了人如何能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里，并对它进行控制。卢梭执著于一种自然状态，相应地轻视“文明的价值”，他的态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在

1　弗雷德里克·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1782—1852），德国学前教育家。认为儿童具有活动、认识、艺术和宗教的本能，教育就是促进这种本能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2　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天赋力量的和谐发展。——译者注

3　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和医生。她把教育看作是促使儿童内在力量自我发展的过程，强调让儿童自由活动，认为让儿童进行各种感官练习是儿童获得知识的基础。——译者注

4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和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主张通过对结构整体的研究来了解儿童的智力发展，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经过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译者注

5　阿诺德·盖塞尔（Arnold Gesell,1880—1961），美国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发展是内部因素起主导作用，从胚胎期到青年期的行为模式的变化与成熟都按一定顺序进行，可以预测。——译者注

6　A.S.尼尔（A.S. Neill,1883—1972），英国教育家。深信儿童生来具有无限潜在的力量，“自由”为儿童所必需，认为学校的纪律、指导、暗示和道德训练都应放弃。——译者注

他之前，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美德，如自发性、纯洁、力量、欢乐，可以看作是值得培养和赞美的特点。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伟大艺术家也不会不把童年的“生活的快乐”当作主题。尤其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把成人描绘成“堕落的儿童”，赞美童年的纯真和自然。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经常被当作表现青少年美德的最有力的作品（如阿里耶斯）。[1] 也正是在18世纪，我们应该记住，庚斯博罗[2]画出了有史以来最浪漫迷人的有关青少年的画作：他的《蓝衣少年》。

因此，当童年步入19和20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到达新的世界，童年的概念由两组知识旋律构成了。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洛克派”的或“新教派”的童年概念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的概念。以新教派的观点，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以浪漫主义的观点，未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这两派观点的不同，从洛克和卢梭各自所提出的对比鲜明的比喻中也可形象地反映出来。我相信有一点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例如，洛克把心灵比作刻写板，恰好描绘了童年和印刷之间的联系。的确，空白书写板的比喻把儿童看作是一本尚未写好的书，随着那些书页被填满，儿童走向成熟。这个进程没有“自然”或生物性可言。这是个符号发展的过程：有秩序的、分阶段的、和语言息息相关的。对于洛克和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来说，不识字和童年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成年被定义为具备完全的语言能力。

---

1 阿里耶斯，Ariè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 第30页。

2 庚斯博罗（Gainsborough，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作品多以柔和的色调描绘贵族奢华的盛装和高傲悠闲的姿态，《蓝衣少年》是其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另一方面，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善，而人类则是通过教育获得进步。"在此，儿童被比作一株野生植物，几乎不能靠书本学习来获得改善。它的生长是有机的和自然的；童年只要不被文明造就的、有疾患的倾泻物所窒息已是万幸。对于卢梭，教育主要是个减少的过程；而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但不论这两个比喻有多少区别，它们共同关心的一点都是未来。洛克寄希望于教育带来一本丰富、多样和翔实的书；卢梭则希望教育带来一朵健康的花朵。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有关儿童的比喻中，对未来的关心越来越少了。洛克和卢梭都毫不怀疑没有成人面向未来的指导，童年依然可以存在。

当然，在美国，尽管浪漫主义的观点从未完全消失过，但新教派的观点统治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确，我们可以说，出版于1884年的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描述的是浪漫主义的例子，尽管书的结尾有些不明确。马克·吐温（Twain）抨击那种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人的观点，认为那只是最表面上的意义。他嘲笑所谓儿童的性格可以凭借社会"价值"得到巨大改善的断言。哈克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个人尊严，他的足智多谋和心理力量，他对生活纯粹的**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浪漫主义童年观的支持，而且，大约在美国内战时期，成为重新评价童年本质的大潮流中的一部分。一如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在《学校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一书中显示的，进步的教育趋势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例如，1857年，一个最终以全国教育协会（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著称的机构建立起来了。1875年，特许证发给了纽约儿童保护协会（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1]〔作为讽刺性的对照，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动物保护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

1　若想了解这个组织有趣的历史，参见Payne，George Henry. *The Child in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and London：G. P. Putnam's Sons，1916。

to Animals）在 1866 年就成立了，几乎早了 10 年。]

尽管有哈克·费恩这样的例子，我仍然不想给人一种印象——洛克派的观点开始陷入声名狼藉的境地，尽管更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确是这样，即儿童被带坏了。毕竟洛克派的传统对关心和培养儿童有更高的要求，而且，首先是儿童的语言教育。直到今天，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地，洛克的断言不仅反映在学校里，而且反映在多数牵涉到儿童的社会机构里。但是，看来已经发生的情况是，有关童年本质的观点的确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一般来说，洛克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改造的观点仍保持完好无损，而如何进行教育才不会破坏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所描绘的童年美德，则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1890 年，儿童本性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ld Nature）成立了，并在会上处理了如下一些问题：

是否应该含蓄地要求学生顺从?

如何将正确的财产观念传达给儿童?

稍微年长的儿童究竟应该有多少权威?

严格坚持真实会阻碍儿童想像力的发展吗? [1]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显然不是卢梭的信徒，尽管他们也显然不希望教育的进程干扰儿童的成长；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童年有其必须尊重的逻辑和心理特点的观念。

因此，在 19 世纪末，万事俱备，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两个人的研究最终建立了本世纪有关童年问题的一切讨论所使用的话语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人最有影响的书都是在 1899 年出版的。每本书都各抒己见，促使有思想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文明的

1 Wishy, Bernard. *The Child and the Republ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 第117页。

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当然，我指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梦的分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校和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这两个人和他们的研究都太有名了，因此无须作什么解释。但下述观点是必须要说明的：他们两人结合起来，代表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童年旅程的综合和总结。

从一个科学的框架里出发，弗洛伊德声称，首先，儿童的头脑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容，例如，儿童具有性能力，富有各种情结和本能的心理冲动。他还声称，在努力达到成熟的成年的同时，儿童必须战胜、抛弃和升华他们本能的热情。因此，弗洛伊德驳斥洛克的论调，赞同卢梭的观点：头脑不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儿童的头脑的确最接近“自然状态”；天性的要求必须考虑在内，否则就会造成永久的人格错乱。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驳斥了卢梭的观点，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决定儿童将来成为何种成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理性教育，头脑的热情可以得到控制；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样地——虽然是从哲学的框架出发的——杜威论证说，儿童的需求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将是什么来决定。无论在家里和学校，成人必须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他或她**现在**必须解决什么问题？杜威相信，只有这样儿童才会成为社区中对社会生活有建设意义的参与者。“假如我们认同童年真正的本能和需求，”他写道，“只需〔要求〕〔他们〕有最全面的主张和成长……待时机一到，成人生活的纪律和文化自然会出现在成长起来的儿童身上。”[1]

弗洛伊德和杜威澄清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

1　杜威，Dewey，John.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899，第55页。

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

20世纪所作的有关童年心理的研究，例如，让·皮亚杰、哈里·斯塔克·沙利文[1]、卡伦·霍妮[2]、杰罗姆·布鲁纳[3]或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都不过是对童年的基本范例的评论而已。没有人怀疑儿童与成人不同。没有人怀疑儿童必须**努力达到**成年。没有人怀疑儿童成长的责任在于成人。实际上，没有人怀疑在照料孩子方面，成人表现最出色、最文明。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人的移情和情感，即单纯的人性，有所成长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跟随童年的脚步一起成长起来的。菲尔兹[4]说过，痛恨儿童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西方400年的历史演变恰好驳斥了这种论调。当然，我们不能对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不公平。他这句话的本意是个笑话，从一个恶毒的讽刺的观点引申而来。人们禁不住会想，当今天童年从我们的股掌间滑落时，不知菲尔兹会开什么样的玩笑。

---

1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美国精神病学家。曾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学理论，认为焦虑及其他精神病症状，源出于个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基本冲突。——译者注

2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现代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强调人格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认为心理冲突、精神障碍和不良适应的根源是社会矛盾。——译者注

3 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1915—），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研究过幼儿知觉、学习、记忆等，对美国的教育系统产生过影响。——译者注

4 W. C. 菲尔兹（W.C. Fields，1880—1946），美国演员。以擅长讽刺及装腔作势的幽默表演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喜剧演员之一。——译者注

第五章　结束的开端

1850 年到 1950 年这个阶段代表了童年发展的最高峰。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这些年里美国作过一些成功的努力，使儿童走出工厂，进入学校，穿着他们自己的服装，使用自己的家具，阅读自己的文学，做自己的游戏，生活在自己的社交世界里。在 100 部法典里，儿童被划分为与成人有本质上的不同；在 100 条习俗里，儿童被安置在受惠的地位，被保护而不受成人生活的怪异变幻的困扰。

正是在这个阶段，已成成规的现代家庭建立了起来，而且，假如我们接受劳埃德·德莫塞的年代表，在这个阶段，家长开发出了给他们的孩子以无微不至的同情、温柔和责任的心理机制。这并不是说童年从此就变得像田园诗般美丽了。如同生活的任何一个阶段，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充满了痛苦和迷茫。但是，到了世纪末，童年进而被看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成为一个超越社会和经济阶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而不是文化的产物。因此，这是个极为有趣的讽刺，因为在同一时期，使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却缓慢地、不易察觉地开始瓦解。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人对新兴的、没有儿童的年代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纽约大学的塞缪尔·莫尔斯教授。因为正是莫尔斯发送了地球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共电子信息，他对此应负有主要责任。像谷登堡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发明可能导致什么结果，虽然他明确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所发的著名的电码信息："上帝究竟干了什么?"[1]

出于历史的兴趣，应该在此提请大家注意，莫尔斯对用电来传播信息的可能性的痴迷，是1832年在他乘坐"萨利"号（Sully）时发生的。在船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电能够在瞬息被传送到电线所及之处，无论电线有多长。据说，莫尔斯下船时对船长说："假如哪天你听说电报这个世界奇迹，记住它是在美妙的'萨利'号上发现的。"

当莫尔斯在"萨利"号上旅行时，查尔斯·达尔文正在英国海军舰队的"猎犬"号（H.M.S.Beagle）上作观察。这些观察最后导致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的诞生。传统的说法是，达尔文始于1831年12月的旅行是震撼世界的大事，其结果是驱除了神学的幻想，并代之以科学的假设。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只是想说莫尔斯的旅行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要远远超过达尔文。达尔文提出的观点，影响的大多是学者和神学家。人们甚至可以怀疑他的理论对人们实际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少影响，或者它到底是否改变了他们的习俗和思维习惯。在我写此书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从事诋毁达尔文思想所包含的各种假设。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和可怜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进化论，人类照样可以生存。可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电子传播的局面。无论你在哪里生活、如何生活，或凭借何种信念生活，正是莫尔斯，而不是达尔文，主宰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及引导人们意识的方向。这个事实显然不是为莫尔斯个人歌功颂德，而是证实了克里斯廷·奈斯特龙（Christine Nystrom）所说的技术的"无形的形

1 对于莫尔斯究竟有没有发送这个信息，看来有些争议。其实，一个专家声称莫尔斯公开发送第一个的信息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他的电报内容是"宇宙，请注意"。

而上学”。达尔文和莫尔斯之间有一个区别：达尔文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在语言上的思想。他的思想明晰、可论证、可驳斥。的确，自 1860 年以来，达尔文的思想在演讲厅、课堂上甚至法庭上已经被公开地辩论过了。但是，莫尔斯为我们提供的是体现在技术上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因此从未被论证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斯的思想是不可辩驳的，因为没人知道电子传播隐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就像所有的传播技术一样，人们假定电报是个中性的传播工具，它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不存在偏袒哪一方的问题。人们会向莫尔斯提出的唯一问题是：这台机器究竟能不能用，电报能传多远，开发这项技术，花费究竟是多少。

我说没有人知道电报所隐含的意义，其实并不准确。梭罗[1]知道。或者人们可这么猜测。据说，当梭罗被告知，通过电报一个在缅因州的人可以即刻把信息传递给在得克萨斯州的人时，他问道：“可他们之间说些什么呢？”没有人会把这个问题当真。其实，提这样的问题，梭罗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电报所带来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它改变信息本质的能力，即从个人的和地区性的到非个人的和全球性的。120 年之后，马歇尔·麦克卢汉试图解决梭罗提出的问题：

> 当人生活在电子的环境中，他的本性改变了，他的私人属性融入了社团整体。他变成了一个“大众人”（Mass Man）。大众人是在电子速度下产生的一个现象，不是有形的量的现象。大众人最初是在无线电时代被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但是，随着电报的出现，它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诞生了。[2]

虽然麦克卢汉非常善于夸张，但依我之见，这一回他丝毫也没有夸

1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主张人类回到自然，曾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体验简朴生活。——译者注

2　引自*Dreadnaught Broadside*，一本由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制作的小册子。

大其辞。电报是第一个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超越人体速度的传播媒介。它打破了历史上交通和传播之间的联系。在电报发明之前，所有的信息，包括用书面表达的，只能以人体的速度进行传播。电报则一笔勾销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障碍，使信息从时空中脱离出来，远远超过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传播能力。因为电子的速度并不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而是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感官。它把我们带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它消灭了作为传播的一个方面的个人风格，其实也就是人类个性本身。从一开始，电报的内容使用的就是一种仪式性的语言，不属于任何人的方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以让传播者表达个性。在此，我所指的不是把电报作为即时信件，向人们传送生日祝福和周年庆贺，虽然这一类电报用的也是直来直去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我指的是电报作为新闻传播者这个主要用途。电报把信息从个人拥有转变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价值的商品，从而创造了“新闻事业”。在19世纪40年代，威廉·斯温（William Swain）和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开辟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电报业务。1848年，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正式成立了。当全国为了寻求电子的快速而普遍使用电报时，无可避免的是，信息变得比信息来源更重要。在此我们要记住一个比喻：在古代，传送坏消息的信使常常会遭到砍头的厄运。这也就是要让说话者对所说的话负责任，这是对人的个性的最崇高的赞美。有了电报，新闻就变得具体化了，常常使用“它”或“它们”，就像是“据新闻说……”或者“据它们说……”。有了电报之后，没有具体的个人需要对新闻承担**责任**。如同报纸一样，电报面向的是全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人。但不同于报纸，它的信息没有可以辨认的来源。用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的话来说，新闻不知从何而来。实际上，莫尔斯在早期的一个展示中发过一条“宇宙，请注意”的信息。这好比电报在对整个宇宙讲话。或许，莫尔斯心里终究还是非常明白的。

总之，对梭罗的问题的答案最终是，在缅因州的人跟在得克萨斯州

的人讲了什么并不重要。人们在电报里所“说”的，跟梭罗所用的“说”这个词的含义不同。电报的作用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匿名的、不需要上下文的信息世界，这样，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的地域差别就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电报还使历史退回到背景中，扩大了现在的即时性和同时性。但是最重要的是，**电报开始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由于电报给我们提供了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它也使新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现，因为信息的数量是随着新闻产生和传播的速度而波动的。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意味着处处都是新闻，一切都是新闻，而且没有特别的顺序。电报创造了读者和市场，他们不仅消费新闻，而且消费各种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基本上互不相干的新闻。这些直到今天仍是新闻事业的主要商品。在电报发明之前，由于跨越空间传播信息在技术上有困难，新闻往往是有选择的，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足以说明梭罗为什么会提那个问题。有了电报之后，新闻变得没有选择、不可用，至少以梭罗这样的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确实，只要我们稍加引申，就可以说电报有助于创造一个新的智力的定义，因为随着整个世界信息泛滥，一个人知道多少的问题要比一个人知道如何运用已知信息的问题要重要得多。

所有这一切对童年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童年，如我努力揭示的，是一种环境的结果。在这个环境下，一些专为成人控制的、特定形式的信息，通过分阶段用儿童心理能吸收的方式提供给儿童。如何维护童年的概念，则有赖于信息管理的原则和有序的学习过程。但是，电报开始争夺原来属于家庭和学校的信息控制权。电报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

当然，如果仅仅电报就把电子传播的一切可能耗费殆尽，那么很可能文字世界的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大半会保持完好无缺，尤其是童年的概念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电报不过是后来将要发生的一切的预兆而已。在 1850 年和 1950 年之间，美国的传播结构由于一个紧接着一个的发明而被瓦解了，随后又重新改组。这些发明包括轮转印刷机、照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电视。我把轮转印刷机和照相机

包括在内，是想指出，电子媒介并不是导致一个新的符号世界产生的唯一因素。与电子媒介的发展相对应，丹尼尔·布尔斯廷[1]所说的“图像革命”也在展开，一个以图画、漫画、招贴和广告构成的符号世界正在兴起。[2]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二者结合起来，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有着很强的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

这个发展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虽然传播速度飞快，使信息的管理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大批量生产的图像改变了信息的形式：从散漫的到集中的，从提议式的到呈现式的，从理性的到感性的。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而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一幅图，也许的确值1000个字，但它决不等于1000个字，或100个字，或两个字。语言和图画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因为一句话总是、也首先是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是想像中的一件事。大自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猫”或“工作”或“葡萄酒”这样的东西。这些词是我们通过观察自然、进行归类总结后得出的概念。图画本身并不表示概念；它们展现实物。图画不同于句子，是不可辩驳的。这句话说得再多也不过分。图画不会提出一个意见，它不隐含自身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它无需遵守任何证据规则或逻辑。[3]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图画和其他图像可被看作是“认识上的一个倒退”〔用雷金纳德·戴姆拉尔（Reginald Damerall）的话说〕，至少跟印刷文字对比是如此。印刷文字要求读者对它的“真实内容”有积极

---

1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1914—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以研究美国文明史闻名。主要著作是三卷本的《美国人》。——译者注

2 布尔斯廷，Boorstin，Daniel J. *The Image*. New York：Harper & Row，Colophon Books，1961。

3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符号表示的不同形式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偏见，参见Langer，Susanne K. *Feeling and Form*.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3。Salmon，Gavriel. *The Interaction of Media，Cognition，and Learning*. San Franciso：Jossey-Bass，1979.或Postman，Neil.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79.尤其是后者，第47—70页。

的反应。人们也许不一定总能做出评价，但是，从理论上说，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知识或经历，评价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图画要求观画者有审美的反应。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这就是为什么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反思图像革命和预期它在电视上大量表现时曾经警告说，它很可能对我们的头脑有催眠作用。“我们决不能忘记，”他写道：

> 在过去，人类不能把直接经验传递给别人，这使得使用语言成为必须，同时也迫使人类的头脑开发概念。因为为了描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类必须从具体中衍生出一般、笼统的概念；人类必须选择、比较、思考。然而，当传播可以通过用手指比划即可实现时，我们的嘴巴沉默了，写作的手也停下来了，因此头脑便开始萎缩了。[1]

这番话早在1935年便写成，当时图像信息环境尚未完全成熟。45年以后，很遗憾的是，阿恩海姆的预言成为罗伯特·海尔布龙纳（Robert Heilbroner）的断言中的事实。海尔布龙纳断言说，图像广告始终是削弱文字世界各种前提条件的最具摧毁性的力量。[2]如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一样，他的话是暗示大批量生产的图像会向政治界和商业界引入一个长久和普遍的非理性因素。[3]从照片到电影，最后到电视，一个候选人的“形象”变得比他的政纲更重要，一个产品的“外形”变得比它的实际用途更重要。阿恩海姆、海尔布龙纳和巴特在做出这些结论时含蓄地指出，图像革命对童年的地位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探讨的是，这个新兴的符号世界其实并不能支持保证童年概念存在所需要

1　阿恩海姆，Arnheim Rudolf. *Film As Ar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第195页。

2　海尔布龙纳，Heilbroner，Robert. “The Demand for the Supply Sid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28，No. 10，June 11，1981，第40页。

3　巴特，Barthes，Roland. *Mythologies*，trans.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Hill & Wang，1977，第91页。

的社会和知识的等级制度。

在进一步阐述如今正在发生的转变的细节之前，我必须再提一下这种局面本身所具有的嘲弄意味：在 1850 年和 1950 年之间，美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使其变得有文化，提升文化态度的价值观。但与此同时，电子速度和大批量生产的图像正互相勾结，试图削弱那些努力和那种态度。到 1950 年，这两个符号世界的竞争最终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的讽刺意味也自然显露出来。一如许多其他的社会产物，童年在被当作永久存在之物的同时，也开始变得陈腐不堪。我之所以选择 1950 年，是因为在那一年电视在美国家庭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正是通过电视，我们看到电子和图像革命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正是通过电视，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区别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线的历史根基是如何和为何被破坏殆尽的。

当然，我们生活的时代只是电视的摇篮期。印刷机发明之后，过了 60 年，印刷商才想出为书编页码的想法。谁知道电视的未来又会如何？也许未来，尚未出生的一代人会发明出新奇而深刻的用法。可是，假如就以商业广播电视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新兴的社会结构模式必然会使童年“消逝”。这里有几个原因，在此我将阐述其中之一。其他的，在接下去的两章里我会分别论述。

首先涉及信息的可获得性。这反过来又与信息是以何种形式编码的密切相关。3500 年前，从象形文字到字母书写系统的转变，就是我希望在此说明的观点的一个很好例证。[1] 在字母发明之前，“读者”需要学会一大堆的符号，才能理解一条书面信息。学习符号的任务非常艰巨，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完成。那些的确学完所有符号的人需要将其毕生精力投入这个事业。不过，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拥有这些独特技能的结果，使他们能够积累巨大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力。当一群人拥有一般大众

1 严格地说，闪米特人的“字母”是音节文字，不是真正的字母，但转变到语音文字确是西方文化心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所不能获得的秘密时，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足为奇。换句话说，图像文字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结构。一如伊萨克·泰勒（Isaac Taylor）在《字母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中所指出，随着字母的出现，这个结构被推翻了。曾几何时，由牧师和抄写员“垄断的知识”被一个相对简单和单纯的书写系统彻底粉碎，从此书面文字所写下的各种各样的秘密开放给了大量的人民。

同样地，16 至 20 世纪的书籍文化创造了另一种知识垄断。这一次，是将儿童和成人分离。一个完全识字的成人能接触到书中一切神圣的和猥亵的信息，接触到任何形式的文字和人类经历中有记录的一切秘密。大体上，儿童则不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是儿童，他们被要求去上学。

诚然，印刷的英语字母要比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易学得多，因此多数儿童能够努力达到成年。不过，语音文字并不那么容易学，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成熟的阅读是一种即刻的识别能力，也就是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阅读的习惯必须在获取口头语的过程中形成。在口语阶段之后才试图学习阅读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很少能成为流利的阅读者。[1]因此，阅读指导必须从早期开始，在儿童在生理上还不适应严格的静止状态时开始。这也是儿童日后发现阅读困难的一个原因。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学习阅读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习“破解密码”的过程。当人们学习阅读时，人们是在学习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静止不动。自我约束不仅对身体是一种挑战，同时对头脑也是一种挑战。句子、段落和书页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慢慢地翻开，按先后顺序，并且根据一种毫不直观的逻辑。阅读时，人们必须等待着获得答案，等待着得出结论。而在等待的时候，人们被迫评价句子的合理性，或至少要知道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暂停批评

1　有关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哈夫洛克，Havelock，Eric.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

性的判断。

学习阅读是学习遵守复杂的逻辑和修辞传统的规则。它们要求人们以谨慎严格的态度对待句子的分寸，当然，随着新的元素的按顺序展开，还要不断地修改句子的意义。一个识字的人必须学会反省和分析，有耐心和自信，保持镇静自若，经过适当考虑后，对文本的信息做出拒绝。这种行为方式，未成年人是很难学会的。它确实必须分阶段学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期待年幼的读者首先释义，而不是批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不期待一个八岁的孩子去读《纽约时报》，更不用说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自 16 世纪以来，成人有强烈的审查儿童阅读材料的冲动。这种行为合理性的前提是，儿童还没有掌握足够的“阅读态度”可以来延迟相信他们所阅读的内容。(让儿童轻信所阅读的内容显然没什么困难。）除了一些例外，成人的阅读行为很少在 14 或 15 岁之前发展完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学校的课程设置本身，一直是成人对儿童阅读内容作强行审查的最严格、最持久的表现。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所读的课本之所以被选中，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被认为适合于某个特定年龄的儿童，而且是因为其内容被认为包含适合于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的信息、思想和经历。人们假定四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七年级学生的经历，同样，一个七年级的学生也不知道九年级学生的经历。这样的假定可以在以印刷为基础的文化中合理地实现，因为直到今天，印刷的文字，尽管看上去容易接近，实际上掌握起来却足够困难，要获得适当的阅读态度也并非易事。这二者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在儿童和成人之间，甚至在年幼的儿童和青少年之间，也竖起了屏障。

然而自从有了电视，这个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电视首先是一个视觉媒介，对于这一点，阿恩海姆早在 1935 年就了然于胸，而今天，《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爱好者们却还蒙在鼓里。虽然人们在电视上听得到语言，虽然语言有时也确实重要，但正是图画在主宰

观众的意识，传播最关键的意思。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是看电视**。人们不阅读电视。人们也不大会去听电视。重要的是看。这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他们看的是动态的、时常变换的图像，每小时多达 1200 幅的图像。对于电视，人们常有一种天真的幻想，以为电视节目的感知层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的多样性确实是可能的，如果电视被用来复制演讲堂，如《朝阳学校》（*Sunrise Semester*）。以此为例来说，人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是“讲话者的特写头像”，这些头像发出一连串的句子。正因为这些句子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聪明的或愚蠢的，所以《朝阳学校》的感知层次才能够变幻无穷。不过，这样的电视用途是很罕见的，其中的道理跟 747 飞机不会被用来传送纽约和纽瓦克（Newark）之间的邮件一样：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太不合时宜了。尤其是，电视并不是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正因为如此，所以像《人类的进化》（*The Ascent of Man*）[1] 和《宇宙的奥秘》（Cosmos）[2] 这样“阳春白雪”的节目，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做成好电视节目，也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断变化的视觉图像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宇宙的奥秘》结果多半是在展示卡尔·萨根的个性魅力。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人们最好还要记住，电视网节目的一个镜头，其平均长度是 3 到 4 秒；一个商业广告镜头，其平均长度是 2 到 3 秒。这意味着，看电视要求观众必须在瞬间内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它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像。

电视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选择，因为它可以

1　这是一部13集的英国电视系列片，旨在向一般观众概要介绍科学 发展的历史。此节目由数学家、生物学家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主持，从开始制作到播映历时5年，1969—1974年。——译者注

2　第一部成功的有关科学的电视片，卡尔·萨根是片中的人类明星。到1997年萨根去世时，有5亿观众看过这部电视片。萨根因此也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译者注

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图片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在学习解释图像的意思时，我们不需要上语法或拼写或逻辑或词汇之类的课程。我们不需要《麦克古菲丛书》（*McGuffey Reader*）[1]之类的读物，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进行先决条件的训练。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如戴姆拉尔所指出的："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电视看得再多也不能使他们看得更好。看电视所需要的技能很基本，所以我们还不曾听说过有关看电视的残疾。"[2]书籍在词汇和句法上的复杂性可以千差万别，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分成等级。与书籍不同，电视图像人人都能看，人人都可看，无论年龄大小。根据丹尼尔·安德森（Daniel Anderson）和其他人的研究，儿童长到36个月时，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注意看电视画面了。到那时，他们已有了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会唱广告歌曲，会要电视广告上看到的产品。[3]不过，电视节目、商业广告和各种产品并非只针对3岁的孩子。他们完全没有道理这么做。就符号形式而言，《拉韦尔纳和雪莉》（*Laverne & Shirley*）跟《芝麻街》一样简单易懂；麦当劳的广告跟施乐（Xerox）的广告一样一目了然。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电视来说专门为儿童制作的节目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节目都是给每个人看的。

关键的问题是，电视传播的信息是一种无须分辨使用权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来进行分类。的确，为防有人怀疑我夸大其辞，值得提一下的是，在一年里每天晚上的11：00到11：30，大约有300万儿童（年龄在2至11岁之间）在看电视；在11：30到午夜之间，有210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12：30到1：00

---

1 教授阅读的丛书。首次出版为1836年，该书从教字母、拼写开始至较复杂的阅读。

——译者注

2 选自麻省大学的雷金纳·戴姆拉尔的一本未出版的书中的一个章节。

3 对年幼儿童的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参考麻省大学的丹尼尔·安德森的研究。

之间，有 110 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 1：00 到 1：30 之间，有略少于 75 万的儿童在看电视。[1] 出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因为电视的符号形式在认知方面毫无神秘可言，而且是因为电视机不能藏在柜子里或放在架子上束之高阁，让儿童够不着，即电视的外在形式，跟它的符号形式一脉相承，不能使它具有排他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出十四五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还有能够听明白跟多数图像的背景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正在兴起的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1　Mankiewicz，Frank，and Joel Swerdlow，*Remote Control*.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9，第17页。

第六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韦达尔·萨松（Vidal Sassoon）是个著名的美发师。他有一段时间曾有过自己的电视节目。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容提示、饮食信息、名人崇拜和流行心理学。每当节目告一段落时，主题音乐就会响起，留给萨松算好的时间说："别走开。广告过后我们介绍精彩的饮食新品，然后再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在我写此书时，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有一档每周5次的电视节目。他是个严肃负责的人，显然相信任何主题都能够、其实都应该在电视上"处理"。但即使他不相信这一点，他还是会这么做的：每周5次，每天1小时，每年52周，几乎没有时间可以吹毛求疵、精心挑选或对什么主题表示尴尬。当"处理完"国防预算问题、能源危机、妇女运动、街头罪案，人们早晚必然要转向乱伦问题、男女乱交、同性恋、施虐和受虐狂问题、各种不治之症以及成人生活的其他秘密。人们甚至可以转而去看一种心理脱衣舞：如斯坦利·西格尔节目（*The Stanley Siegel Show*）定期播放一段节目，其中高度紧张的主持人斜靠在沙发上，一名心理学家在一旁"分析"主持人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对父

母、性问题和他危险的自我认同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电视将文化弄得支离破碎的问题。〔例如，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对人们企图在电视上“略谈”乱伦会如何看法？弗洛伊德对人们把心理分析当作杂耍剧又会作何感想？〕有一个问题必须优先回答：为什么电视要强行把整个文化从壁橱里全部搬出来示众？为什么人们本应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和忏悔室里交流的话题，要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地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些人会强词夺理，提出一些天真的理论，说电视台的主管们如何用心险恶，企图掩盖问题的根源。而明明白白的事实是，电视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无论这个禁忌是在谈话节目中被揭示出来的，作为肥皂剧和情景喜剧的主题，还是在商业广告中曝光的，这些都无关紧要。电视需要素材。电视需要素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媒介。电视不单是图画的媒介，它是以当下为中心的、传播速度像光速一样快的媒介。电视的偏见，因此也包括电视的职责，是传动信息，而不是收集信息。电视不能停留在一个主题上或深入挖掘一个主题，因为这些是静态的、直线形式的排版所非常适合做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有50本有关阿根廷历史的书、500本有关童年的书、5000本有关美国内战的书。如果说电视能为这些主题做些什么的话，它只能做一次，随后转向其他话题。正因为如此，所以电视成为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他所说的“伪事件”，是指为了公众消费而筹划的事件。[1]电影艺术科学院奖、美国小姐竞赛、对各种名流进行“非难”、年度乡村音乐协会奖、电视网络明星之间的争斗、新闻发布会，凡此种种，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素材，而不是现实的需要。电视并不真实记录这些事件；

1　对布尔斯廷关于伪事件的想法的发展过程，参阅他的《图像》（*The Image*）。

电视制造事件。之所以需要制造事件，并不是因为电视台的主管缺乏想像力，而是因为他们想像力非常丰富。他们深知电视在观众中激发出一种对新奇事物和公开揭露问题的永不满足的欲望，电视生动的视觉图像并不是给专家、研究人员或者任何希望从事分析活动的人看的。且用多萝西·辛格（Dorothy Singer）、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和戴安娜·祖克尔曼（Diana Zuckerman）所喜欢的一个比喻。看电视就好比参加一个聚会，但满座宾朋都是你不认识的。[1]当你在房间里走动时，每隔几秒钟就会被引见给一个新人。一般预期的效果是兴奋，但最终你很难记住客人的名字或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甚至他们干吗在那儿。不管怎样，即使你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无关紧要。反正明天又是另一个聚会。此外，还需要加上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仍会被引诱回来，不只因为有可以见到新客人的承诺，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透露一些引起人们相当兴趣的秘密。换句话说就是："别走开，明天我们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只要目前竞争激烈的商业广播体制存在一天，这种局面就会持续下去。人们猜想，假如各大电视网的主管和节目导演明天被——比如说——哈佛神学院的教师取而代之，从长远来看，电视节目最终依然会维持现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2]

如同字母书写和印刷书籍，电视敞开了秘密，使以前私密的事得以公之于众。[3]但不同于书写和印刷，电视决不可能限制人们获取信息。识字文化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当识字文化使秘密广为人知的时

---

1 参见辛格和祖克尔曼的《教学电视》（*Teaching Television*）。

2 当然，通过政府干预来控制电视，并由此控制可供大家享用的信息内容是可能做到的。其实，在世界上多数国家，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电视节目不受政府严格的限制，美国的模式就会被仿效。

3 若想了解电视如何使"背后地带"的信息公之于众的精彩论述，参见Joshua Meyrowitz的《没有地域感：有关电子媒介对社会结构和行为的影响的理论》（*No Sense of Place: A Theory on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Behavior*），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纽约大学，1978年。

候，它同时也为获得秘密制造了障碍。人们必须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才能**有资格**理解书本上更深奥的秘密。人们不得不缓慢地、按部就班地、甚至痛苦地进步，与此同时，人的自我约束和概念思维的能力也得到丰富和扩展。我 13 岁时曾听说过一本书。对那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亨利·米勒[1]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当时有人向我保证，凡是想要了解性秘密的人一定要读这本书。可是，要看这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一大堆。举例来说，首先，这本书很难找。其次，还要花钱。再次，还要去阅读。因此，书里的许多内容我并不理解。甚至连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别段落，前面的读者很周到地在下面划了线，需要充分发挥想像力，而那样的想像力以我的阅历总是很难产生的。

对比之下，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像力上的种种约束。6 岁的儿童和 60 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是完美无缺的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胜过口语传播。因为说话时，我们总可以压低声音，不让儿童听见，或者，我们可以使用儿童听不懂的字眼。但电视不能轻声低语，它的图像既具体，又不言自明。儿童能看见电视播出的所有节目。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结果是，它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因此，也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根本的不同。从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样的结果也会发生：一个群体主要是依据其成员所拥有的特定信息来决定的。假如人人都懂得律师所了解的一切，律师就无需存在了。假如学生知道老师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无所谓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别了。的确，假如五年级的学生知道八年级的学生所了解的知识，划分年级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我们可以扩展这个说法，说任何一个群体都是针对不在这个群体里的人的“阴谋”，因为“局外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获得“局内人”

1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904—1944），美国作家。他的自传性小说写得非常坦率，对性生活的描写非常露骨，使这些作品形成20世纪中期文学上的一股潮流。——译者注

所拥有的信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差别或群体认同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例如，生物学确定谁是男，谁是女。[1]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角色的形成是由特定的信息环境的条件所决定的。童年的社会分类尤其如此。儿童是一个不知道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信息的群体。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谷登堡的时代，这种手段开发出来了。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

这意味着失落的远不止童年的“纯真”，因为童年的“纯真”常常是用来暗示童年的魅力在逐渐减少。电子媒体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羞耻的概念被冲淡了，也不再神秘了。为了使我所说的“羞耻”的意思更加明白无误，我认为有必要引用G.K.切斯特顿[2]（G.K.Chesterton）讲的一段极为相关的话：“一切健康的人，”他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东方还是西方，都知道性里面包含着某种怒意，谁也不敢肆意煽风点火。如果我们要保持清醒，就必须对它保持一种神秘感和敬畏的态度。”

虽然切斯特顿在此说的是性冲动，但他的观点所涵盖的意义更加广泛。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有关文明的进程的观点所作的不错的总结。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的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被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如切斯特顿所认为，它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围绕着各种行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这些行为包括思想、语言，由于常常被隐蔽在公众视线之外，它们变得非常神秘和令人畏惧。由于隐蔽，它们变得神秘；由于神秘，我们可以管理它们。在有些情况下，成人之间甚至不会

---

1 如果有人愿意接受当前遗传学的比喻，那么，谁是男性、谁是女性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是信息决定的，也就是基因信息。

2 G.K.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表现他们知道那些秘密，必须到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和忏悔室去舒缓自己。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控制儿童对那些事情的了解是必须的。当然，自从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暴力冲动、性冲动和自我中心对儿童尤其危险，因为人们假设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因此，羞耻感的无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年力量和权威。因为成人知道，而儿童却不知道，哪些话是可耻的，哪些话题是可耻的，哪些行为被认定必须在私底下进行。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表达得格外清楚。我并不认为羞耻的内容是由社会的信息结构所造成的。羞耻的根源不在于此，它存在于历史的深处，在于一个民族的恐惧，但这远不是本书的范围和目的所能涵盖的。然而，我要宣称，在一个不能保存秘密的社会里，羞耻不能作为社会控制和角色分辨的手段，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假如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有法律要求人们在公共沙滩上裸体，那么暴露身体的某些部位的羞耻感很快会消失殆尽。因为衣服是保密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把保密的手段剥夺了，那么我们也被剥夺了秘密。类似地，当维护乱伦、暴力、同性恋、精神病这些秘密的手段消失了，当这些秘密的细节变成公共话语的内容，可供在公共领域里的每一个人检查，那么对这些问题的羞耻感也会随之消失。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或“心理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会失去其阴暗和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会失去一些道德力量。

如果说这样的局面必定而且绝对意味着文化的堕落——“道德多数组织”（the Moral Majority）[1]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么主张的——那么我认

1　成立于1979年的一个组织，旨在美国社会中恢复传统的价值观。1989年，该组织发起人Jerry Falwell声称该组织已完成原定使命并解散了这个组织。——译者注

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记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以为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可耻的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然后使之合理化，从而转化为“社会问题”或者“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子中，恰好代表着社会向人性化的感受又迈进了一步。当然，主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把死亡、精神病和同性恋当作阴暗和神秘的秘密，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要求成人只能在很局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些话题，更没有道理。但是，把这些话题公之于众，完全没有约束，便构成了危险，特别是对儿童的未来造成问题。人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因为，如果成人没有阴暗和捉摸不定的谜需要瞒住儿童，然后以他们认为必须的、安全的和合适的方式向他们揭示，那么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线一定变得很危险地淡薄。换句话说，这是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恶魔式的交易。可悲的是，在如今的政体中，唯一抓住了这个要害的、较有影响的群体是以“道德多数组织”著称的无知的运动。正是通过他们的呼吁，这样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坦率和真诚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有许多。不过多数的答案，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明显，假如我们把大量成人所拥有的强有力的素材拱手交给儿童，那么，童年的概念就不可能保存下来。从定义上看，成年意味着谜解开了，秘密揭示出来了。如果从一开始儿童就了解各种各样的谜和秘密，我们又如何把他们跟成人区分开来呢？

由于羞耻感的逐渐衰退，行为举止的意义自然也相应地降低。羞耻心是克服冲动的心理机制，行为举止则是这种征服的外部社会表现。从餐桌礼仪，到语言行为，到穿着礼仪，这一切都企图揭示人们学会自治的程度，同时也在向人们传授自治的方法。如前面所指出的，举止或礼仪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才开始以较复杂的形式在百姓中出现。这主要是因为识字文化既要求、也促进了高层次的自我控制和延迟的满足感。人们也许可以说，举止是类似于识字一样的社会产物。它们

都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都要求相当长的学习发展过程，都要求成人集中精力教授。正如文化创造了有等级的知识秩序一样，礼仪创造了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儿童既要有识字的能力，又要懂得举止得体才能赢得成年。但是，当今的信息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识字文化已不再是人类发展结构的动力，礼仪的重要性一定会随之衰退。新的媒介使得人们对按照年龄区别群体徒增不满，从而对等级社会秩序的想法产生敌意。

例如，拿语言礼仪来说，直到最近，成人一定还记得在儿童面前不能用某些字，儿童反过来也被期望不在成人面前用那些字。儿童是否会通过其他渠道学到这些字，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无关。社会礼仪要求在成人和儿童的符号世界之间保持公开的区别，这样的习俗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但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社会想像。从成人方面来看，对语言的约束反映了一个社会理想，即试图保护儿童不受粗俗、肮脏或愤世嫉俗态度的影响，因为这些态度往往隐含在污秽和残酷的语言里。从儿童方面来看，这种约束反映了他们理解自己在社会等级里的位置，尤其是理解他们还没有权利公开表达那些态度。不过，由于角色区别的日益模糊，这种语言恭敬自然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这种习俗已遭到迅速破坏，而那些坚持不渝的人则被看作“离奇古怪”。看来我们正在倒退回十四世纪的局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话被认为是不适合未成年人听的。

面对这一切，成年的权威和童年的好奇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为羞耻和礼仪是植根于“秘密”这个概念中的。儿童之所以好奇，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将要知道的东西；成人之所以有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权威和好奇之间的微妙平衡，正是玛格丽特·米德的重要著作《文化与承诺：代沟的研究》的主题。在书中，她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日新月异、信息公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我相信这种信仰危机，”她写道，“可以归因于……现在长辈对

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1]

假如米德博士的说法正确，假如长辈不再能成为年轻人所依赖的知识来源，那么，她这本书该是起错名了，其实是文不对题。她做的研究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代沟消失的问题。在一个长辈不比年轻人多一点权威的世界里，权威已不复存在；这样，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已经被填平，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虽然我不同意米德的观点，即我们已到了“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的地步，但是我相信，很清楚的是，由于电子媒体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文化秘密，它已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也许米德博士的著作是写于那个昙花一现却又广为宣传的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时代，她假定年轻人的好奇心不会因为成年人的权威衰退而受到损害。在某种程度上，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但它的发展却有赖于人们日益清楚地了解通过秩序井然的问题来揭示各种秘密的重要性。已知的世界和尚未知的世界是通过好奇来连接的。但好奇大半发生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是分离的，儿童必须通过提问寻求进入成人世界的情况下。由于媒介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由于保持秘密所产生的张力在谜底被揭开时，这种张力势必减弱，所以好奇的演算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好奇被愤世嫉俗——或者更糟——被狂妄自大所取代。于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依靠有权威的成人而是依赖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闻来获取知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的答案。简言之，我们身边没有儿童了。

在此我们必须记住，这并不是说电视是促成成人秘密被公开的唯一的一个因素。我已经注意到，信息变得无法控制，家庭和学校失去了作为儿童成长的管教者的统帅地位，这个过程其实从电报的发明就开始了，并不是个新问题。每一个可以插入墙上插座的传播媒介，都对将儿童从有限的童年情感范围内解放出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电影，

---

1 米德，Mead，Margaret.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70，第64页。

它在向儿童揭示罗曼史的语言和策略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40岁以上的读者都能证明他们是从电影里了解到了接吻的秘密。在今天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从电影里学到的远不止这些。但电影不是免费的，因此依然有可能禁止儿童看那些展示太多的情欲知识或暴力或成人的各种疯狂的电影。当然，除了电影在电视上播放之外。因为电视没有任何限制，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虽然电视有时候会警告家长“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内容……”，但这样做只是会保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儿童会观看。他们看的究竟是什么？到底有哪些秘密需要揭示给他们？

如前面已提到的，所有那些事情都可以归纳到性的领域下。其实，在揭示性秘密方面，电视已经差不多做到了完全消除性心理失常这个概念的地步。举例说，看到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当作色情之物在电视广告上展示，现在已是习以为常了。一些成人可能已忘记，曾几何时，那样的行为是被看作精神变态的。他们不得不相信我的话，因为情况的确如此。这并不是说成年男子到最近才开始觊觎青春期的女孩子。他们过去也这样，但问题是他们的欲望一直是小心翼翼地保守的秘密，特别是不让未成年人知道。电视不仅将秘密公之于世，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对身体有害的压制、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来播放。就像在中世纪一样，玩弄儿童的私处也许又会重新成为下流的娱乐而已。否则，假如这么说有些过分，也许我们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尽管是象征性的），用儿童来满足成人的性幻想已经变得完全可以接受了。确实，基于电视上已广泛利用儿童这一事实，纽约上诉法庭1981年判定，在处理色情电影的问题上，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一部电影被判定淫秽，法院作了判决，那么这个罪名成立。但是如果法院未判定淫秽，那么任何试图区别儿童和成人的地位的法律都会招人厌恶。[1] 人们可以说，这样的判决为继续剥削儿童扫清了道路。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判决只不过反

1　参见“法庭裁决：除非淫秽，利用儿童进行性描写合法”（“Sexual Portrayals Using Children Legal Unless Obscene, Court Rules”），《纽约时报》，1981年5月13日，第1页。

映了我们新的电子环境的现实而已。实际上，在表达人类的性行为方面，现在电视很少认为有什么可以严重到不能播放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适合用作一个节目的主题或者商业广告的焦点。从阴道喷洗液广告到谈论男性脱衣舞者，从不断展示臀部、胸部的节目到有关交换配偶的纪录片，秘密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在电视上。在有些情况下，诸如乱伦、女同性恋或不忠这样的问题被处理得非常严肃，甚至带着某种尊严，当然这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无关。

为了使读者不至于认为这些观察不过是情感过分拘谨之人的牢骚而已，我要尽可能地将我的观点表达清楚：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之间的区别，以及由于媒体全方位的大暴露而消除了隐秘知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同性恋是上帝眼里的罪恶，是一回事，尽管我认为那是个危险的想法；说某个东西因放在儿童的眼前就失去了，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人类性行为下流和丑恶是一回事，尽管依我之见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说公开展示剥夺了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从而改变了性行为以及儿童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清楚地知道，“虚伪”这个词有时被用来形容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受到严格区分的情形。但是，从善意的一面来看，虚伪毕竟代表着某种社会理想主义。比如，拿儿童来说，保密是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有序地成长的条件。童年的概念，理想化地来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拿暴力来说吧。无可否认，人类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自相残杀。连同制造符号和制造工具，杀戮是人类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我作过估算，在我的一生中，大约有七千五百万人被别人杀死了。这还不包括——用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的话来说——那些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杀戮行径，例如街头残杀、家庭凶杀、抢劫谋杀，等等。不让儿童了解这些，是虚伪的表现吗？虚伪不应该这么不堪一击。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我们不希望儿童知道这些，了解得太多太早，很可能对儿童未成形的头脑是很危险的。对儿童成长持较开明的观点声称，有必要让儿童相信成人能够控制他们的暴力冲动，相信成人心中对

与错的概念黑白分明。借助这些信仰，如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所说，儿童能够发展出自信的感觉，这使他们有力量培育自己的理性。反过来，有理性又会使他们能够经受逆境的考验。[1] 沃丁顿[2] 假定："人类进化和选择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人类的儿童有能力接受长辈的权威和他们对是非的判断标准。"[3] 没有那样的保证，儿童会发现怀抱希望、充满勇气和表现纪律是很困难的。如果说向儿童隐瞒成人暴力和道德无能的各种事实是虚伪，那么，这么做仍然是明智的。当然，为了增进儿童成长的虚伪并不是罪恶。

话虽如此，这并不是说要让儿童对所有的暴力和道德堕落都一概不知。如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用处》（*The Uses of Enchanment*）中所展示的，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童话故事能够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邪恶，并且融会贯通，使儿童不受创伤。这不仅是因为童话故事的内容自然演变已有几百年之久，而且它们在成人的控制之下。例如，成人可以修改暴力部分或故事的结尾来适应某个孩子的需要，而且因为讲故事的心理环境通常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因而具有治疗作用。然而现在电视上所揭示的暴力并不是通过母亲的声音来传递的，也没有作过什么修改以适应儿童的需要，更不受任何儿童成长理论的指导。电视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无穷无尽的素材。它的存在也因为电视播放节目是在同一时间把同样的内容传递给每一个人，也就是说，电视不可能保持任何秘密。这样的结果是，要想不让儿童看到电视彻底暴露令人发指的暴力罪行，是不可能的。

在此，我们必须记住，每周一次的描述虚构的凶杀、强奸和劫掠的

1　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Bruno.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6，第4页。

2　C.H.沃丁顿（C.H. Waddington，1905—1975），英国胚胎学家、遗传学家、科学哲学家。著作甚多，包括生物学及哲学，又曾于世界各地讲述遗传学、伦理学、科学方法学等。——译者注

3　转引自米德，Mead，Margaret.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Garden City，N.Y.: Doubleday & Co.，1970，第64页。

电视节目还不及现存问题的一半。它们毕竟清楚地标明是虚构的，或是伪童话故事。我们可以假定——尽管不甚安全地——一些儿童不会把它们当作成人生活的真实表现。更引人注目的是日常的暴力和道德败坏的实例，它们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这类节目中，没有熟识迷人的演员在当中起缓冲作用。这种节目是日常生活实例的再现，是真正的谋杀、真正的强奸、真正的劫掠。正因为是日常生活里的真家伙，它们才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了解这些东西对儿童究竟有什么影响，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人员试图解答的问题。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当电视节目在儿童面前连篇累牍地、栩栩如生地描绘暴力行径，它究竟对诱发儿童的暴力倾向产生了什么影响？虽然这不是个小问题，但它却转移了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注意力。比如，如果电视真实地描写这个世界，究竟如何会削弱儿童对成年人的信念，包括相信成人是理性的、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和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等等？电视真实地描写现实，又如何会削弱儿童自身对未来控制暴力冲动的信心？

实际上，成人暴力的秘密仅仅是电视所揭示的更多秘密的一小部分。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电视上播放得最多的是成人世界充满了无能、竞争和担忧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用乔希·梅罗维茨（Josh Meyrowitz）的话说，电视打开了通往成人生活后台的视窗。研究人员却很少注意到电视以各种形式向儿童揭示如下秘密的含义：产生婚姻冲突的原因，购买人寿保险的需要，产生误解的无限可能性，政治领袖永远的无能，人体本身无数的苦恼。这样的秘密可以列满一张清单，但有两个特别有趣的实例可以证明电视如何毫不留情地揭示成人生活的秘密。第一，有关政治领袖的无能，或者至少是脆弱。对于这一点，梅罗维茨曾高瞻远瞩地作过论述。在寻找素材时，尤其是具有“人类兴趣”的题材时，电视发现在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中可以找到取之不竭的材料。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有机会如此了解他们国家领袖的妻子、孩子、情人、饮酒习惯、性取向、口误甚至口拙。那些有所了解的人、至少了解一些的人，都是

从报纸和杂志上看来的。这就是说，直到电视出现以前，政治生活的阴暗或隐晦的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事。儿童并不读报，他们从来都不是报纸的消费者。但他们是电视观众，因此那些人的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若是在其他年代，那些人完全可能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其结果是儿童对政治领袖和政治过程本身产生了一种被称之为成人的态度，即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

同样地，儿童时时被告知人体的种种弱点，这是成人通常设法遮掩的事情。当然，儿童始终知道人会生病，并且不管怎样总有一天都会死亡。可是，成人觉得大多相关的细节还是不让他们知道为好，待到那些事实不会令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再告诉他们。而电视打开了这个密室的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特地连续三个晚上对全国电视网的节目中所展示的各种疾病或身体残疾进行了统计。从痔疮到令人心碎的牛皮癣，从神经炎和神经痛到头痛和背痛，从关节炎到心脏病，从癌症到假牙，从皮肤疤痕到糟糕的视力，一共有 43 次提到这些我们皮肉之躯承袭的打击。仿佛这还不足以使人生的旅程显得充满不安，如果不是令人害怕的话，在同一时段里，还有两次提到氢弹、一个有关国家在阻止恐怖活动上多么无能的讨论以及有关 Abscam 审判的总结。[1]

我肯定，到目前为止，我给大家的印象是，所有通过电视传播给儿童的成人秘密都是恐怖、肮脏或令人费解的。但事实上，电视并非如此一边倒。如果电视暴露的多数是这样的内容，那是因为成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充满了病痛、暴力、无能和混乱。但这并不是成人生活的全部。例如，还有购物这样的生存快乐。在儿童还很小的时候，电视就向他们揭示消费主义的快乐和购买几乎任何东西后所产生的满足感：从地板蜡到汽车。曾经有人问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什么电视新闻总是报道坏消息。他回答说并非如此：电视广告是好消息。的确如此。到牙买加

1　Abscam是1980年的美国政治丑闻。联邦调查局精心设置圈套使接受贿赂的国会议员落网——译者注

或夏威夷旅行一次可以消除工作的辛劳；购买克莱斯勒汽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使用某种洗涤剂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能力；使用某种漱口水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性吸引力；了解这些都是令人安慰的。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给人们的承诺。它们正好迎合了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动机。儿童到 3 岁时就已经被灌输这样的动机，因为电视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切。我并不认为那是些一个成熟意义上的成人的动机。实际上，在下一章，我将试图阐述电视如何削弱“成熟的成年”这个概念。在此我只是想说明，电视上的“好新闻”是成人的好消息。对于这些，儿童到了 7 岁就已经耳熟能详了。

我也不认为更早些时候的儿童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只是从中世纪以来，儿童从未像现在一样对成人生活有那么多的了解。就连 18 世纪在英国矿井下工作的 10 岁女孩，也不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道得那么多。工业革命时代的儿童，除了了解自己生活的恐怖之外，对其他的知之甚少。凭借符号和电子这样的奇迹，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好的、坏的，兼收并蓄。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的。确实，无论人们如何评价电视对年轻人的影响，如今的儿童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年轻人都要消息灵通。这个观察再普通不过了，而且特别受到电视台主管的青睐，当他们遭到批评的时候。人们通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电视乃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这个观察完全正确，但是为什么被看作是进步的标志仍然是个谜。我们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消息灵通，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长辈知道的一切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变成成人，或者至少像成人一样。用我自己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第七章　成人化的儿童

有个象牙牌的香皂做过一个颇有影响的电视广告。在广告上，我们看到分别为母亲和女儿的两个女人。观众受到要猜测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女儿的挑战。她俩看上去都不到30岁，年龄上没有多少差别。我把这则广告当作一个异常明确的证据，来证实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区别在消逝的观点。虽然许多其他广告的含义也很明显，但这个例证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在美国文化里，母亲看上去跟女儿一样年轻，或者女儿看上去跟母亲一样成熟，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期待的事了。这究竟意味着童年在消逝，还是成年在消逝，只是提问的方式不同而已：做一个成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做一个儿童又意味着什么？没有一个清楚的成人概念，那么，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楚的童年概念。因此，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

我在此颇费苦心地想阐明，现代的成人概念多半是印刷的产物。几乎跟成年相关的所有特征都是由于一个完全识字的文化的要求而产生的，或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要求：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的容忍

度，具备抽象、有序思维这样高一级的能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高度评价说理和等级秩序的能力。由于电子媒介将识字能力推至文化的边缘，进而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各种不同的态度和性格特征开始受到重视，同时一个缩小了内涵的新的成人定义开始出现。这个定义不把儿童排除在外，因此，其结果是人生阶段的划分又进行了重新组合。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

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样的成年人古往今来始终存在，但各种文化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或鼓励或打击这种性格模式。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做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人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我留待下一章提出证据，证明这的确在发生。本章的目的是要阐述这种现象如何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

简短的答案已经包含在我前面的论述里面：由于人类生长所依赖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尤其不要求儿童和成人的情感有任何的区别，这样人生的两个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合二为一了。

那是我的理论。详尽一些的答案不过是评论而已。然而，这正是我接下去要讨论的。

在探讨现代的成人化的儿童之所以产生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有许多切入口，可是在一个由主要靠电视传播政治信息的社会里，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都不如观察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所包含的意义更能说明问题。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在电视出现以前，控制传播给大众的有关政治领袖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还相对容易。电视出现之后，这种控制变得非常困难，那些追求政治公职的人必须雇用“形象经理人”以期控制公众对他们的了解。产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纯属电视提供的信息的数量问题。更重要的却是信息的形式问题。

跟任何人一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不仅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以非语言的方式“发出”信息。他们的站立姿势、微笑、眼神、出汗、表示愤怒等等，跟他们所说的表达同样多的信息。很自然，控制他们“发出”的信息要比控制他们提供的信息要困难得多。正因为如此，所以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始终摆脱不掉他的二手车推销员的形象，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则甩不掉他的蠢汉形象。对这些挥之不去的认知印象，电视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屏幕上活生生的人物所发出的多数信息。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从**无线电**上拾来的比喻“电视观众”这个词，那其实是一个错误。即便在人物形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如总统演说，那形象依然处在人们意识的中心。其实电视通常如此，电视上的形象不断变换，观看者完全忙于（若没有被吓倒的话）关注非语言的信息。简单地说（我恐怕已翻来覆去地说过多次），电视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因为思想是抽象的、有距离的、复杂的和有秩序的，而电视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身上，因为人物是具体的、生动的和完整的。

这意味着电视已经彻底改变了政治信息的符号形式。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从对提议的知识评判转化为对整个人物形象的直观而情绪化的反映。在电视时代，人们赞成或不赞成这些政客，如同喜欢或不喜欢他们一样。电视重新定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它把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转变成了一个审美判断。一个勉强识字的十岁的孩子能解释或至少能对候选人所发出的信息做出反应，其迅速程度和容易程度跟一个知之甚多的 50 岁的人不相上下。其实，儿童的感觉甚至可能更敏锐。总之，语言和逻辑几乎变得毫不相干。

政治判断的含义发生改变并不是从电视开始的。它是 19 世纪的图像革命所产生的一个意外后果。但是电视自身发展是如此迅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有了电视以后，我们的政治意识在质量上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不同的层次。有趣的是，这种降格代表了新媒介偏见和旧媒介偏见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他的同事们假定说，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包含相当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和相应的分析技能。出于这个原因，通常限定年龄在21岁以下的人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因为人们进一步假定说，获得复杂的识字能力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这些假定在18世纪完全合适，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围绕着印刷文字来组构的，政治话语大多是通过书籍、报纸、小册子和受印刷影响极大的演讲来进行的。因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A.C.托克维尔[1]所指出，美国的政治是印刷在纸张上的政治。

无论还有什么其他假定在引导我们政治结构的发展（例如，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种族的假定），最根深蒂固的是假定成人和儿童在智力上存在不同，成人有作政治判断所需要的资源，而年轻人则没有。如乔治·康茨（George Counts）曾经说过，电子媒介已经废除了《人权法案》。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但是很显然，在电视时代下作政治判断并不需要复杂的文化技能，甚至不需要识字的能力。有多少投票年龄的美国人读过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on）所写的东西？或者读过为他提供思想体系的人写的东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总统竞选辩论时所提出的各种论点？有多少人相信里根曾提出过一些论点是吉米·卡特或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无法驳斥的？

只要稍加提问，人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些问题是多么没有意义，同时也会意识到在评价一个电视人物时，思想意识假定、逻辑的一致性和逻辑的力量以及语言运用的灵活性，这些东西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假如我们说安德鲁·杰克逊[2]执政的时代把政治生活从贵族手中夺走交给百姓，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电视时代把政治从成人的头脑中全盘夺走。正如杰克逊改变了社会舞台一样，电视改变了政治得以表达和理解

---

1 A.C.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先后当选为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和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著有《论美国的民主制》等。——译者注

2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总统（1829—1837），民主党人。总统任内曾进行过某些民主改革。—译者注

的符号领域。虽然新闻界因为受到既得利益的限制，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但其他人都承认情况的确如此，尤其是那些参加竞选的人和那些被雇来教他们如何竞选的人。

假如这个结论看上去夸大其辞，那么想一想电视所传播的公共信息的问题。为了对政治意识的品质作一个判断，我们必须对公民所能获得的信息的特点进行分析。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于通过电视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且多数是通过人所共知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他们有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信息？电视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视角和深刻见解？电视新闻节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成人的头脑而设计的？

为了解电视新闻节目，即那种在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可以看到的晚间新闻节目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它的结构。例如，所有这一类的节目都是以音乐开始、以音乐结尾的；而且在播映告一段落的时候，所播放的商业电视广告也有音乐。这种音乐的用意何在？跟戏剧和电影一样：刺激观众的情绪，制造紧张气氛，为某种心理期待作铺垫。但是，电影音乐和电视新闻音乐在功能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电影音乐是随着电影内容所需要的特定情绪而变换不同的。电影里有恐怖的音乐、快乐的音乐、浪漫的音乐等等。而在电视新闻节目里，播放的音乐始终不变，无论放在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入侵阿富汗，还是采纳市府预算的问题，还是超级杯赛获胜的消息。通过每天晚上在同一时段使用同样的音乐，仿佛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进行伴奏，电视新闻节目是在提出他们的主导主题，即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这中间并没什么重要差别，昨天需要的情绪今天同样需要。总之，这一天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

电视新闻节目的这个主题是通过多种形式开发出来的，包括美感、速度和不连续性。对于美感无须赘言，只要看看电视新闻广播员就可看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和美貌，或许可以说是美国最漂亮的一群人。电视很自然地偏向于采用有强烈吸引力的图像。几乎无一例外，人

物的脸蛋是否漂亮比人物的声音是否具有表现力更受到优先考虑。一个电视广播员是否理解所报道的内容的意思并不重要；许多人甚至不能做出恰当的面部表情，来配合他们嘴里所说的话。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尝试的努力都没有。观看者是否喜欢看他们的脸蛋才是最重要的。坦白地说，就电视而言，在美国没有一个60岁的妇女能够做新闻广播员。因为观看者不会为她们的面孔着迷。因此，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

人们也相信观众喜欢变化，排斥复杂，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个典型的30分钟的节目里，一般会播出15到20个“故事”。扣除广告时间、节目推销时间，还有广播员之间戏谑的时间，这样算下来平均每60秒钟一个新闻故事。随机抽取WCBS[1]的一档节目，这天晚上它是这样安排的：一则政府官员受贿的故事报道了264秒；一个相关的故事牵涉参议员拉里·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用了37秒；伊朗新闻40秒；有关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的新闻22秒；阿富汗的大屠杀28秒；有关穆罕默德·阿里25秒；新墨西哥州的监狱暴乱53秒；抗议电影《巡游》（*Cruising*）的活动160秒；有关“54工作室”（Studio 54）[2]业主的报道18秒；影星苏珊娜·萨默斯（Suzanne Somers）的报道18秒；有关the Rockettes的歌舞表演16秒；经济萧条的深度报道（第一部分）174秒；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的报道22秒；圣约翰队对路易斯维尔队的篮球比赛166秒；天气预报120秒；电影评论100秒。

这种限定“新闻”的方式取得了两个有趣的结果。第一，它让观众难以去思考一个事件；第二，也让观众难以去感觉一个事件。所谓“思考”，我是指有时间和动机去问自己：这样一个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之所以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它跟我所了解的世界有什么联系？所谓“感觉”，我是指人类对谋杀、强奸、纵火、贿赂及

---

1 WCBS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的一个分支电视台。——译者注

2 美国一个著名的夜总会。——译者注

一切恶性事件的正常反应。在早些时候作的调查中，我只能确定有一个故事，观者看后都记得对这个故事感到厌恶和恐怖的情绪：母亲将一个“恶魔缠身”的孩子烧死。新闻节目经常会加 30 到 45 秒“街头人士”做出的“情绪”反应，似乎在提醒观者他们**应该**对某个特定的故事有一些感觉。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我把它当作是制片人方面内心愧疚的表现，因为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节目没有给人们做出反应的空间。在上面提到的 WCBS 的节目中，并没有采访人们对阿富汗大屠杀和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的情绪反应。然而，对新泽西参议员哈里森·威廉姆斯（Harrison Williams）的受贿指控，却有 35 秒的“街头”反应。有幸在电视上发表评论的人说，他们觉得很糟糕。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电视上播出的所有事件完全缺乏历史背景或其他相关的背景知识，并且以如此支离破碎和连篇累牍的方式播映，结果是这些新闻像缺乏明显特征的溪流从我们的头脑中洗刷过去。这是电视的催眠作用，它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了。诚然，电视音乐、节目提示（“下面请看新墨西哥州监狱的暴乱……”），还有新闻广播员之间的互动（“新泽西发生了什么事，简？”），都是要制造一种兴奋的情绪和紧张局势有待解决的气氛。但这完全是弄虚作假，因为播放出来的新闻非常短小精悍，而且非常匆忙。一条新闻在播放时，另一个故事已在后台蠢蠢欲动了，心急火燎地等待它在电视上的 37 秒。这样，人们几乎不可能在脑子里把兴奋的允诺和期待的解决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由于信息流通而产生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

可是，如果思考和感觉新闻很困难的话，这决不是说观者无需对这个世界有感觉，或至少有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如我所说，就是所有的新闻事件既没有事发之前的原因，也没有事发之后的后果，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也毫无意义。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电视新闻节目出奇地不真实、缺乏连贯性，几乎已经到了任何事情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地步。比方说，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和影星苏珊娜·萨默斯之间有什么关联？54 工作

室和伊朗呢？电影《巡游》和阿富汗的大屠杀呢？受贿的官员和 the Rockettes 的歌舞表演呢？这些故事都有追踪报道吗？昨天有过相关的报道吗？为什么给伊朗新闻 40 秒，而圣约翰队的比赛要 166 秒？电视如何确定苏珊娜·萨默斯的播出时间需要比穆罕默德·阿里短一些？最后，各种电视广告和其他故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在 WCBS 的节目里，共播放了 21 条电视广告，占了将近 10 分钟时间。在受贿故事之前有 3 条广告，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之前有 4 条，有关经济萧条的专题报道（第一部分）之前有 3 条。你完全可以想像，商业广告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给人以满足感、安全感，其中还有两条是有关性快乐的承诺。

鉴于电视将新闻节目如此杂陈并置，人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呢？人们该如何评价事件的重要性？它表现了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准则，并以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来评价这些准则？对于这样的问题，电视新闻节目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比例大小的问题。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个体特征的反应；历史并不相干；评判事件的价值也是没有理性根据的。新闻，简言之，并不反映成人的世界观。

诚然，人们甚至不能在这种世界观中找出自相矛盾之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电视里播放 4 条赞美美国富裕的商业广告，紧接着又播放新墨西哥州监狱里囚犯的绝望和堕落。人们原本会期待新闻广播员至少会眨眨眼，但他完全不理会自己在说些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电视新闻节目（a television news show）恰恰反映了它的名称所包含的意义。一个节目[1]是一种娱乐，一个虚假和幻想的世界，经小心筹划后拼接在一起以期产生一系列具体的效果。这样可以让观众欢笑、哭泣或目瞪口呆，这就是新闻节目所做的事。而一些制片人在接受艾美奖时宣称，这样的节目旨在使大众变得更有知识。这真是大言不惭。当然，其结果是“政治人”（political man）的概念受到轻视，从而逐步破坏了成人式的理解和儿童式的理解之间的区别。

---

1 英文为show，又音译为“秀”。这个词的本义为“给别人看”，常用来指“演出”、“节目”。

这个进程还延伸到了政治之外的领域里。例如，我们来看看“商业人”（commerical man）和“宗教人”（religious man）的退化，其实应该说“融合”。成人情感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成人有能力区分商业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不同。在大多数文化里，这种区别明白易懂。但在电视时代，这种区别变得无可救药地含混不清，主要是因为电视广告这种无所不在的传播形式。就像新闻节目改变了政治判断的意义一样，电视广告改变了消费和笃信宗教的意义。

有关商业广告和它们的品格日下的推测的文章已经很多，要想添加新的论点也很困难。但就它们跟成年萎缩化的关系而言，仍有一些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商业广告完全不要求成人和儿童之间需要有区别。电视广告不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说服，而是使用视觉形象来达到效果，如同电视的其他用途一样。电视广告所使用的语言高度情绪化，很少有需要核实的危险。因此，商业广告不易受逻辑分析的影响、不可辩驳，当然也不要求用复杂的成人判断进行评价。自从图像革命以来，“商业人”已主要被看作是不理性的，不需要用论点或理性的话语来沟通的。但是，电视已经把这样的假定利用到了极致，我们甚至可以控告电视广告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电视广告已经摒弃了商业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即购买者和行销者都是根据自我利益，经过理性考虑之后达成交易。这个假设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深入人心，因此，我们的法律严格限制允许儿童进行的商业交易。在深受识字文化影响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里，人们相信儿童不具备评价购买者的产品的分析技能，儿童还不能完全理性地进行交易。但是，电视广告呈现产品的形式并不需要分析技能或者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理性和成熟的判断。它们不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事实，它们提供的是偶像，这样成人和儿童都能以同等的感情投入，同时也避免了逻辑或核实的麻烦。因此，把这种传播形式称作“商业广告”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它们蔑视商业语言，主要凭借符号和宗教语言来传播信息。的确，我相信，断定电视商业广告是一种宗教宣传品，是完全不过分的。

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电视商业广告都有宗教的内容。正如在教堂里牧师有时会呼吁会众注意教会之外的事物一样，有些电视广告在本质上完全是世俗的。有人有东西要卖；你被告知它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以及价格是多少。尽管这些听上去可能刺耳、唐突，但它们不提出任何教条，也不行使任何神学原理。

不过，大多数重要的电视商业广告采用宗教寓言的形式，以一个清楚表达的神学思想为中心。像一切宗教寓言一样，它们提出罪恶的概念，暗示赎罪的方法，然后预示天堂显圣的远景。它们也暗示邪恶的根源和虔诚的信徒应尽的义务。

比如，以“衣领上的汗圈”（The Parable of the Ring Around the Collar）的寓言为例。这则寓言之于电视脚本，就好像“浪子回头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之于《圣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雏形，其中包含着形式和内容的诸多元素，并在同类作品中反复使用。首先，“衣领上的汗圈”很短，只占用人们30秒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样做有三个原因，每个都显而易见。首先，在电视上布道花费昂贵。其次，会众的注意力时间不长，而且很容易受外来的诱惑而转移。最后，一则寓言不需冗长；传统上，它的叙事结构紧凑，象征意义明白无误，阐述简明扼要。

“衣领上的汗圈”的叙事结构的确很传统。故事有一个开头、中间和结尾。对于那些不熟悉这则寓言的人，简洁的描述即可解决问题。

故事开头描绘一对已婚夫妇在一个轻松的背景下，比如餐馆里。他们两个在一起很自在，总之，非常愉快。一个服务员走近餐桌，注意到那男子的衣领上有一圈很脏的汗渍。她肆无忌惮地盯着汗圈，轻蔑地冷笑，并对所有可听见的人宣布他的罪行。那男子受到羞辱，转而鄙视地瞪着妻子。妻子则摆出一副痛恨不已的样子，并带着一丝自怜。这就是寓言的开头：问题的出现。

寓言接下去表现妻子在家里用一种洗洁剂，总能将男人衣领上的污渍洗得一清二白。她骄傲地向丈夫展示她的成功，丈夫用欢喜的微笑原

谅了她。这是寓言的中间部分：问题的解决。最后，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又出现在餐馆里。但是，这次他们不再受到服务员探查的眼光和尖刻的社会批评。这就是寓言的结尾：道德、注释、说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恰当的结论。

在电视广告寓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Technological Innocence），即对工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一无所知。这是造成现实生活中不幸福、羞辱和不和谐的主要根源。而且，正如“衣领上的汗圈”所强烈表现的，技术无知的后果随时可能以土崩瓦解的力量爆发，弄得你措手不及。

技术无知的突然袭击是电视广告神学中尤其重要的一个特征，因此，它时刻提醒会众他们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人们决不能自满——或者更糟——沾沾自喜。企图简单地生活，不关心技术进步，这样总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人的天真幼稚在那些对技术警觉的人的眼里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而那些警觉的人可能是服务员、朋友、邻居或者一个光谱形象，如精灵，它不知从何而来地突然在你的厨房里显现，见证你的懒惰无知。

当然，人们也应该明白，技术无知的含义可以非常广泛，它不仅指对洗涤剂、药品、卫生巾、汽车、药膏和食品的无知，而且指对技术性机构的无知，如储蓄银行和交通系统。例如，你可以在度假时突然遇见某个邻居（在电视广告寓言里，这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发现他们把钱投资在某个银行，那家银行有一些特别优惠的利率你却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个精神上的灾难，你和你的假期也就此泡汤了。

不过，像在“汗圈的寓言”里所展示的，这并非无可救药。通往挽救之路有两个障碍。首先要求你敞开胸怀，接受那些比你高明的人的建议和社会批评。在“汗圈的寓言”里，服务员起的是顾问的作用，尽管她显然很严厉，几乎是无情。在有些寓言里，提出忠告者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而不是严厉。但在多数寓言里，拿卫生巾、漱口液、洗发液和阿斯匹林这样的广告来说，劝告者一般都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或许他

们过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其他事情上的脆弱。

无知的人只需要接受指令、按部就班。这一点非常重要，再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同时教给会众两个教训：人不仅要热切地接受指点，而且要热心给予指点。给予指点正是虔诚的信徒的主要职责。实际上，一个理想的宗教社团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大家对各种技术进步的问题轮流提出建议并且接受建议。

通往挽救之路的第二个障碍牵涉到人们是否愿意按照别人的忠告行动。按照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只是聆听福音、甚至布讲福音是不够的。人对福音的理解必须表现在善行上，也就是要有行动。在“汗圈的寓言”里，那个楚楚可怜的妻子几乎马上就有行动，寓言向会众展示她的成果作为结束。

“口臭之人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Person with Rotten Breath）有几个版本。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完全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的口臭已经有了技术上的解决办法，在受到室友的指点后豁然开朗。那妇女立刻接受了指点。在最后5秒钟，我们看到了结果：在夏威夷度蜜月。在“愚蠢的投资者”（The Parable of the Stupid Investor）的寓言里，我们看到一个男子不知如何让钱生钱。受到别人的启发后，他迅速行动。在寓言结束时，他得到奖励：一辆汽车，或去夏威夷旅行，或近似内心宁静的东西。

由于广告寓言编排紧凑，它的结尾，即最后的5秒钟，必须达到双重目的。它自然也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教诲意义：如果人们立即行动，就会获得奖励。由于电视广告展现了结果，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天堂的形象。有时候，比如在“丢失的旅行支票的寓言”里（The Parable of the Lost Traveler's Cheques），我们也瞥见地狱：技术无知者迷失方向，最后被判远离家园，永远在外游荡。但是，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天堂的形象，它既可以达到，也美妙无比：也就是说，天堂就在此地，此时此刻，在地球上，在美国，而且常常是在夏威夷。

夏威夷只不过是一个容易让人联想的、反复出现的象征。事实上，

天堂可以在你周围的任何地方成为现实。“在机场上奔跑的人的寓言”里（The Parable of the Man Who Runs Through Airports），天堂结果是在一个租车柜台。在柜台前，不知所措的奔跑者受到天使般可爱的信使的指点。奔跑者脸上狂喜的表情清楚地说明，此时此刻是他所期待的近乎超然的状态。

“狂喜”在此是个关键的概念，因为广告寓言极其详细地描绘过形形色色的欣喜若狂，这在任何宗教文献里都不乏其例。在“有斑渍的玻璃器皿的寓言”里（The Parable of the Spotted Glassware），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都认为这种心醉神迷的表情只能用“美化”（beautification）这个词来形容。即使在“汗圈的寓言”里，初看时人们并不会认为它会构成一个像“有斑渍的玻璃器皿”一样严重的道德危机，我们也看到了狂喜、纯洁和宁静。因此，哪里有狂喜，哪里就是天堂。简言之，天堂就是你的灵魂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个上帝当然是指技术。

作为信仰宗教的人民，我们很难说从何时开始我们把对上帝的传统思想的信仰，取而代之为对令人崇敬的技术力量的信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广告对于这种转变并没有起任何的作用，但是，很显然，电视广告反映了这种变化，记载并夸大了这种变化。因此，它对成年人精神定位的降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它模糊了成年和童年之间的界限，因为对于儿童，理解电视广告的神学是毫不费力的。电视广告神学中不含有任何复杂的、需要花费很多精力的东西，它也不会使人产生对人类生存本质这样深奥的思考。接受这种神学的成年人跟儿童别无二致。

也许在此值得反复重申的是，电视所鼓励的那种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并不是政治家、商业贩子和提供电视内容的电视主管的“过错”。这些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发现而使用电视这个资源而已，他们的动机不存在比观看者更好或更坏的问题。诚然，他们剥削电视的资源，可那是这种媒介本身的特点造就了成人化的儿童，而不是媒介使用者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可能盲目相

信通过“改进”电视节目，成年有可能被保存下来。但是，电视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进，至少在它的符号形式方面、观众收看电视的环境或者快速的信息流动方式等方面都是不会变的。尤其因为电视不是一本书，它既不能表达排版所能表达的概念性内容，也不能做到排版所能做到的深入阐述态度和社会组织的问题。

例如，电视的资源不能有效地表达过去或将来这样的时代感。它是一个以当下为中心的媒介。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必须**“用语言”**告诉观看者，他们所看到的录像是几天或几个月之前拍摄的。其结果是，电视把现在大大地放大了。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电视迫使成人把孩子式即刻满足的需要和对后果漠不关心的接受方式视为正常。

人们收看电视的环境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跟其他媒介一样，如广播电台和唱片，电视往往是一个孤立的体验，不要求遵守任何公共行为的规则。它甚至不要求你专心致志，因此对成人认识社会的凝聚力完全没有帮助。

毫无疑问，电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面，也是我煞费苦心地断言的是：电视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大多数的内容，所以，它势必放弃文字阐述，而使用叙事的模式。正因为如此，所以电视供人娱乐的能力几乎用之不竭。电视是大众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剧场，不仅因为它能影响数量众多的人民，而且因为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可以采用故事的形式，不需要论点或一连串的想法。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如前所述，正因为如此，所以像《宇宙的奥秘》和《人类的进化》这样的电视节目，跟其他电视节目一样，在视觉上充满动感，富有戏剧性。也就是说，卡尔·萨根和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应该——其实必须——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娱乐者和讲故事者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们的周围同时要有非常有趣的东西可看。宇宙哲学这样的科学在电视上不容易表现，于是我们必须看卡尔·萨根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谈论这个话题。同样地，电视绝不

可能表现一个文化演变的理论，这正是布洛诺夫斯基的《人类的进化》所要表现的。然而，100个观看者当中也不会有1个人意识到这个事实，因为他的理论和证据都被埋在了排山倒海般的、时间持续极短的画面之下。除非把画面去掉，让人们听到语言（这跟把剧本用书的形式印刷出来一样），布洛诺夫斯基的思想才会变得明明白白，他那些值得怀疑的理论才会获得评价。

人们常常听见评论家抱怨说，电视只维持了最一般的智力水准。但是，试想一下，电视的画面（如萨根骑自行车）怎么可能启迪更高层次的思维呢？杰出的科学作家、物理学教授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在评论《宇宙的奥秘》的文章里提出了徒有虚名的答案。[1] 伯恩斯坦提出，当电视表现科学节目的时候，视觉图像应该保持稳定，屏幕上的教授要坐在课桌后面，他只要讲话即可。伯恩斯坦还提出，假定谈话包含复杂的事实、想法和推断，这样的节目更会激发有知识的想像力。不过，这样就不是电视节目了，而是《朝阳学校》。但是，照他这样做，就是用电视来模拟演讲堂或教室，那么即使那些渴望获得更高级学识的人是否能长久地看，也值得怀疑。那些人到演讲堂和教室去，是想获得伯恩斯坦希望他们学习的东西。他们期待的是跟电视节目不同的东西，并希望那些节目制作人提供这样的电视节目。在我写此书的时候，WCBS将要开播商业电视版的“科学节目”，并期待吸引大量观众。这个节目叫做《沃尔特·克朗凯特[2]的宇宙》（*Walter Cronkite's Universe*）。无疑，作为成人而且受过很好教育的伯恩斯坦教授，他相信宇宙自身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克朗凯特先生之流进行宣传。WCBS可不会上当。WCBS深深懂得，由印刷术的发明而兴起的以文字为主宰的“文字说明

1　参见伯恩斯坦在*The Dial*里的评论，第二卷，第6期（1981年6月），第46—49页。

2　特沃尔特·克朗凯特（1916 —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特派记者。1962—1981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沃尔特·克朗凯特晚间新闻》总编辑。是环球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特别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时代” （the Age of Exposition），虽然赋予成人与众不同的头脑，但这个时代已接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叙事时代”（the Age of Narration），如果要表达得更准确、更形象化，应该说是“娱乐时代”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我并没有把娱乐时代当作比喻来用。我用的是它的字面意思，虽然这可以包含两种意义。第一是指电视把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转变成了娱乐的形式。我们不仅有《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这个节目也可以很容易地换成唐·里克尔斯（Don Rickles）讲 60 分钟关于宇宙空间的笑话和洛拉·法拉纳（Lola Falana）高唱 一曲《星球大战》的主题歌，并无不妥〕，我们还有《雷克斯·亨巴德和他的一家》（*Rex Humbard and His Family*），[1] 在外景地带给观众上帝的福音。亨巴德牧师只是一小撮利用电视使电视广告几乎达到神学幼稚化的牧师中的一员。这些福音传道者，在歌手、家庭成员和一些在舞台上和观众中都属极漂亮的人当中，提供一种简单化和戏剧化的宗教，跟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表演没什么两样。它抛开了令观看者的头脑负担重重的教义、专用术语、逻辑、仪式或传统。观看者只需要对牧师的个人魅力有所反应即可。

至于观看新闻，正如本书所指出的，电视对观者的要求也不例外。在我写此书的时候，WNBC 刚刚宣布与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签订了年薪为几百万元的多年合作合同。为了什么？要他读新闻。人们不禁要问，布罗考先生是否可以把他的表演带到赌城去赢利：“这是汤姆·布罗考的新闻世界，由唐·里克尔斯主播体育，洛拉·法拉纳主播气象。”不过，这有些多此一举，因为他在电视上的表演会有比赌城更多的观众。在当今的世界里，“娱乐”模式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芝麻街》。这是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儿童教育节目。该节目的创作者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娱乐不仅不会影响学习，而且娱乐和学习是难以区分的”想

---

1 亨巴德是一个基督教福音传道者。他在50年代就意识到电视的影响力，并发起建造了“明天的大教堂”，在教堂里拍摄宗教节目向美国、加拿大、以至全世界布道。——译者注

法。为了捍卫这个教育观念，WCBS的教育关系部主任杰克·布莱辛顿（Jack Blessington）说："在孩子自身发展和认知发展之间有一个距离，学校教育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距离。"他继续解释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以电子为中心的社会。印刷品会使一切事情的速度减慢下来。"[1]的确如此。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显然布莱辛顿没有注意到，就是电视使我们的文化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他所说的"距离"，其实是指文字说明所倡导的思想渐慢的过程和视觉娱乐节目所要求的快速反应之间的区别。不言而喻，尤其像《芝麻街》这样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之所以受到成人和儿童的欢迎，不是因为所谓的教育功能，而是因为，简言之，它一流的表演。

"娱乐时代"这个词的第二个意思跟第一个相关，但需要有它自己的解释。我提到电视事业是娱乐、表演，它抛弃抽象，把一切都变得具体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成年的概念为什么会萎缩。我们来回忆一下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2]笔下的艾丽斯在冒险开始之前所说的一番话，就可以确定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天，艾丽斯懒洋洋地无事可做。她偷偷看了看姐姐正在看的书。但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这些便是艾丽斯指的故事。"书到底有什么用，"艾丽斯想，"既没有图画，也没有对话？"路易斯·卡罗尔显然是在说明一个道理，跟文字说明相比，图画和叙事的形式不够复杂和成熟。图画和故事是儿童了解世界的天然形式，文字说明则是给成年人看的。

假如我把艾丽斯的问题作为一种启发，那么，一个被图画和故事主宰的文化对成年人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完全以现在为中心的、不能揭示时间的持续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郑重放弃概念的复杂性而只强调人物个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只注重眼下的情绪

1　转引自*Backstage*，1981年6月19日，第60页。

2　《艾丽斯梦游仙境》的作者。——译者注

反应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这个媒介像电视一样渗透到各个领域，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一如语音文化改变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思维倾向，一如公元5世纪社会识字文化的消逝促成了中世纪的头脑，一如排版在16世纪增强了思想的复杂性，其实，改变了思考的内容，那么，电视使我们不必区分儿童和成人，因为电视的本性是使智力趋向单一化。人们常说，电视是为12岁儿童的心智设计的，但忽略了电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面，即电视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电视是一种除了“图画和故事”之外就没有什么内容的媒介。因此，艾丽斯会觉得电视很适合她的需要。

话虽如此，而且尽管看上去的确如此，我并不是“批评”电视，我只不过是描述电视的各种局限以及这些局限会带来的后果。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改变文化的伟大媒介的本质。1981年，在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的毕业典礼上，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董事会主席伦纳德·戈登森（Leonard H.Goldenson）对毕业生说：“……我们不能再依赖掌握传统的技能。作为传播者、执行者、创造者和公民，电子革命要求我们掌握一种新的识字能力。那就是画面读解能力、掌握电子技术的能力。它相对于我们今天的书面文字文化而言，是一种进步，正如书面文字文化相对于早期人类史上单纯的口语传统是一种进步一样。”[1]如戈登森在上述这段话中的一个句子所暗示，他自己已经丧失了一些传统的技能。暂且撇开他的这个论证不说，我相信他的陈述的前半部分完全正确，尽管那并不是他本想表达的意思。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正如他公正地说的，不要求掌握传统的技能。这正是我的观点，因为它意味着那些技能对鼓励保持成年和童年之间的智力差异是无能为力的。至于他说的“画面读解能力”对于书面文字文化是一种进步，就像书面文字文化对于口语传统是进步一样，人们只能怀疑戈登森先生到底指的是什么

1 转引自*The Des Moines Register*，1981年6月15日，第7c页。

样的进步。虽然声称识字文化纯粹是一种恩赐，会让人觉得既天真也不准确，但是书写文字，然后是印刷文字，的确为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它带来了逻辑、科学、教育、礼仪；诚然也带来了戈登森先生所掌管的技术。因此，我们可以说，识字的头脑为识字文化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识字的头脑创造了新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又使识字文化所依赖的“传统的技能”变得毫无意义。我大惑不解的是，除了电视网的董事会主席之外，谁还会对这样的事实保持乐观态度。

第八章　正在消失的儿童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努力描绘社会表现自身的象征符号领域是如何使童年成为必要或者毫不相干的。我尤其试图解释童年的概念在西方文明中逗留了很久以后，如今划时代的新媒介如何正将它一步步地驱逐出去。接下来，我要摆出一些直接的证据证明这种驱逐确实已经开始了。

童年消逝的证据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出自不同的来源。例如，有媒介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证据，因为它们不仅从形式和背景上积极铲除童年的概念，而且在内容上也呈现降格的趋势。人们可以看到，有证据显示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相关的社会机构，如法律、学校和体育运动也在改变原来的看法。还有一种“确凿”的证据，如有关酗酒、吸毒、性活动、犯罪等等的数据，这些都意味着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然而，在呈现或指出证据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承认，无论我有多少证明童年消逝的证据，但是本书所提出的有关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的猜测并不能被证明。这不仅因为推测和理论绝不可能被证明，即便是物理科学也一样，而且因为有关社会科学的一切努

力，证明或驳斥的想法本身就包含着多种解释和各种复杂性，没有人能断定证据是否能让猜测成立，或受到抑制，或干脆毫不相干。

举例说明：据称女性青春期的开始时间，在过去的130年里，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因此，比如说，1900年，女性月经初次来潮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4岁，而1979年，平均年龄则是12岁。[1]我倒是非常愿意相信这个数据，因为如果是正确的，它就表明，童年概念的萎缩，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在电报发明以后不久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在青春期年龄提早和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之间，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巧合。于是，我情愿把它当作有利于我的论点的证据，但我也相信应该有更好的解释，特别是那些跟饮食习惯改变相关的解释。

再举一例：美国的家庭在变小，这是毫无疑问的。今天，〔在美国〕每户人口只有2.8人，而1930年则有4.1人。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50年，10.9%的美国家庭是一个人的家庭。而今天，这个数字高达22%。[2]美国人不仅生育越来越少的孩子，而且显然呆在家抚养孩子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是不是我们传播环境改变所产生的结果？我相信是的，但是，如果否定其他因素，如美国人日益富有、他们惊人的流动性、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也促成了这个结果，那也是愚蠢的。换句话说，如同这个例子，它不仅有多种起因，而且，如先前的例子，也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毕竟，在试图解释社会组织的变化或者任何文化趋势的时候，人们可以有许多的切入点。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他们对于童年为什么会消逝的问题已经有一

1　参见Leonide Martin的*Health Care of Women*，第95页。然而，这个被广泛承认的看法受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Vern L. Bullough的挑战。参见“女孩发育的平均年龄提早的说法站不住脚”（“Drop in Average Age for Girls-Maturing Is Found to Be Slight”），《纽约时报》，1981年7月11日，第7页。

2　参见George Masnick和Mary Jo Bane的“我国的家庭：1960年到1990年间家庭人口数量下降和单一人口家庭的出现”（*The Nation's Families*：1960—1990 for documentation of the decline of household members and the rise of the single-member household）。

套现成的解释，假定他们同意证据表明情况的确如此的话。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天知道还有什么人——也许甚至还有科学神造论的信奉者，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我选择了本书提供的解释，是因为就任何一个称得上站得住脚的单一视角而言，这一个视角最能说明事实。确实，对我来说，童年是文化需要传播的功能以及文化得以传播的方式，这是再显然不过的了。虽然经济、政治、思想形态、宗教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童年的进程，使之变得更重要或不太重要，但它们不可能创造童年或者把它一笔勾销。只有识字文化，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才具备这种力量。不过，我不会在此提出新的理由为这个观点辩论。我只希望说，我相信这个观点看上去有道理，是因为它至少有一些历史事实作后盾，也为现代的趋势所支持。本章的目的是阐述童年**正在**消逝。在考虑我提出的证据之后，读者自然会判断我的理论是否有用。

那么，我想开门见山，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当然，我并不是说年纪小的人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被描绘成十三四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我们暂且把这种状况称作“加里·科尔曼现象”（The Gary Coleman Phenomenon）[1]。我这么做是指，凡是认真观看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节目里的儿童和成人，他们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或性欲上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

话虽如此，我必须承认流行艺术很少能逼真地描绘儿童。只要想想一些了不起的电影童星，如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杰基·库珀（Jackie Cooper）、玛格丽特·奥布莱恩（Margaret O'Brien）和喜剧《我们这帮人》（*the Our Gang*）里的无伤大

---

1 加里·科尔曼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室内剧“*Different Strokes*”中的童星。——译者注

雅的恶棍，我们就会认识到，电影所表现的年轻人的性格和情感非常脱离现实。但是，人们仍然能从中发现一种理想，一种童年概念的构想。这些儿童穿着跟成人不同，言谈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他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更易于受到伤害。即便在早期的电视里，像《让碧弗来干》（*Leave it to Beaver*）和《爸爸本事大》（*Father Knows Best*）这样的节目里，人们会发现儿童虽然没有得到真实的描写，但他们至少与成人不同。但是现在，这些大多已经看不见了，或至少在迅速消失。

也许理解电视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最好办法是想像一下，如果《秀兰·邓波儿节目》是今天的电视系列剧，那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假定邓波儿小姐的年龄不变，还是她拍出那些令人难忘的电影时的年龄。(她 4 岁便开始了她的电影生涯，在 6 岁到 10 岁之间拍出了多数成功的影片。）除了作为模仿，秀兰·邓波儿会唱，比如说，唱主题歌《在棒棒糖船上》（*On the Good Ship Lollipop*），还能想像她会做什么？如果她真的唱歌，她的氛围可能是摇滚乐，也就是说，音乐既要维系成人的情感，也要维系年轻人的情感。在今天的电视网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儿童歌曲。儿童歌曲已经成为一个灭绝了的物种。这种现象跟我所能想像到的证据一样，很能够说明问题。总之，一个 10 岁的秀兰·邓波儿也许会要一个男朋友，这样她经常可以与之发生纠葛，模拟情人间的争吵。她自然要放弃“小女孩”的衣服和发式，而代之以接近成人的流行时装。她的语言则会由一连串心照不宣的俏皮话组成，包括大量涉及性暗示的话。简单地说，《秀兰·邓波儿节目》不会、也不可能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节目，无论她可爱还是不可爱。观众中有太多的人会觉得这样的构想要么稀奇古怪，要么无法辨认，年轻的观众更是如此。

当然，我们传统的童年模式在电视上的消失，在电视广告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我已提到过广告大量使用十一二岁的女孩作性对象，如布鲁克·希尔兹现象（the Brooke Shields Penomenon）。但有必要提一下的是乔达奇牛仔裤（Jordache jeans）这个异想天开的广告。在广告里，一群还没到青春期的在校男生女生，被表现为傻乎乎地受着性欲的驱

动。由于穿了品牌牛仔裤，他们的情欲被进一步煽动起来。广告的结尾显示他们的老师也穿着同样的牛仔裤。这样的广告，除了说明在性欲方面或挑起性欲的方法上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区别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意义呢？

但是，除此之外，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还有：儿童，无论有或没有亢奋的性欲，一般都被不知羞耻地用来充当广告剧的演员。有一天晚上看电视，我数了一下，共有 9 个不同的产品利用儿童作推销员。这些产品包括香肠、房地产、牙膏、保险、洗涤剂和连锁餐馆。美国的电视观众显然不认为由儿童来告诉他们美国国家公司的辉煌成就有什么不同寻常或令人不快，也许这是因为儿童越来越多地获准参与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要把他们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销售中排除出去，显得有些不合情理。

儿童在电视上的“成人化”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电影里。那些题材各异的电影，如《卡丽》（*Carrie*）、《驱魔法师》（*The Exorcist*）、《漂亮宝贝》（*Pretty Baby*）、《纸月亮》（*Paper Moon*）、《预兆》（*The Omen*）、《蓝色的泻湖》（*The Blue Lagoon*）、《小可爱》（*Little Darlings*）、《无尽的爱》（*Endless Love*），还有《一点浪漫》（*A Little Romance*），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儿童观念：儿童在对社会的理解方面、在语言和兴趣上与成人是别无二致的。若想观察近些年来儿童电影形象所发生的转变，一个最启发人的办法是把 30 年代的影片《小捣蛋》（*Little Rascals*）和 1976 年的电影《巴格西·马龙》（*Bugsy Malone*）进行比较。《小捣蛋》是一出讽刺剧，孩子们在里面扮演过去匪帮电影里的成人角色。在《小捣蛋》里，大部分幽默纯粹来自儿童仿效成人举止所产生的不协调。虽然《巴格西·马龙》也把儿童比作成人，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自身几乎没有不协调的感觉。说到底，12 岁的孩子使用“成人”语言，穿成人服装，对性表现出成人一般的兴趣，高唱成人歌曲，这有什么荒谬可笑的？问题是《小捣蛋》分明是喜剧，而《巴格西·马龙》则**几乎**接近**纪录**片。

在儿童文学方面，许多引起广泛讨论的变化跟现代媒体的趋势一脉相承。朱迪·布卢姆的作品已有许多仿效者。像布卢姆女士一样，这些作家深深懂得，“青少年文学”的主题和语言要模仿成人文学，尤其当其中的人物以微型成人出现时最受欢迎。当然，我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即当前儿童文学中（或者，也在电视或电影方面）没有一部表现儿童与成人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我确实想说明，在儿童的形象方面，我们的流行艺术正在经历一个需要迅速重新定位的问题。也许人们可以赤裸裸地这么说：我们的文化不够大度，不能同时包容朱迪·布卢姆和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其中之一必须被淘汰。如迪斯尼帝国日益低落的票房所显示，淘汰的正是迪斯尼的儿童形象，儿童需求的构想正在日益消失。[1]我们正在驱逐200年来以年轻人作为孩子的形象，而代之以年轻人作为成人的意象。

虽然这正是布卢姆女士、现代电影制作者和电视作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无法指控他们犯有道德或社会过失罪。在对我们的流行艺术进行批评时，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指责他们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步履沉重的黑人、贪婪的犹太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逆来顺受的妻子，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素材不够有趣，而是因为观众不能接受它们。同样地，秀兰·邓波儿被布鲁克·希尔兹所取代，因为观众要求流行艺术的偶像和他们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之间有某种一致性。电视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有时候电视稍微滞后于现实，有时候超前于现实，有时候则正好反映现实。但是，电视绝不能离社会现实太远，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流行艺术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电视是最民主的社会公共机构。电视节目表现人们所理解的和想要看的，否则就会被取消。多数人已不理解、也不想要传统的、理想化的儿童模式，因为他们的经历或想像力并

1　有关迪斯尼帝国的衰落的文献资料和分析，参见“对着迪斯尼正在坠落的星辰祈祷”（“Wishing Upon a Falling Star at Disney”），《纽约时报周刊》，1980年11月16日。

不支持这样的模式。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传统的成人模式方面。如果人们仔细注意电视节目的内容，就会发现一些相当准确的记录，不仅涉及“成人化”的儿童的兴起，而且也涉及“儿童化”的成人的兴起。电视在这一点上非常显见，尽管表现孩子气的成人的最好代表，毫无疑问是电影《在那里》(Being There)，因为它恰恰反映了我所描写的过程。拉韦尔纳(Laverne)、雪莉（Shirley)、阿奇（Archie)，“爱之船”的水手、三人行、芳兹（Fonzie)、巴迈·米勒的侦探（Barney Miller's Detectives)、罗克福德 （Rockford)、科佳（Kojak）和整个幻想岛（Fantasy Island）上的人物，几乎都不能算是成年人物，即使在人们充分考虑成年人物的传统形式而予以谅解之后。除了个别例外，电视上的成人并不认真对待工作（假如他们真的工作的话)，他们不抚养儿童，不参与政治，不信仰宗教，不代表任何传统，没有远见，也没有严肃的计划，没有深入的对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暗示他们跟八岁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虽然我的学生都是很投入的电视观众，他们敦促我修改下面的陈述，但是，我只能在商业电视节目中找到一个经常出现的虚构人物，即《奇怪的夫妻》（*The Odd Couple*）里的费里克斯·安格尔（Felix Unger)。他被描写为有成人的爱好，喜欢严肃音乐。他的语言显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他实际上读过书。确实，相当引人注目的是，电视节目里的成人大多被描绘成是功能性的文盲，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里欠缺从书本上学来的内容，而且是因为他们的头脑甚至没有一丁点儿慎重考虑的习惯。〔《奇怪的夫妻》现在只有在重播时才能看到，不仅令人啼笑皆非地把费里克斯·安格尔变成了一个很有文化的人，而且极其反常规地把他的伴侣奥斯卡·麦迪逊（Oscar Madison）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的职业作家。〕

论述流行电视节目如何浅薄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但我并不是在此讨论那种判断。我的观点是：电视上最常用的成人模型其实是个儿童模型。这种模式几乎在各种电视节目里比比皆是。例如，在竞赛节目里，

参赛者经过精心的挑选，以确保能够对羞辱（来自一个假扮的成人，即“主持人”）有无穷无尽的容忍度，他们的情感能在瞬间调动起来，他们对事物的兴趣有莫大的热情。其实，竞赛节目是对课堂的拙劣模仿。在这个课堂上，孩子气的参赛者因为服从指挥和少年老成而受到相应的奖励，否则就要经受传统上学校的学生所要承受的一切负担。再举一个例子。肥皂剧里缺少成年人物的情况非常显著。在我写本书时，已有人着手制作一个“10来岁的青少年”版本的辛迪加肥皂剧，名叫《年轻的生命》（*Young Lives*），仿佛要记录年轻人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并没有区别这样的想法。在这一点上，电视比电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年轻的生命》是不带讽刺意味的《巴格西·马龙》。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前三章所阐述的种种原因，而且是因为电视试图反映普遍的价值和风格。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儿童的价值和风格以及成人的价值和风格往往融合为一体。人们不必是社会学家就能注意到如下的事实：

在过去的10年里，童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毫不含糊地被认作是“儿童的”服装，现在已经基本上杳无踪影。12岁的男孩现在穿三件套的套装去参加生日聚会，而60岁的男人则穿牛仔服去参加生日聚会。11岁的女孩穿高跟鞋。过去清楚地标志年轻人的随意性和活泼好动的运动鞋，现在据称对成人也表示同样的意思。超短裙曾经是成人仿效儿童风格的服装的最令人尴尬的例子，此时此刻已销声匿迹了。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人们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成年妇女穿着的小白袜子和仿儿童式的方口系带鞋。关键在于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种时尚的倒退，自16世纪起通过衣着方式来辨别儿童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随着儿童概念的减弱，童年的象征性标记也必然随之减弱。

这个变化过程不仅在服装上，而且在饮食习惯上也可以看出。垃圾食物，过去被认为只适合年轻人没有分辨能力的味觉和钢铁般的胃，现在却也成了成年人的日常伙食。这可以从麦当劳（McDonald's）和汉堡王（Burger King）的电视广告中看出，它们的吸引力并没有年龄之分。

人们也可以直接注意一下光顾这种地方的儿童和成人的分布情况。成人看上去至少消费跟儿童一样多的垃圾食物。[1]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许多人看来已经忘记了，过去成人应该对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比儿童更高的标准。实际上，当年轻人表示出一种倾向于拒绝使垃圾食品工业得名的伙食，这是他走向成年的标志。我相信我们能够相当肯定地说，现在这个转向成年的标志已经完全无影无踪了。

儿童和成人的价值和风格正在融合为一体，最显著的症状表现在儿童的游戏方面，也就是说，儿童游戏正在消失。尽管我还没有发现有关无人监督的街头游戏的衰落情况的研究资料，但它们的消失已足够明显。总之，从“少年棒球联合会”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这类社会公共机构惊人的蓬勃兴起，便可略见一斑。除了市中心的比赛依然控制在打球的年轻人手里，美国青年的比赛已经变得越来越正式，像职业运动员一样，且极为严肃认真。根据总部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Williamsport）的“少年棒球联合会”的资料显示，少年棒球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体育运动，至今共发了1400多张许可证，有超过250万年轻人参加。他们的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这个组织的结构仿效“职业棒球联合总会”（Major League Baseball Association）的模式，比赛本身的特点也是以成人棒球比赛的情感风格为模式的：没人可以胡闹，不能随意更改规则，不受现场观众评判的影响。

儿童游戏跟成人不相干的想法显然遭到美国人的排斥。他们坚持，即使只有6岁，儿童游戏也不能随意自发地进行，而是应该在成人小心的监督下，紧张激烈地进行。1981年7月17日，《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故事揭示了许多成人并不理解儿童游戏被重新定义的意义。当时

---

1 对于不同的年龄群消费多少麦当劳的食物，麦当劳公司坚持不肯公开具体的数字。从他们口中，我所得到的最有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成人带着孩子，是光顾麦当劳最大的人群。麦当劳公司详细目录的分类是年幼的儿童、10到12岁的儿童、13岁以上的青少年、年轻的成人和老年人。

正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足球锦标赛，涉及 10 个国家的 4000 名儿童。在新泽西的东不伦瑞克（East Brunswick）和安大略的伯灵顿（Burlington）之间的一场 10 岁男孩组的比赛中，“父亲们在场外发生争执，有些球员因此动手动脚，并口出脏话，一个来自伯灵顿的球员还做了个下流的手势”，两个球队就此大打出手。最热闹的是两个球员的母亲之间也发生冲突，其中一个还踢了另一个。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实在也不算稀奇，因为在“正式”的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中，成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不胜枚举。（我自己亲眼目睹过几个 40 来岁的人毫不留情地“骑”在一个 11 岁的游击手身上，因为他在一局里犯了两个错误。）但是，最意味深长的是打架之后一个母亲所说的一番话。在回顾整个事件时，报上引用她的话说：“这〔打架〕只是一场精彩比赛中的 30 秒。第二天晚上，我们的孩子输了，但比赛还是很精彩。家长为两个队的孩子鼓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可问题是，首先，家长呆在那儿干什么？为什么有 4000 个孩子卷入一项锦标赛？为什么新泽西的东不伦瑞克队要跟安大略的伯灵顿队比赛？训练这些孩子是为了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儿童的游戏已经成为成人热切关心的事情，它已变得非常职业化，已不再是一个脱离了成人世界的世界。

如今，儿童进入职业化和世界级业余体育比赛，自然跟这些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1979 年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Wimbledon tennis tournament）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表现极为出色的、年龄还不满 16 岁的特蕾西·奥斯丁（Tracy Austin）。当时，她是锦标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选手。1980 年，则有一个 14 岁的选手参加比赛。老资格的温布尔顿冠军约翰·纽科比（John Newcombe）对此大为震惊，表示在不久的将来，12 岁的选手会成为网球比赛的中心人物。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网球落后于其他运动。具有世界级能力的 12 岁的游泳选手、溜冰选手和体操选手不足为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较好的教练和训练技巧使儿童能够达到成人水平的能力。可是，问题依然存在：成人为什么要鼓励这种做法？为什么成人要剥夺儿童自由自

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为什么要儿童经受职业训练、集训、紧张、媒体大肆宣传所带来的种种辛苦？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样：传统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我们现在有的是新兴的思想：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伴随着童年的消逝，儿童眼里的游戏也随之消逝。

儿童和成人在想法上也同样有日益融合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娱乐节目的欣赏趣味上看出来。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1980 年尼尔森电视收视调查报告（The 1980 Nielsen Report on Television）显示，成人（年龄在 18 岁以上）把下列节目列在最受欢迎的 15 个电视辛迪加节目中：《家族世仇》（*Family Feud*）、《提线木偶表演》（*The Muppet Show*）、Hee Haw、M*A*S*H、《舞蹈热》（*Dance Fever*）、《重温好时光》（*Happy Days Again*）和 Sha Na Na。这些节目也出现在 12 到 17 岁之间的观众最喜欢的节目中。它们又是 2 到 11 岁的观众最喜欢的节目！至于当时流行的节目，男性成年组显示《出租车》（*Taxi*）、《默柯和敏迪》（*Mork & Mindy*）、M*A*S*H、《三人行》（*Three's Company*）、《ABC 周日晚间电影》（*ABC Sunday Night Movie*）和 The Dukes Of Hazzard 属于他们最喜欢的节目。12 到 17 岁年龄组也包括了同样的节目。[1] 在 1981 年的《尼尔森报告》中，成年男子喜欢的电视辛迪加节目中，10 个里面有 6 个节目是跟 12 到 17 岁年龄组所喜欢的一样，10 个里面有 4 个节目是跟 2 到 11 岁年龄组所喜欢的一样。[2]

这样的数字想起来让人痛心，但这是跟现实状况完全一致的，即娱乐儿童的节目如今也同样在娱乐成人。当我写此书之时，《超人第二

---

1 这些数字来自“1980年的《尼尔森报告》”（*Nielsen Report on Television* 1980）。

2 “1981年的《尼尔森报告》”（Nielsen Report on Television 1981）。这份报告和1980年的报告可以向该公司要求而获得。公司地址：A. C. Nielsen Company, Nielsen Plaza, Northbrook, Illinois 60062。

集》（*Superman* Ⅱ）、For Your Eyes Only、《奇宝夺兵第一集》（*Raiders of the Lost Ark*）和《人猿泰山》（*Tarzan, the Ape Man*）正吸引着前所未有数量的各年龄层的观众。25年前，这样的电影一般是动画喜剧片的形式，往往被看作是儿童的娱乐。它们虽然不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那么可爱、天真、富有创造性，但依然清楚地表明是给年轻观众看的。今天，这种区别已经变得没有必要。在音乐方面，成年人和年轻人的品位也是不需要区分的，凡是光顾过成人迪斯科舞厅的人都可以作证。如果说10岁到17岁的青少年要比25岁以上的青年更了解摇滚乐队的名字和风格，那么这种说法很可能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古典音乐和“成人”的流行音乐市场都在萎缩，这显示成人已经不能宣称他们的音乐品位要比十几岁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1]

正当服装、饮食、比赛和娱乐都朝着同一种风格迈进之时，语言也在劫难逃。要记录这个变化非常困难，除了求助于一些趣闻逸事或请读者参照自己的经历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我们明确知道年轻人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在下降，无法达到“各年级”所要求的水平。[2]我们还知道他们的说理能力和作有效推断的能力也在走下坡路。[3]这样的证据通常用来证明年轻人的识字能力普遍下降，但也同样可以用来暗示成人对语言的兴趣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在讨论了媒介对年轻人起了创造较低级状态的语言能力的作用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讨论家长、老师

1　根据古典音乐唱片最大的生产商——RCA，在60年代早期，这家公司每个月大约发行8张新唱片。今天，这个数字已降至4张。RCA的发言人声称，这种局面跟同行业其他公司相似。RCA还承认，古典音乐和复杂的流行音乐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持续减少。今天，古典音乐、歌剧和室内乐约占全部销售的7%。其余的大多是摇滚乐、乡村音乐和爵士乐。

2　在许多记录这种下降趋势的研究中，有一个是1979年加州教育部门主持进行的。经加州评估计划（California Assessment Program）的测试，高年级学生的表现（跟1978年相比）继续保持在测试行业所说的全国平均阅读水平以下的16%。

3　在1981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全国教育进展评估报告》（*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显示13岁孩子的推理能力在整个70年代呈下降的趋势。

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成年人对语言的重要性漠不关心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假想，成人对语言的控制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大大超过儿童对语言的控制能力。在电视上、收音机里、电影里、商业交易中，在街头甚至在教室里，人们注意到成人使用的语言并不比儿童有更多的变化、深度或准确度。事实上，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型的书籍和报纸的专栏，他们指点成人如何言谈才像成人。这也算是关注这种现象的文献吧。

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大胆猜测，年轻人的语言正在给予成年人更大的影响，而不是相反。虽然青少年语言的显著特征依然是每说四字就要加“像”这个词，但在其他许多方面，成人觉得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语言非常吸引人，并运用到自己的语言中去。我记录了诸多35岁以上、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说话的例子。他们不带讽刺地、真诚地说，比如，“I am into jogging.”（“我特爱慢跑。”），“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原意是“你打哪儿来?”在此，意思是“What is your point of view?”即“你的看法是什么?”），“Get off my case.”（“别来烦我。”），以及十几岁青 少年常用的其他习惯用语。我必须让读者自行作出判断，他们的经历是否证实了这种趋势。不过，我相信，有一点我们也许可以肯定：那些我们称之为“脏话”的成人语言的秘密，现在的年轻人不仅对它们了然于胸（也许情况本是如此），而且可以像成人一样任意使用。不仅在安大略的足球场上，而且在所有的公共场所——棒球场、电影院、校园、教室、百货店、餐馆，人们甚至能听到一些只有6岁的孩子也会非常自如地大量使用那些话。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表明传统上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已经遭到侵蚀。它的意义重大还代表了举止礼仪概念的失落。确实，当语言、服装、趣味、饮食习惯等等越来越趋于相同时，扎根于社会等级观念的礼仪实践和礼仪的意义也相应下降了。[1]有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成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威和

---

1 关这些关系的出色的历史分析，参见Sennett的《“公共人”的堕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

光环，尊敬年长者的想法变得荒谬可笑了。这种衰退正在发生，这一点可以从人们普遍漠视公共集会的规则和仪式来推定：学校里所谓的“纪律问题”越来越多，举行公共活动需要加大保安力度，声响极高的广播电台广播音乐侵入公共空间，传统上表达礼貌的话，如“谢谢”和“请”，也越来越少听见了。

我相信上述所有的观察和推断，都是童年衰退和相应的成人性格萎缩的信号。但是，有一些硬性的事实也表明了同样的结论。例如，1950年，在全美国，因犯联邦调查局所称的“重大罪案”而被捕的15岁以下的人只有170个。重大罪案是指谋杀、暴力强奸、抢劫和严重恐吓罪。这个数字代表了美国15岁以下人口的0.0004%。在同一年，因重罪而被捕的年龄在15岁和15岁以上的有94784人，占15岁和15岁以上人口的0.0860%。这意味着在1950年，成人（年龄超过15岁，含15岁的人）犯重罪的比率要比儿童犯罪的比率高215倍。到1960年，成人犯重罪的比率是儿童的8倍；到1979年，这个比率是5.5倍。这是否意味着成人犯罪在下降呢？并非如此。事实上，成人犯罪在增加，因此，在1979年有40多万成人因犯重罪而被捕，占成年人口的0.2430%。这意味着在1950年到1979年之间，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这几乎完全可以归结为儿童犯罪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在1950年到1979年之间，儿童所犯重罪的比率增加了11.000%！儿童轻微罪案（如夜窃、盗窃和盗车）则增加了8.300%。[1]

如果可以说美国正在被汹涌起伏的犯罪浪潮所淹没，那么，这个浪潮多半是由于儿童的参与而产生的。犯罪，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已不再是专门属于成人的活动，而且读者已不需要统计数字来证实这一点。新闻界几乎每天都有儿童被捕的报道。如同那些打温布尔顿网球比赛的孩子，犯罪儿童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在纽约市，一个9岁的男孩企图抢

1　这些数字汇编，取材于1950和1970年《统一犯罪调查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联邦调查局出版）和1950年到197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劫银行。1981 年 7 月，纽约威斯彻斯特（Westchester）县的警察以性袭击 7 岁女童的罪名起诉 4 个男孩。被起诉的强奸犯，一个 13 岁，两个 11 岁，一个 9 岁，他是威斯彻斯特县有史以来以一级强奸罪被起诉的年龄最小的一个。[1]

10 到 13 岁的孩子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成人犯罪。确实，儿童严重犯罪的频率已将青少年犯罪的法典推到了极限。美国第一个青少年法庭于 1899 年在伊利诺伊州建立。“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到了 20 世纪末可能会寿终正寝，因此，全国上下的立法者急急忙忙地试图修改刑事法，这样年轻的罪犯可以接受成人的处罚。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由首席检察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建议把被判一级谋杀罪的青少年送进监狱，而不是送进加州青年管教所（California Youth Authority）。这个小组还建议对 16 岁和 16 岁以下的暴力罪犯，法院有权决定按照成人罪犯一样进行审理。[2] 在佛蒙特州，两个 10 来岁的孩子因涉嫌强奸、折磨和杀死一个 12 岁的女孩而被捕，这个案件迫使州立法机关提出强化青少年法典。[3] 在纽约，以重罪被起诉的、年龄在 13 到 15 岁之间的儿童现在可以在成人法庭受审。假如被判罪名成立，可能接受漫长的监内服刑。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新泽西、南加利福尼亚和田纳西州，法律都进行了修改，假如罪行足够严重，13 到 15 岁的儿童罪犯转到成人法庭受审变得很容易操作。在伊利诺伊、新墨西哥、俄勒冈和犹他州，通常围绕着青少年审判的隐秘状态已经被排除：现在报社记者可以定期采访诉讼。[4]

儿童犯罪的频率、残忍程度，以及立法机构对这种情况做出的反应，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无疑可以归结为多种起因，但没有一个能够像童年的概念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滑落这个事实更切中要害。我

---

1 参见纽约《每日新闻》（the New York *Daily News*），1981年7月17日，第5页。

2 参见1981年6月22日的《合众国际社的报告》（*th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report*）。

3 参见纽约《每日新闻》（the New York *Daily News*），1981年7月17日，第5页。

4 若想全面考察对于儿童犯罪的态度不断演变的过程，参见《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81年7月24日。

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它的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强调成人和儿童的区别。当成人世界以一切可以想像的方式向儿童开放时，他们必然效仿成人的犯罪活动。

他们也会成为这些活动的受害者。与儿童对社会秩序的侵犯相类似的，是成人对儿童的侵犯。根据美国全国受虐待儿童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的统计，1979 年上报的虐待儿童案有 711142 件。假定有相当数量的虐待儿童案是不上报的，那么，我们可以猜想，那一年有远不止 200 万起儿童受虐案。这样的情况除了说明儿童的特殊地位、形象和神秘光环受到巨大的削弱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说儿童遭虐待是因为他们小，这只解释了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他们受虐待是因为他们不被看作儿童。当儿童被看作尚未自我实现的、脆弱的、并不具备完全的智力和情感控制的人时，正常的成人不会在冲突发生时痛打他们。除非假定在那种情况下痛打儿童的成人都是精神变态，我们可以断定，至少部分的答案是许多成年人对儿童是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无异于 14 世纪所流行的观点，即儿童是微型成人。

除了犯罪活动外，其他一些社会趋势也强化了儿童是微型成人的观念。例如，儿童中间的性活动日益增加就是相当完备的证明。凯瑟琳·契尔曼（Catherine Chilman）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年轻的白人女性的性活动的增加尤其显著。[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梅尔文·泽尔尼克（Melvin Zelnick）和约翰·坎特纳（John Kantner）的研究结论指出，在 1971 年到 1976 年间，纵观各个族裔，未婚少女的性行为增加了 30%，因此到 19

1　引自Melvin Zelnik和John Kantner的《美国未婚年轻妇女的性经验和避孕经验，1976和1971年》（"*Sexual and Contraceptive Experience of Young Unmarried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6 and 1971"），《计划生育观察》（*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第9卷，第2期（1977年3月/4月），第55—58页。

岁时，55%的少女有过性交。[1]我们可以有理由假定，在消除儿童和成人在性欲上的区别方面，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电视，它不仅使全国人口长期处在高度的性亢奋状态下，而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性从一个隐秘深奥的成人之谜被改造成为一个可供人人享用的产品，像漱口液或腋下除臭剂一样。

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十几岁的少女怀孕率日益上升。1975年，少女生育构成美国生育总数的19%，比1966年上升了2%。但如果关注一下15到17岁少女的生育率，人们就会发现，这是那些年生育率增加的惟一的一个年龄组，它增加了21.7%。[2]

儿童世界中发生成人式的性活动所导致的另一个更严峻的后果是，年轻人染上性病的程度也在稳步上升。在1956年到1979年之间，10到14岁的孩子感染淋病的百分比几乎增加了3倍，从每10万人口中的17.7人增加到50.4人。在15到19岁的年龄层里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增长(从每10万人口中的415.7人增加到1211.4人)。在一个童年和成年之间没有有效界限的社会里，传统上对青年人性行为的各种约束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在毒品消费的问题上，情况也是一脉相承。例如，美国全国滥用酒精和酗酒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指出，大量的15岁的青少年饮用“相当多的酒”。一个10到12年级的学生饮酒习惯调查指出，自称“重度饮酒”(指每周至少饮酒一次，每次饮酒数量相当大）的人数是那些自称“偶尔饮酒”（指最多每月饮酒一次，每次饮酒数量较小）的人数的3倍。酗酒过去一直是成年人的痛苦，现在赫然成为我们新一代微型成人的现实。至于其他毒品，包括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证据也很有说服力：

---

1 参见Zelnik和Kantner，同上。

2 参见Stephanie Ventura的《青少年的生育问题：美国，1966—1975年》（“*Teenage Childbearing*: United States, 1966—1975”），《关键数据报告月刊》（*The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全国健康统计中心出版物。

美国的青年跟成人消费一样多的毒品。[1]

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成人化”的儿童正在兴起，但是，有类似的趋势表明“儿童化”的成人的现象也在日益严重起来。例如，在美国，作为主要社会公共机构的“老人院”的出现，表明年轻的成年人不情愿对父母承担全部责任。照料长辈，使他们融入家庭生活之中，显然被看作是不堪忍受的负担而从原本是成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中迅速降级。也许更意味深长的是，跟他们父母那一代相比，目前这一代年轻的成人，他们的结婚率急剧下降，生育的孩子也更少。此外，他们的婚姻也不那么持久。根据全国健康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如今父母的离婚率是20年前的两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孩子被卷入婚姻的解体：1979年是118万，而1963年则是56.2万。虽然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应该假定有多种起因，包括克利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指出的自恋个性日益增加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它表明成人对养育儿童的责任感急剧下降。人们反对离婚最有力的论据始终是它对儿童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成人认为，这个论据并不能令他们信服，反而他们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需要更重要。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的成年人与其说想为人父母，倒不如说他们自己越来越想成为儿童。无论如何，儿童已经对这种新的气氛做出了反应，其中包括大批儿童离家出走。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显示，1979年，有16.5万名儿童被警察拘留。据估计，未统计在内的出走儿童至少还有3倍之多。

在这些事实面前，人们期待某种“哲学”的出现以证实童年消逝的合理性。或许有某种支配社会生活的原则，要求人们寻找方法来确定一

1　参见《美国学生吸食毒品的状况，1975—1980年》（“*Student Drug Use in America*，1975—1980”），由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Lloyd Johnson，Jerald Bachman，和 Patrick O'Malley 编写。该资料可从下面的地址获得：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Rockville，Maryland 20857。

些无法避免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哲学确实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处理现实问题的依据。我指的是一个叫做“儿童权利运动”的东西。这个名称让人困惑，因为在这个旗号下集中着两个其实相互对立的童年概念。其中之一，我在本书中不会涉及，它相信童年虽脆弱但确实值得向往，因此希望保护儿童不受忽视和虐待。例如，这个观点主张，当家长不能尽其责任时，公共管理机构应该出来干预。这种童年的构想可以溯源到19世纪，纯粹是对导致儿童劳工法、青少年犯罪法典以及其他人道主义保护的想法的进一步延伸。《纽约时报》称那些起来捍卫这个想法的人是“儿童的救星”。

另一个“儿童权利”的观点，排斥成人对儿童的监督和控制，并提出一种证明童年瓦解的合理性的“哲学”。它主张，“儿童”这个社会分类本身就是不公正的，社会应不惜一切力量使儿童免受各种各样的约束。其实，这个观点比第一个更古老，因为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黑暗时代和中世纪。那时候，现代意义的“儿童”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这些问题上，情况通常如此，一些自称是“激进分子”的人提出了一个“反动的”立场。无论如何，这些人也许可以被称作“儿童的解放者”。他们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他是优秀的社会批评家，著有颇具影响的《废除学校的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1971）一书。**书中**反对义务教育，**理由**是学校不仅不可能获得改善，而且更重要的是义务教育的结果阻止了年轻人全面地参与社团的生活；也就是，阻止了他们成长为成年人。伊里奇重新界定了儿童跟学校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多数人视学校为仁慈和培养的机构，其实学校不合理地侵犯了某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和学习。伊里奇的论断的说服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信息如此广泛地传播，可从多种渠道获得，并且信息的整理方式使人们无需复杂的识字能力就能理解信息，因此，作为知识的源泉的学校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主要意义。此外，因为童年和成年的区别越来越不显著，因为儿童越来越不需要努力赢得成年，因为社会对儿童也越来越没有什么**要求**，所以学校教育的强制性开始显得不

合情理了。

这种印象被进一步加深，因为教育者对他们在学校里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感到困惑不已。一些论点——诸如人应该为上帝或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而受教育，甚至以打败苏联为目的——既缺乏严肃的论据，也缺乏拥护者。许多教育者情愿接受连马克思也会坚决摒弃的观点：教育是为了进入市场而作准备。假如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成人受过教育的标志，如历史、文学和艺术知识等，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此外，所谓学校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说法并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么站得住脚。因此，我们整个教育结构的大厦布满了危险的裂缝，而且那些干脆想拆毁这个结构的人也完全不是接受了错误的消息。其实，他们的提议有些多余。由于童年消逝了，学校也一定会消逝。伊里奇只要耐心等待即可，根本无须写一本书来论证这一观点。

上述这些观点也是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的《逃离童年》（*Escape From Childhood*）的主题。在该书及其他书中，他主张把儿童从300年的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他的论点在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的优秀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1974）中得以拓展，即法森把霍尔特的论点引向了逻辑的结论。法森主张，儿童的信息权、教育选择权、性自由的权利、经济和政治权利甚至选择自己家庭环境的权利应该还给儿童。“我们给予儿童过多的自由，”法森说，“是不可能犯错误的。”[1]法森并非没有意识到童年的历史，他显然认为十四五世纪的年轻人自然融入社会的方式，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模式。此外，他相信人们反对乱伦，主要是因为凡是参与乱伦的人都被弄得非常内疚；他相信一切性行为应该合法化，包括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性行为；需要做出安排允许儿童生活在他们喜欢的地方并和他们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包括由他们自己管理的“家”；儿童必须有投票权，“因为成人实际上并不把他们

1　法森，Farson，Richard. *Birthrights*. New York：Macmillan，1974，第153页。

的利益放在心上，不会为他们投票”。[1]

像这样的儿童权利运动无异于宣称**疾病还须病来医**。说得更委婉一些，如前所述，这种主张所代表的正是企图使一个看来已无可逆转的文化趋势合理化。换句话说，法森不是童年的敌人，美国文化才是，但并不是直接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说美国是反共产主义的。美国文化并不**想**反对童年。实际上，我们用来讨论儿童问题的语言依然保留着许多在十八九世纪时就已经确立的有关儿童的前提，正如我们谈论战争的语言保留了19世纪的战争思想一样。其实，今天来看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们有关儿童的语言跟我们如今的社会现实并不吻合。在这100年里，我们重新设计了我们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做才能分担所有的一切，如今我们已经达到了完全不需要儿童的地步，正如我们已经达到了不需要长辈的地步（尽管我们还不敢承认这个现实）。法森的提议之所以显得如此令人恐慌不已，是因为他坦白如实、既不带讽刺也毫无遗憾地揭示了未来。

---

1 法森，Farson，Richard. *Birthrights*. New York：Macmillan，1974，第179页。

第九章　六个问题

在本书的开头，我就替自己解除了为童年的消逝提供“解决方案”的负担。但是，在本书结束时，我希望提出一些读者可能觉得有兴趣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在我研究过程中的某个时候产生的，然后就留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这也是我摆脱问题的方法，至少暂时如此，也就是说，我在设法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虽然读者自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想到这些问题举足轻重，我感到很荣幸。

童年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

本书以童年是社会产物，而不是生物需要作为开头。精通儿童心理学的读者会把这种说法至多看作是有问题的，糟糕一点，则是不成立的。以弗洛伊德、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阿诺德·盖塞尔（Arnold Gesell），尤其是让·皮亚杰这样有权威的研究者为支柱，普遍的观点认为，可观察的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受生物规则控制的。实际上，皮亚杰把他的研究称作“遗传认识论”。他指出，儿童从一个智力

层次进步到另一个智力层次，遵循的是一个遗传的原则。我没有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许多方面它跟本书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干。事实上，**童年作为社会结构的想法**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它是到了16世纪才产生的，而现在正日益消逝。当然，假如皮亚杰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童年的概念就不是应运识字能力而发明的，它不过是被发现了而已；而新的信息环境也并没有使它“消逝”，而只不过是压制它的存在而已。

由于皮亚杰基本采用的是非历史的方法，我相信他的研究有局限性。他没有充分注意到，他所观察的一些儿童的举止在早期历史阶段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相当不同。不过，我倒愿意相信他是正确的。如果他正确，那么我们可以激励自己相信，只要稍有机会，童年仍会坚持自己的存在。因为如前所述，你不可能蒙骗孕育万物的大自然，至少不可能永远蒙骗下去。但是，如果童年只是文化的产物——我倾向于相信的这种观点——那么，它需要等待我们的传播环境发生惊人的重组，才会坚定不移地重新出现。而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因此，我们面临着童年的出现可能只是文化历史的脱轨，像马拉的大车或白纸上的黑色涂鸦一般，转瞬即逝，不再出现。

为了让自己振奋起来，我愿意满足于下面的构想，并希望未来的研究将能证实我的观点：童年的概念类似于语言学习，它具有自身的生物基础，但是，除非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和培养，即社会需要它，它不可能实现。假如文化被一种媒介控制，而这种媒介要求年轻人分离，才能学会非自然的、专业的和复杂的技能和态度，那么，童年的概念便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清楚有力而且不可或缺。如果文化传播的需求不要求年轻人长期隔离，那么童年将保持缄默无声。

童年的衰落预示着美国文化的普遍衰落吗?

美国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完全生活在被20世纪的技术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国家。很少有例外，美国人都愿意让他们的景观、城

市、商业企业、家庭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去适应他们情愿叫做“技术进步”的各种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美国现在正处于它的“第三次伟大实验”（Third Great Experiment）中，全面的结果还一点儿都不清楚呢。

“第一次伟大实验”是托马斯·潘恩[1]称作“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它起源于18世纪后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是建筑政治结构的可靠想法吗？”“第二次伟大实验”起源于19世纪中期，属于社会性质的，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组成的人口，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惯，文化能从这样的人口中造就出来吗？在实验过程中允许某些失败，但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实验都相当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奇迹，令人羡慕。

“第三次伟大实验”始于本世纪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文化如果允许现代科技全面主宰它的命运，那么它能保留原有的人道价值，同时创造新的价值吗？奥尔德斯·赫胥黎[2]和乔治·奥威尔[3]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那就是：“不能。”路易斯·芒福德也给了他的答案，是“可能不行”，诺伯特·维纳[4]的答案跟前者如出一辙。雅克·埃勒尔（Jacques Ellul）几乎每年都在报告里提出他的答案，那是所有答案中最铿锵有力的“不可能”。那些给出各种各样的“能”的答案的人，有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1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启蒙学者。1776年发表《常识》小册子，号召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译者注

2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3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动物庄园》等。临死前，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者注

4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美国数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48年提出控制论，对现代计算、控制、通信、自动化技术、生物学和医学理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哲学上，自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译者注

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塞缪尔·弗洛曼（Samuel Florman）和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阿西莫夫过分迷醉于技术的成就和潜能。显然，这个问题依然有待解答，允许我们进行猜测。技术本身被神化，政治过程被降格，成人的头脑日益萎缩，童年逐步走向消亡，这些都是可悲的迹象。全世界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能否走出肢解过去历史的困境，然后制定出相应的挽救计划。

但是，美国人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个问题。20 世纪科技的震撼，麻痹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刚刚开始注意到科技发展过程中抛撒给我们的精神和社会的残渣。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因震惊而目瞪口呆。例如，我们也许还记得拉尔夫·奈德（Ralph Nader）在 1965 年出版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该书对一个重要的技术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不错，这本书的确是在美国人允许汽车改变他们的景观、城市和社交生活之后才出版的。但它还是出版了。此后，其实紧接着，悄悄地涌现出大量其他的批评以及论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的著作：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埃勒尔的《科技社会》（*The Techonological Society*），维纳的《人道地利用人类资源》（*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约瑟夫·韦森鲍姆（Joseph Weisenbaum）的《电脑的威力和人类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芒福德的《机器之谜》（*The Myth of the Machine*），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20 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布尔斯廷的《图像》（*The Image*）等等。这些书，包括后来出版的书，都有助于美国人停下脚步，认真思考一下未来，并向他们指出技术可以为他们服务，而不是本末倒置。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文化分裂的早期迹象不会持久。

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电的发明搅乱了使童年产生并得到培育的信息环境。但是，失去童年，并不等于我们要失去一切。归根结底，印刷术粉碎了世界宗教团体的团结，摧毁了口语传播传统的亲密无间和诗意，削弱了区域的忠

诚，并创造了极其没有人性的工业体系。但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些人道价值依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还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价值，包括那些有关养育儿童的价值。由于我们从事的事业所带来的初次震撼已经开始减弱，我们还是应该想像自己处在一个比较愉快的地位，到头来也许会产生出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

道德多数组织和其他原教旨主义组织在保存童年方面究竟出了多少力？

在50年代，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记得，如果你贸然评论，说共产党在某个领域里提出了好主张，那你就要作好准备接受指责，至多说你是“一路货”，最糟说你是个持有正式党牌的党员。今天，在某些领域内，关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问题，同样的思维方式很流行：说一句与原教旨主义立场不谋而合的话，会使你遭到谴责，说你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为准备反击这种指控，我想说，原教旨主义复活，依我之见，潜藏着危险，因为它充满着宗教的盲从和政治极权主义的精神。此外，我的印象是许多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热爱他们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胜过热爱上帝，没有任何东西比让他们的主绝望更使他们快乐：原教旨主义甚至支持在他们独立国家的武器库里添加一种毁灭性的武器[1]。

然而，如前所述，这个有时被称作“道德多数组织”的团体，在我看来，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信息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它试图安排从经济上抵制某些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它努力恢复对性的抑制和尊重感，它尝试建立坚持严格礼仪标准的学校，这些都是旨在保存童年的积极活动的范例。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有效地达到目的，因为它的力量太弱小，起步也太迟，实际上，也不能解决一个纯粹需要信息环境重组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相信，这种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而

1　毁灭性武器指核武器。——译者注

且，谁知道，也许它可以减缓童年瓦解的脚步，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适应童年的消逝。

自由主义的传统，或者，如“道德多数组织”轻蔑地称呼的“世俗的人道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贡献少得可怜。例如，在反对经济上抵制电视赞助商时，民间自由论者采取的是一个奇特的立场。他们认为，与其让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道德标准来控制电视内容，还不如让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来控制。无论如何，就政治哲学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力来说，自由主义传统往往鼓励童年的消亡，慷慨大方地接受一切现代的东西，因而也相应地敌视一切设法“使时钟倒走”的行为。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时钟本身是错的。“道德多数组织”可以提醒世人，这个世界曾经对儿童热情友好，并感到对儿童的未来负有重大的责任。我认为，我们虽然不赞同“道德多数组织”的傲慢自大，但借用他们的一些历史回忆总是可以的。

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

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这就要求进行特殊的训练。如果人人都需要了解电脑如何运作，如何将它们的世界观强加于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对判断的定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全球性的电脑文化被视为必须，那么，可以想见，年轻人的教育会变得非常重要，年轻人的文化必须与成人文化不同的想法也会保存下来。但是，这样的发展有赖于许多不同的因素。媒介本身所具备的潜在结果，也可能由于媒介的使用方法而变得不起作用。例如，广播电台本质上有扩大和颂扬人类语言的力量和诗意，世界上有些地方正是利用广播电台发挥这种功能。在美国，部分是由于电视竞争的结果，广播电台已不过是音乐行业的附属物而已。于是，其结果，虽然维持了说话能力，但至于成熟的语言，除了了不起

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之外（National Public Radio），几乎完全从无线电波中消失了。因此，利用电脑来推动平民百姓进行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思维，也并不是必然的。举例来说，如果让大部分半文盲的百姓用电脑上的视觉游戏来自娱自乐，让百姓使用电脑并被电脑利用，却无须理解其中的所以然，这样可能更符合某些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如此，电脑就会保持神秘莫测，为官僚精英人士所控制。教育年轻人也完全不必要。于是，童年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它通往被淹没的旅程。

有没有任何社会机构足够强大，并全心全意地抵制童年消亡的现象?

只有两个机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一个是家庭，另一个是学校。如前所述，家庭的结构和权威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家长对年轻人所接触的信息环境完全失去了控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电视比作“第二家长”。她这么说，是指我们的孩子在电视机前所花的时间，确实要比和他们的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长。这么算来，父亲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家长”，落在了电视、唱片、广播和电影之后。实际上，拜尔电话公司在家长的价值日趋下降的驱动下，居然厚颜无耻地鼓励父亲使用“故事专线”(Dial-a-Story)，以此来替代他们亲自讲故事给孩子们听。无论如何，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

除此以外，也许由于媒介控制的天地越来越大，许多家长对自己抚养孩子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和直觉是不可靠的。结果，他们不但不抵制媒介的影响，反而去向那些被认为懂得如何对孩子最好的专家求教。因此，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指导顾问、教师和其他一些代表公共机构观点的人士侵占了家长权威的大片领域，而且这大多是受到家长邀请的。这意味着传统上以亲密、依赖和忠诚为特点的亲子关系因此而丧失。诚然，现在有些人相信亲子关系主要是神经质的，相信社会公共机构要比家庭能更好地为儿童服务。

对家庭的威力更具破坏力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点上，为了不

使自己被误解，我要立刻说明，将妇女从有限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是技术革命的真正人道的一个结果，应当受到一切有知识的人民的支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由于妇女在商业、艺术、工业和各种职业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传统意义上的育儿形式所具有的优点和意义，也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衰退。无论人们对把妇女看作专门的养育者有什么样的批评，事实上，正是妇女，也只有妇女，才是童年的监督人，她们始终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让男人抚养孩子的说法无论多么有道理，男人不可能在抚养孩子方面承担任何妇女所扮演的并依然在扮演的角色。因此，当父母双方都走向社会时，儿童就变得有些累赘了，而且，人们越来越认为童年结束得越早越好。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表明，除非社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美国家庭不会起来强烈反对童年的萎缩，直至瓦解。

至于学校，它是所剩的唯一的一个承认儿童和成人有重要的不同，成人拥有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教给儿童的社会公共机构。由于这个原因，孩子气的乐观主义者依然著书立说，向教育者提出如何进行教育，尤其是如何寻求保存活动的建议。但是，学校的权威日益下降，已经有很好的引证。在一个经历了剧烈变化的传播结构里，引用麦克卢汉的话就是，学校已变成了禁闭场所，而不是学习场所。当然，教育者对于应该如何对待儿童是感到困惑的。例如，当教授文化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教育者甚至对这一古老而受尊重的工作也丧失了热情，不知道是否应该将它彻底抛弃。再举一个例子，同样令人沮丧：在一些学校，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已经给自己加上了所谓“职业培训”的课程，这显然表明微型成人的重新出现。很显然，学校能够有力地反映社会趋势，却不大能够引导社会趋势。至于在反对社会趋势方面，学校几近无能为力。

不过，学校作为识字文化的产物，不会轻易参与攻击家长的地位。无论学校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学校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童年消逝的最后的一道防线。

不消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当所有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自己都成了电视时代的产物时，无论抵制曾是多么有力，这时候抵制不仅会失去它的

力量，而且抵制的意义将会被遗忘。

在抵制时下所发生的一切时，个人完全无能为力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我之见，是“非也”。但是，如同所有的抵制活动一样，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具体地说，抵制需要设想父母养育孩子是反叛美国文化。例如，只要父母保持在婚姻中，这本身就是违抗的行为，也是对一个持抛弃态度的文化的侮辱，因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持续性是没有意义的。跟自己的父母、亲戚住得很近，这样，孩子们可以日日感受血缘的意义，以及对长辈尊敬和责任的价值，这也至少是90%的非美国人的做法。同样地，坚持要孩子们学习延迟满足感的磨炼或性行为上的谨慎，或举止、语言和风格上的自我约束，就是把自己放在几乎与一切社会潮流相对立的地位。而且，要保证孩子们努力学习，成为识字有文化的人，是出奇地耗费时间，甚至代价昂贵。然而，最具反叛意义的是努力控制子女接触媒介的机会。事实上，要这么做有两种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要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而且，这么做，需要家长在抚养子女方面付出极大的关注，这是多数家长都不准备做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家长坚定不移地做这些事。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蔑视他们文化的指令。这样的家长不只是在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童年，而且同时是在创造某种知识精英。当然，短期来看，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一旦成人，会很受商业界、专业领域和媒介本身的欢迎。长远来看，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这一点：抵制这个时代的精神的家长将促成一个所谓“寺院效应”（the Monastery Effect），因为他们在帮助延续了一个人道传统的存在。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儿童的存在，这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它已经快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

参考文献

阿里耶斯，Ariès，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 By Robert Baldrick. 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

阿恩海姆，Arnheim，Rudolf. *Film As Ar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

Barincou，Edmond. *Machiavelli*.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5。

罗兰·巴特，Barthes，Roland. *Mythologies*，trans.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Hill & Wang，1977。

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Bruno. *The Uses of Enchantment*：*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6。

布尔斯廷，Boorstin，Daniel J. *The Image*. New York：Harper & Row，Colophon Books，1961。

布尔斯廷，*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 New York：Harper & Row，1978。

Burke，James. *Connections*. Boston：Little，Brown & Company，1978。

巴特勒，Butler，Pierce. *Origin of Printing in Europ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0。

Chaytor，H.J. *From Script to Print*. Cambridge，England：The University Press，

1945。

Cowley, Robert. "Their Work Is Child's Play."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

德莫塞, deMause, Lloyd.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杜威, Dewey, John.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99。

Donzelot, Jacques. *The Policing of the Famil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

杜布莱, Du Boulay, F.R.H. *An Age of Ambition: 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Elizabeth.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伊莱亚斯, Elias, 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法森, Farson, Richard. *Birthrights*.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吉尔摩, Gilmore, Myron. *The World of Humanis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2。

Gimpel, Jean. *The Medieval Machin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6。

哈夫洛克, Havelock, Eric.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1976。

哈夫洛克, "The Coming of Literate Communication to Western Cul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Winter 1980。

海尔布龙纳, Heilbroner, Robert. "The Demand for the Supply Sid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28, No. 10, June 11, 1981。

霍尔特, Holt, John. *Escape from Childhoo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6。

伊里克, Illick, Joseph. "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Langer, Susanne K. *Feeling and For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拉希, Lasch, Christopher.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洛温索尔, Lowenthal, Leo.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Mankiewicz, Frank, and Joel Swerdlow, *Remote Control*.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9。

Martin, Leonide. *Health Care of Women*. New York: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8。

Masnick, George, and Mary Jo Bane. *The Nation's Families: 1960-1990*. Boston: Auburn House, 1980。

麦克卢汉, 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米德, Mead, Margaret.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70。

芒福德,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34。

Payne, George Henry. *The Child in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6。

平奇贝克, Pinchbeck, Ivy, and Margaret Hewitt.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Ⅰ: 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平奇贝克, *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 Ⅱ: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Children Act of 194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3。

普拉姆, Plumb, J. H. "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 *Horizon*, Vol. 13, No. 1, Winter 1971。

波兹曼, Postman, Neil.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9。

Salomon, Gavriel. *The Interaction of Media, Cognition, and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9。

Sennett, Richard.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78。

辛格, Singer, Dorothy G., Jerome L. Singer, and Diana M. Zuckerman. *Teaching Television: How to Use TV to Your Child's Advantage*.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81。

Steinberg, Sigfrid H.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4。

斯通, Stone, Lawrenc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001640." *Past and Present*, No. 28, July 1964。

斯通,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

泰勒, Taylor, Isaac. *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74。

塔奇曼, Tuchman, Barbara W. *A Distant Mirr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塔克尔, Tucker, M. J. "The Child as Beginning and End: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Walzer, John F. "A Period of Ambivalenc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Childhood,"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怀特, White, Lynn,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2。

Wishy, Bernard. *The Child and the Republ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

译名对照表

美国动物保护协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安德森 Anderson，Daniel

安德森 Anderson，John

阿伦提诺 Arentino，Pietro

阿里耶斯 Ariès，Philippe

《几百年的童年》*Centuries of Childhood*

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阿恩海姆 Arnheim，Rudolf

阿西莫夫 Asimov，Isaac

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圣奥古斯丁 Augustine，Saint

《忏悔录》*Confessions*

奥斯丁 Austin，Tracy

阿兹特克人 Aztecs

培根 Bacon，Francis

《学习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巴杰拉尔多 Bagellardo，Paolo

贝克 Baker，Russell

巴特 Barthes，Roland

“猎犬号” Beagle （船）

《在那里》*Being There* （电影）

贝尔电话公司 Bell Telephone

伯恩斯坦 Bernstein，Jeremy

贝特尔海姆 Bettelheim，Bruno

《童话的用处》*The Uses of Enchantment*

《圣经》*Bible*

《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

布莱辛顿 Blessington，Jack

《蓝色的泻湖》*Blue Lagoon，The* （电影）

布卢姆 Blume，Judy

圣博纳文图拉 Bonaventura，Saint

布尔斯廷 Boorstin，Daniel

《图像》*The Image*

博尔丁 Boulding，Kenneth

《20 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布拉赫 Brahe，Tycho

布鲁格赫尔 Brueghel，Pieter

布罗考 Brokaw，Tom

布洛诺夫斯基 Bronowski，Jacob

《人类的进化》*The Ascent of Man*

布鲁纳 Bruner，Jerome

《巴格西·马龙》*Bugsy Malone* （电影）

汉堡王 Burger King

卡尔文主义 Calvinism

凯里 Carey，James

《卡丽》*Carrie* (电影)

卡罗尔 Carroll，Lewis

卡特 Carter，Jimmy

查理·马特尔 Charles Martel

切斯特顿 Chesterton，G. K.

儿童权力运动 Children's Rights Movement

契尔曼 Chilman，Catherine

克利弗 Cleaver，Robert

《虔诚的家庭管理》*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

科尔曼 Coleman，Gary

库根 Coogan，Jackie

库珀 Cooper，Jackie

哥白尼 Copernicus

《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法典大权》*Corpus Juris*

《宇宙的奥秘》*Cosmos* (电视节目)

科斯特 Coster，Laurens

康茨 Counts，George

克雷明 Cremin，Lawrence

《学校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戴姆拉尔 Damerall，Reginald

达尔文 Darwin，Charles

《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

笛福 Defoe，Daniel

德莫塞 deMause，Lloyd

笛卡尔 Descartes，Rene

杜威 Dewey，John

《学校和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

“故事专线” “Dial-A-Story”

狄更斯 Dickens，Charles

狄德罗 Diderot，Denis

迪斯尼 Disney，Walt

多德 Dod，John

《虔诚的家庭管理》*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

多纳休 Donahue，Phil

杜布莱 Du Boulay，F.R.H.

《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

爱森斯坦 Eisenstein，Elizabeth

《印刷机：变化的动因》*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伊莱亚斯 Elias，Norbert

《论文明之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埃勒尔 Ellul，Jacques

《科技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无尽的爱》*Endless Love* (电影)

爱泼斯坦 Epstein，Edward

伊拉斯谟 Erasmus

《箴言》*Colloquies*

《论男孩子的礼仪》*De Civilitate Morium Puerilium*

《避难所》*Diversoria*

《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

埃里克松 Erikson，Erik

欧几里得 Euclid

《驱魔法师》*Exocist，The* (电影)

法森 Farson，Richard

《与生俱来的权力》*Birthrights*

《爸爸本事大》*Father Knows Best*（电视连续剧）

联邦调查局 FBI

菲尔兹 Fields，W.C.

长老会信纲 First 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

弗洛曼 Florman，Samuel

福特 Ford，Gerald

福里斯特 Forrest，William

弗兰肯斯坦综合症 Frankenstein Syndrome

弗洛伊德 Freud，Sigmund

《梦的分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弗罗本 Froben，Johann

福禄培尔 Froebel，Friedrich

富勒 Fuller，Buckminster

原教旨主义运动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富斯特 Fust，Johann

庚斯博罗 Gainsborough，Thomas

《蓝衣少年》*Blue Boy*

伽利略 Galileo

盖塞尔 Gesell，Arnold

吉本 Gibbon，Edward

吉尔摩 Gilmore，Myron

《人道主义的世界》*The World of Humanism*

歌德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戈登森 Goldenson，Leonard H.

古德 Gooder，Sarah

戈登暴乱 Gordon Riots

谷登堡 Gutenberg，Johann

哈维 Harvey，William

哈夫洛克 Havelock，Eric

《西方文化的起源》*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海尔布龙纳 Heilbroner，Robert

希罗多德 Herodotus

休伊特 Hewitt，Margaret

霍尔特 Holt，John

《逃离童年》*Escape from Childhood*

霍妮 Horney，Karen

休谟 Hume，David

赫胥黎 Huxley，Aldous

伊里奇 Illich，Ivan

《废除学校的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

英尼斯 Innis，Harold

杰克逊 Jackson，Andrew

巨人杀手杰克 Jack the Giant Killer

詹森 Jenson, Nicolas

耶稣会 Jesuits

乔丹 Jordan，W.K.

乔伊斯 Joyce，James

康德 Kant，Immanuel

坎特纳 Kantner，John

凯 Kay，Joseph

肯德尔 Kendall，Amos

开普勒 Kepler，Johannes

凯斯特勒 Koestler，Arthur

科尔伯格 Kohlberg，Lawrence

克兰兹伯格 Kranzberg，Melvin

拉希 Lasch，Christopher

《拉韦尔纳和雪莉》*Laverne & Shirley* (电视连续剧)

《让碧弗来干》*Leave It to Beaver* (电视连续剧)

列农 Lennon，John

《小可爱》*Little Darlings* (电影)

少年棒球联合会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ssociation

《小捣蛋》*Little Rascals* (电影)

《一点浪漫》*Little Romance，A* (电影)

洛克 Locke，John

《对教育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路易十五 Louis XV

洛温塔尔 Lowenthal，Leo

路德 Luther，Martin

利库尔戈斯 Lycurgus

黎利 Lyly，John

《拉丁语法》*Latin Grammar*

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Niccolo

《头十年》*First Decennale*

麦迪逊 Madison，James

梅勒 Mailer，Norman

《自我推销》*Advertisements of Myself*

《美因兹的诗篇》*Mainz Psalter*

曼 Mann，Horace

马努蒂乌斯 Manutius，Aldus

安 Martin，Ann

马克思 Marx，Karl

麦当劳 McDonald's

麦克卢汉 McLuhan，Marshall

《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米德 Mead，Margaret

《文化与承诺》*Culture and Commitment*

梅罗维茨 Meyrowitz，Josh

米勒 Miller，Henry

《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

蒙田 Montaigne，Michel Eyquem de

蒙台梭利 Montessori，Maria

道德多数 Moral Majority

莫尔 More，Sir Thomas

《乌托邦》*Utopia*

莫尔斯 Morse，Samuel F.B.

芒福德 Munford，Lewis

《机器之谜》*The Myth of the Machine*

奈德 Nader，Ralph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

全国健康统计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全国受虐待儿童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全国教育协会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全国滥用酒精和酗酒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

尼尔 Neill，A.S.

纽伯里 Newbery，John

纽科比 Newcombe，John

纽约儿童保护协会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纽约上诉法庭 New York State Court of Appeals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The*

《尼尔森报告》 *Nielsen Reports*
尼克松 Nixon，Richard
奈斯特龙 Nystrom，Christine

奥布莱恩 O'Brien，Margaret
《奇怪的夫妻》*Odd Couple，The* (电视连续剧)
《预兆》*Omen，The* (电影)
奥佩 Opie，Iona
奥威尔 Orwell，George

潘恩 Paine，Thomas
《纸月亮》*Paper Moon* (电影)
小选手橄榄球队 Pee Wee football
裴斯泰洛奇 Pestalozzi，Johann
费尔 Phaire，Thomas
《儿童之书》*The Book of Children*
皮亚杰 Piaget，Jean
平奇贝克 Pinchbeck，Ivy
柏拉图 Plato
《斐多篇》*Phaedrus*
《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
普拉姆 Plumb，J.H.
普卢塔克 Plutarch
《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Lives*
《漂亮宝贝》*Pretty Baby* (电影)

昆体良 Quintilian

拉伯雷 Rabelais，Francois
《高康大》*Gargantua*

《奇宝夺兵第一集》*Raiders of the Lost Ark* (电影)

雷诺德 Raynald，Thomas

里根 Reagan，Ronald

《雷克斯·亨巴德和他的一家》*Rex Humbard and His Family* (电视连续剧)

里查森 Richardson，Samuel

卢梭 Rousseau

《爱弥儿》*Emile*

拉特兰郡 Rutland

萨根 Sagan，Carl

萨松 Sassoon，Vidal

塞尔温 Selwyn，George

《芝麻街》*Sesame Street*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illiam

《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亨利六世》*Henry VI*，Part II

肖 Shaw，George Bernard

希尔兹 Shields，Brooke

舍费尔 Shoeffer，Peter

西格尔 Siegel，Stanley

辛格 Singer，Jerome and Dorothy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Seven Dwarfs* (电影)

儿童本性研究协会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ld Nature

苏格拉底 Socrates

斯塔基 Starkey，Thomas

《对话》*Dialogue*

斯通 Stone，Lawrence

斯特劳斯 Strauss，Gerald

54 工作室 Studio 54

沙利文 Sullivan，Harry Stack

“苏利号” Sully （船）

《朝阳学校》*Sunrise Semester* （电视连续剧）

《超人第二集》*Superman II* （电影）

斯温 Swain，William

《人猿泰山》*Tarzan，the Ape Man* （电影）

泰勒 Taylor，Isaac

《字母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

邓波儿 Temple，Shirley

梭罗 Thoreau，Henry David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Alexis de

托夫勒 Toffler，Alvin

塔奇曼 Tuchman，Barbara

吐温 Twain，Mark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维萨里 Vesalius，Andreas

《人体结构》*De Fabrica*

伏尔泰 Voltaire

沃丁顿 Waddington，C.H.

瓦格纳 Wagner，Richard

《齐格弗里德》*Siegfried*

《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Walter Cronkite's Universe* （电视连续剧）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纽约电视台 WCBS

韦森鲍姆 Weisenbaum，Joseph

《电脑的威力和人类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怀特 White，Lynn，Jr.

维纳 Wiener，Norbert

《人道地利用人类资源》*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 Wimbledon tennis tournaments

全国广播公司的纽约电视台 WNBC

华兹华斯 Wordsworth，William

色诺芬 Xenophon

《年轻的生命》*Young Lives* (电视连续剧)

泽尔尼克 Zelnick, Melvin